

倪柝声传(CFZ)

目录:

编者的话.....	1
第一章 义人的后裔	3
第二章 母子先后蒙恩得救	9
第三章 福州大复兴.....	13
第四章 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19
第五章 受到弟兄会的影响.....	25
第六章 经历神的医治大能.....	37
第七章 娶了贤慧的妻子	45
第八章 获得闽南一带同工的支持.....	52
第九章 认识了史百克.....	56
第十章 职事的恢复.....	63
第十一章 中国的耶路撒冷.....	79
第十二章 在鼓岭所见所闻.....	89
第十三章 在香港的部署.....	94
第十四章 遭到了挫折	106
第十五章 深入研究传记人物	117
第十六章 隐秘的事知多少	126
第十七章 是一桩冤假错案	139
第十八章 姊妹们的见证	157
第十九章 全球各地宣教士的见证	179
第二十章 末后的日子	206

编者的话

当我编写了一系列的《属灵伟人小传》之后，本来有意撰写《倪柝声小传》，谁料到手头上积累的资料十分丰富，无从浓缩，远超一本小传所能容纳，遂决定以正式传记的方式付梓。

这些年来，倪柝声弟兄在全球各地的教会中，越来越赢得众多圣徒的尊敬，国际上许多权威的传记作家更把倪柝声誉为教会历史上罕有的属灵伟人。

在道格拉斯(J.D. Douglas)所著的《二十世纪的基督徒传记辞典》(Twentieth-Century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中，倪柝声 (Watchman Nee) 榜上有名；汉克斯 (Geoffrey Hanks) 这位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七十位基督教伟人》(70 Great Christians) 里，也把倪柝声的名字列入教会二千年来精选的杰出人物之中，将倪柝声与马丁路德、奥古斯丁、本仁约翰、司布真等圣人的名字并列。倪柝声是唯一的华裔，享有如此殊荣。

至于内地会的赖恩融 (Leslie Lyall) 在其所著的《中国教会三巨人》(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一书中，更肯定了倪柝声、王明道、杨绍唐三位弟兄曾对中国的教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倪柝声本人的著作，有不少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名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属灵的权柄》、《圣洁无瑕疵》，都已售出数百万册，并都被许多地区列为属灵经典著作。倪柝声在文字工作上的成就，罕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实在留给举世的信徒一份极其丰厚的和珍贵的属灵遗产。

在威廉·彼得逊 (William J. Petersen) 所发表的《改变世纪的一百本书》(100 Christian Books That Changed the Century)，威廉·彼得逊在补遗中，郑重向读者们致歉意，表示该书受到篇幅所限，只能列出一百本书，以致未能把倪柝声弟兄所著的《正常基督徒生活》(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包括在内，但却列在二十本可商榷的书目中。

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弟兄们的压力，要我编写《倪柝声传》，本人考虑到先父 (陈则信) 已著有《倪柝声弟兄简史》，身为儿子的我，不敢掠美。另一方面，出版《倪柝声传》，势必披露我的部分隐私。但为了使一些宝贵的史料不致从此湮没，我只好在仓促中，草草写成这本《倪柝声传》，并且应允读者，日后必会善加修缮、增订、补充。

在目前，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不可多得资料，一时无法尽录，唯有暂且割爱，请读者们原谅。

第一章 义人的后裔

正如箴言十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

倪柝声弟兄确实是义人的后裔。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一八五三年就读于美国公理会差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 开办的一所西式学堂，他在校时听了福音而信主，四年之后在闽江受浸。

倪玉成蒙恩之后，非常热心，在福州城内不停地传福音，宣教士于是悉心栽培他，使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公理会在福州最初按立的一位华人牧师。当年因为在闽北各大公会的华人中，只有倪玉成一人被按立为牧师，其它大公会在主持圣礼时，时常把倪玉成轮流借用。倪玉成有解经的恩赐，在当时被誉为闽北三大布道家之一。

一八七七年，倪玉成牧师诞下儿子倪文修。倪文修在家中排行第四，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倪文修十三岁丧父，他发奋读书，就读于福州的美以美会书院，后来又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清朝政府在福州设有全省性的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每三年有一次初试，每五年有一次复试。倪文修复试成功，获得公职，并被调往广东汕头海关任职。

一八九九年十月，倪文修经过母亲撮合，娶了林和平为妻。林和平从小就非常精明和智慧，并具备领袖的才能。至于她的丈夫倪文修，则庄重含蓄，温文尔雅，一派君子风度。倪柝声从小就深受父母的

熏陶，兼得母亲和父亲的优点；不过，若要认真作一比较，则母亲对他的影响，犹超过父亲倪文修。林和平比倪文修小三岁，生于一八八〇年，生父是一个贫民，因家境困苦，且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把女儿送给一位林氏商人的侧室为螟蛉女。林和平的养父在福州南台富商张鹤龄经营的福利洋行任职。当林和平六岁时，养父林氏得着怪病，张鹤龄请来一位美以美会牧师为林氏祷告，祷告后怪病忽然痊愈。病愈后林氏受洗加入美以美会。林和平则随养母在圣公会受洗。林和平在自传《恩爱标本》中如此感恩：

「神啊！此中真看见你的作为，我不能不感谢你和赞美你！正如经上所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罗九章十五节）你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作我的神，我向你敬拜！」

林和平十一岁时，被养父送到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毓英女塾去读书。由于毓英女塾是教会学校，林和平有机会读到圣经。有一次华雅各牧师来毓英女塾领会，林和平听时受感动认罪，只是当时无人跟进，以致林和平对救恩仍未完全清楚。

林和平在十六岁时，有意到美国学医，为此她向父亲提出，先到上海习读英文。十七岁时她终于告别福州，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

林和平在中西女塾读了两年，到了她十八岁时，她母亲恐怕她一旦到美国学医，留在彼邦不再回国，立意为她办婚事。其时，倪玉成师母正托人为儿子倪文修找物件，与林和平的母亲一说即合。林和平虽心里不情愿，但在父母作主下，只好从上海折返福州成婚。婚后两星期，林和平就随夫前往汕头，其时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作事。一九〇〇年，倪林和平生下长女闺臣，一九〇一年又生下次女闺贞。连生两女之后，倪林和平的家婆倪玉成师母就嘀咕了，说媳妇只会生女孩子。倪林和平听了婆婆的闲言闲语，心里不舒服。家婆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陋习，使她精神上承受了重大的压力。

当倪林和平第三度怀孕的时候，心里实在害怕，她唯恐又如婆婆所说的只会生女孩子，再度应验。

以下是倪林和平述说当年的经过：

「当我无路可走，有冤无处伸时，也会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我要起来求告祂。在模糊中也会记得哈拿的故事。于是我就把我的心愿倾吐于听人祷告的神面前。我心里也相信祂一定答应了我的祷告，接受了我的奉献。到了产期，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的丈夫头一个看见是男孩子，他立刻跑到我的耳边说：『真的是男孩子，感谢神』。我听了心里欣喜，谢谢神听了我的祷告，为我除去羞耻。心中觉得有说不出的喜乐。」

一代伟人倪柝声就这样诞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刚生下来时，他的父母给他起名述祖，别名傲夫，英文名字是 Henry Nee（倪亨利）。后来他自己取名柝声，意为报更者在深夜时所敲的梆柝的声音，英文则取「守望者」（Watchman）为名。

由于倪柝声的诞生是他母亲效法哈拿向神许愿，蒙神应允得来的，他一诞生就被神分别为圣，确定他长大后要献身事奉神。让我们重温哈拿的许愿，记载于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

接着我们再读哈拿在生下孩子后怎样庄重地宣读誓言：「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

倪林和平既把倪栢声归与神，神就应允她的许愿和誓言，在倪栢声的一生中，神不断地装备他，带领他，锻炼他，倪栢声终于成为神使用的贵重器皿。

倪栢声五岁时，因着父亲调职苏州海关，在苏州住了一年。一年后，倪父向税务司请假回福州照料家中老少，倪栢声于是随着父母回到福州。

在福州时，倪栢声的父亲倪文修请了一位举人来教孩子们读书，学习范围包括书法、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

一九一二年，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宣导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政制的指导思想。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事，倪林和平即在福建省推动爱国运动。倪林和平在自传《恩爱标本》中供称：

「我极力帮助爱国运动。那时烈火炎炎，我不顾性命，到处演说。自己先把手饰、金手环奉献国家，以身作则，自然也有许多男女跟随。福建省政府以我成绩可嘉，爱国可风，孙道仁都督特为请奖北京政府。结果蒙允给我二等勋章。此时我又通函各界妇女组织妇女爱国会。孙道仁都督夫人为会长，潘寿松夫人为副会长，我自己被举为总干事。」

倪林和平在社交上的成功，掩饰不了她此时在信仰上的迷惘和失落，她供述：「此时我多与不信的人接触，不期然而从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落到一个无信仰的地步中：爱名誉、地位、势利、服装……等。实在说起来，简直是个浪子，已到了吃豆莢的光景中，还在那里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真是又愚昧又可怜！此时颠倒在竹林及电影院中，三朋四友，应酬无暇。」

孙中山到福建访问时，省政府请倪林和平任特别招待员。而伴随孙中山访问的女秘书宋庆龄，正好是倪林和平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的校友，两位中国的杰出女性重逢，倍感亲切。

倪林和平周旋于权贵之中，忘却了父神。倪栢声，目睹母亲世俗化，贪爱虚荣，也因之目濡耳染，渐渐无心向主，当时也没有人向他传福音。

一九一六年，倪栢声进入福州的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读书。该书院设有小学、初中、高中、师范及神学院等五个部门，是英国圣公会的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主办的，程度很高，虽无大学部，但高中毕业生若有意读大学，书院可保送毕业生到上海圣公会开办的圣约翰大学。

三一书院的教职员，大多来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福建差会（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故教职员富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倪栢声既受惠于西方开放的文化思想，又吸收革命时期的新文化思想，促使他文思敏捷，思路开拓。他生来聪明敏悟，在班内成绩居于第一，只是他对圣经兴趣索然，要靠作弊来及格。后来神怜悯他，使他成为中国最熟读圣经的神仆之一，并被誉为中国最精深博大的查经家。

第二章母子先后蒙恩得救

余慈度，一八七三年生于杭州。她父亲原是一位军医，他在信主后献身作传道，后来被长老会按立为牧师。余慈度一八八八年到苏州的博习高等医学堂读医科，一八八九年学成后，家里再送她到英国深造，以便在医学上有更高的造诣。当轮船停在法国的马赛港时，她因着圣灵的感动和主爱的激励，答

应了主的呼召，决定放弃前程，回国传福音。余慈度通知船长她将离船，自行折返中国时，船长大为震怒，以为余慈度精神失常；但余慈度坚持到底，卒之她在马赛换船回到中国。回国后，她踏着父亲的脚印，委身传道工作，不久她有差传的负担，动身往高丽的汉城作差传工作。

倪林和平，在《恩爱标本》中，从前我在上海时曾经遇见她，且是非常佩服的；因她这是为主舍弃医生的职业、名利，不受薪水，不作雇工，只专心传道，靠主供给。在上海时，我见过她后，当时非常敬爱她，立即把母亲的戒指转送给她。起初她不肯收，说，你年轻，和我初次见面即给我戒指，日后母亲知道了，懊悔也来不及；还是你留着吧！我听了这些，真知道她是不爱财物只爱主的人，就流下泪来，一定要她收下，并且说：就是母亲骂我打我也甘心。余慈度听了我的话，就向我微微一笑说，既是如此，我只得收下，愿神祝福你。事后，她就往高丽传道去了。」

一九〇三年十月，余慈度从高丽回国，到处带领奋兴布道会。一九一四年，余慈度开始重视祷告，认为教会要复兴，工作要有果效，要实行代祷，每一个信徒要有负担祷告。

一九二〇年二月中旬，余慈度来福州开复兴大会。倪林和平与余慈度睽违二十二年，忽然听到余慈度来福州领会，感触万分。她说，此中光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倪林和平在《恩爱标本》言及当时心中的感受：「若说欢喜她来，一想到自己对神的情形，实在不堪设想，连外面基督徒的壳子都没有了。她是正直无私的，一定给我一个钉子，那么怎么办呢？若说不喜欢她来，她在基督徒中间又是我顶佩服的，这一种又喜又惭的情形，真是笔墨不能形容。」

倪林和平此时已经四十岁，在听了余慈度几次讲道之后，圣灵在她里面作工，使她心里受感动。有一天，余慈度讲到神的爱和主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亲自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因祂的死不至灭亡。又说主耶稣为了爱世人，在十字架上如何受苦，如何受羞辱，甘心舍己来作人类的救主。倪林和平听到这里，正如她所见证的，她顽梗的心，不知不觉被这位可爱的主所融化了。她痛哭一顿，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作她个人的救主。倪林和平信主之后，她首先向丈夫认罪，承认已往所有亏欠丈夫的地方。接着神又光照她，要她去向她曾冤枉并责打过的儿子倪柝声认罪。事关有一次家中一个贵重的花瓶被打碎了，没有一个孩子敢承认，因为一承认免不了要挨打。倪林和平就认定一定是家中最调皮的儿子倪柝声所作的，就把倪柝声打了一顿。之后她发现那个花瓶是另一个孩子打破的，但她碍于母亲的面子和尊严，始终没有向倪柝声认罪。如今她得救了，这件事却没有对付，使她心里一直不平安。

倪林和平述及这件事的经过：

「神也光照我应当向大儿子认罪，但我总不肯。有一天，我拿三块钱去买诗歌和新约全书，要作家庭礼拜。我才把诗歌拣了一首，要弹唱的时候，主的灵有权柄在我心里，不许我弹琴，要我先向我的大儿子认罪，方许唱诗敬拜祂。我就说：『神啊！我是母亲，怎么可以向儿子认罪呢？从今而后我在家庭中怎么能过日子呢？』神顶清楚地说：『非认罪不可！』那时，我只得向神屈服。我的丈夫和儿子见我弹琴又不弹，只见我两眼流泪涔涔，不知为着何事。但是我转过身来，抱住我的大儿子柝声，诚恳恳地对他说：『我为主的缘故，向你认那一次冤打你，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大家都稀奇我这样作，但是大儿子对我说：『你那一次无故的打我，我的心真是恨你。』我说：『求你赦免我。』他就不开口了。正是那一夜，神也抓住了柝声。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他也愿意去听道，且愿将心身奉献给

神，作传道的工作。」

那一天，即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倪柝声在福州天安堂听余慈度讲道之后，回到家中，独自在房间里，心里争战，跪下来祷告时，起初没有话可祷告，但过些时候，他看见自己满身污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同时看见，只有主耶稣能把他拯救，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把他洁净。他仿佛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伸出祂被钉的双手，在欢迎他，并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候着接受你！这样，主的爱终于折服了他。

让我们听一下倪柝声自己的见证：

「以前我讥笑人家接受耶稣为救主，但那个晚上，我亲身经历了祂钉死流血的爱。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接受了主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许多人信主，是到蒙拯救脱离罪为止。然而对于我，问题是我还必须答应主，作祂的仆人事奉祂。我明明知道，这个代价太大，所以心里起了挣扎。但主当晚不放过我，祂的爱折服了我，挣扎终于平息，我愿意因着主这样的大爱，一生跟从祂，一生事奉祂。我从得救那一晚开始，就知道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一面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一面要以祂为主，终身事奉祂。

「祷告以后，我尝到了我从来没有尝过的喜乐和平安。当时，房间里好像充满了光。我就对主说，主啊！你实在恩待了我！」

第三章福州大复兴

倪柝声弟兄重生得救之后，也像他的母亲倪林和平一样，为自己的罪深深地忧伤痛哭，同时也很认真地对付已往所犯下的罪。倪柝声不仅向校长承认已往考「圣经课程」时作过弊，并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勤奋读圣经。他每个月至少读一遍新约，或按次序每天定规读十几章圣经。过去，他在许多科目上都名列前茅，唯独厌恶圣经，不喜欢读「圣经课程」，如今他在学校突然如此改变，证明他有了新生命和新性情。学校的校长目睹他的改变，没有为他曾经作弊的事而开除他。神从此赐给他讲解圣经的恩赐，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查经家。

我的父亲（陈则信）在所著的《倪柝声弟兄简史》中，这样叙述：「没有多久，倪柝声就把新旧约读了好几遍。由于他的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又非常丰富，所以他对圣经的事实记得很熟，对真理的认识也增加不少。倪柝声作见证说，在他们传福音之后，许多人蒙恩得救，大家都起来读圣经。本来我们中国人一见面就问吃饭了没有？但那个时候他们见面都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改问吃神的话了没有？你问我，我问他，借此互相鼓励，他们吃饭之前，总要先读圣经。」

在倪柝声得救的第一年，在倪家每星期二下午二时有查经聚会，请许则昭牧师带领。许则昭查经时这样说：什么都要按照圣经而行。

一九二一年二月，有一天倪柝声读圣经，读到主耶稣受浸时，祂来到约但河，说祂从水里上来。几天后，三月二十七日早晨，倪伯母——倪林和平，也因早前读到圣经里受浸的真理，与倪柝声和次子倪怀祖到和受恩教士那里（Miss Margaret Barher），母子三人同时在闽江的白牙潭河边受浸。

三一书院因内战干扰，暂时停课，倪柝声就乘机只身前往上海，进了余慈度在上海江湾主办的查经祈

祷处（Bible Study and Prayer House）学习事奉。此时他尚不能适应圣经学校的纪律生活，正如他所说，他贪吃美食、爱穿新衣、早晨贪睡起不了床。有一次余慈度差派倪柝声到上海市区去投寄信件，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倪柝声耽搁了时间回来，余慈度误会了他，客气地请倪柝声再回福州，到已复课的三一书院继续读书。倪柝声述及此事时，完全没有埋怨余慈度，只怪自己平时给余慈度印象不好，才导致这次的误解。倪柝声这样坦承：

「这件事使我事奉主的心愿，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我才知道我生命虽有重大的改变，我的生活却不够实际，不够接受约束，我的天性似有许多地方需要改正。我既然要事奉神，就要作充分的准备，在各方面受到装备。」

倪柝声向余慈度告别时，余慈度的一句话抓住了倪柝声：余慈度提起长者和受恩教士，说她比余慈度本人，更适合带领倪柝声。

倪柝声重返三一书院后，很热心引领同学们归向基督，他把同学们的姓名逐一写在一张纸上，每天为们他祷告，一有机会就向同学传讲福音。主也真垂听他的祷告，在列出的七十名同学中，除了一人之外，其余的六十九名，都先后蒙恩得救。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倪柝声查考圣经时，注意到一点，即信徒该聚集擘饼，该常常纪念主。而当地的教堂，一年只有四次擘饼；并且来擘饼的人，水准十分参差，甚至未清楚得救的也有。倪柝声就去找王载弟兄，对王弟兄说：圣经说，要擘饼纪念主，但是我得救以后，一次都没有擘饼。我又注意到在教堂里使我觉得有点为难。王载就拉着倪柝声的手说，神所引导的，正是一样，我昨夜整夜未眠，一直祈祷应否遵照圣经的原则和榜样，即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门徒都应该擘饼纪念主。到了主日，倪柝声就到王载家里，和王弟兄夫妇三人同擘饼，一同纪念主。倪柝声这样形容那次的擘饼聚会：

「实在太喜乐了，我告诉你们，天离地实在太近了！天近到一个地步，好像亲手能摸得到一样，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了！这一次我才知道擘饼纪念主有什么意义。这一次，我才知道纪念主，是神所宝贵的。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纪念主。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从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我病了，或者出门在路上，或者有意外阻挡，我总是擘饼。」

这几个月，倪柝声的母亲也和他们一同擘饼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倪柝声、王载弟兄等接着开始在王连俊弟兄家的亭子里举行传福音聚会。弟兄们穿上福音背心，前面写的是「你要死」，后面写的是「信耶稣得救」，或其它传福音的句子。倪柝声在《往事的述说》一文中，对当时福州仓前山的复兴实况，作了详尽的叙述：

「我们手里拿着旗子，口里唱着诗，这样游行各处，看见的人真稀奇。就是这样把许多人带到聚会的地方来了。天天都是这样游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在亭子的外面，在厨房里，在客堂里，都坐满了人。这样每天三次聚会，都是各人自己带凳子。每天下午，整个福州仓前山，只见人在搬凳子。年老的也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也有。员警见了，都有点稀奇。感谢主，祂特别的祝福，有几百人得了救。这一次，把救恩的根基，打得很坚实。本来，在中国，许多信徒对救恩不大清楚。借着那次的传福音聚会，许多人清楚了救恩。」

倪柝声又述及那次的复兴，并不局限于王连俊住宅的亭子里的聚会，也影响到三一书院：「我从来没有

见过比那次更大的复兴。天天有人得救，好像无论什么人，一碰到我们就得救。当时，我在福州三一书院读书。每天早上五点钟到学校，就看见无论在哪里，都有人读圣经，这样的人有一百多个。本来在校中看小说是很时髦的，现在只好偷着看，而读圣经，倒成为一件普通的和体面的事。我们的学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稀奇的是，差不多每班的班长都得救了。连所有出名的运动员也得救了。每天总有六十多人拿旗子游行，另有几十人出去派单张。福州有十几万人，全城都被这些青年人震动了，我们按着当时圣灵的引导，开始聚会。后来得救的人数越过越多，工作便扩展到附近的乡村」。

这时与倪柝声一起聚会的青年人，包括王载、吴淡吾、王畏三、王连俊、王峙、缪绍训、陆忠信等。几个弟兄们觉得，王连俊家的亭子，不够容纳日益增多的会众，就一起祷告商量，希望租一个聚会的地方。不久和受恩教士转交一笔二十七元，是一位信徒奉献弟兄们作为租会所之用。弟兄就以这笔款，在福州仓前山的十二间排，正式租了一间房作为聚会之用。

王载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是海军军官。王载的妻子潘少容，婚前在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的布道会中信主。结婚后，潘少容带领王载信主得救。王载信主后，接受主的呼召，毅然放弃在海军的职位，凭信心回福州作宣教工作。

十二间排的聚会有七位同工，每礼拜五有一次同工聚会。同工们都很年轻，肉体没有受到对付，聚会时倪柝声和王载经常有争辩。当时倪柝声和王载出来事奉不久，都很主观和自负，都还没有受到磨练，个性都很强。同工聚会时，倪柝声和王载一争辩，其他五位同工只好坐在那里听他们争辩。同工聚会的次天，即星期六，倪柝声循例去看长者和受恩教士。倪柝声向和受恩申诉了王载许多不是之处，希望和受恩训斥王载。意想不到的，和受恩总是对倪柝声说：「他比你大五岁，你要听他；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倪柝声承认和受恩是属灵方面的长辈，使倪柝声不得不勉强地接受，但再次面对着王载时，两人间又再爆发了争吵。争吵局面持续了一年半，令神的工作受到亏损。王载当时的负担是布道；倪柝声所要建立的是各处的聚会点。用倪柝声的话，王载是挑担子卖货，倪柝声是摆摊子卖货。

这里看到，尽管人的失败和软弱，使神的工作受到亏损；但是圣灵却超越了人的失败和软弱，没有停止作工，圣灵始终一直带领神的儿女往前去。

第四章 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在我所编着的《宋尚节小传》第十二章，已经述及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对中国各地教会的影响，同时也述及神如何垂听世界各地信徒为中国的祷告，在中国兴起了许多神大用的器皿，他们包括宋尚节、王载、王明道、倪柝声等。

故此在本书，再一次谈及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上海的美南长老会牧师林亨理博士（Dr. Henry M. Woods）的师母在参加一个晚上聚会时，听到讲员讲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如何拒绝神的恩典，死了之后，如何可怜，渴望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财主的舌头，因为财主在火焰里，极其痛苦。林师母听到这里，心中大为震撼，

感受到拯救灵魂的迫切性。林师母回家后，整个星期辗转难眠，吃不知味，林师母记起歌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林亨理夫妇于是受到圣灵的催促，发信给在上海的二十多位同工，邀请他们于一九二四年元旦，到上海虹口狄思威路七百十五号的林宅，一起为全球性的复兴祷告。除了少数人，接到信的大多数人，都推辞不来，说该日早有约会，希望林氏夫妇更换日期。但是林氏夫妇确定这是神所定规的日子，谁与神站在一起，谁就是大多数，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因为主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到了一九二四年元旦，每一个原先想改期的人，都改变了主意。到了指定的聚会时间，每一个被邀请的教牧同工，都到林亨理夫妇家里，参加这次意义重大的祷告聚会。

参加聚会的，有余慈度小姐、美北长老会的路崇德牧师（Walter Lowrie）、美南浸信会的万应远牧师（Robert Thomas Bryan）及其夫人、美南长老会吴板桥牧师（Samuel Woodbridge）及其夫人，宣道会的伍思兰小姐（Ethel Woodberry）和伍美兰小姐（Ora Woodberry），伯特利教会的胡遵理小姐（Jennie Hughes）、安汝慈小姐（Ruth Paxon）、戴卫斯小姐（Edith Davis）、内地会的巴拉师母（Mrs. Ballard）和梯碧小姐（Miss. Tippet），以及途经上海即将前往北京到冯玉祥部队那里布道的戴卫斯牧师（Rev. George Davis）。

当晚，在夜幕低垂时，当每人祷告完，从膝盖上站起来时，每个人都感觉到圣灵在他们中间。这一天，环球复兴祷告运动正式开始。

紧接着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信徒，包括美国、英国、印度，以及其它地方的信徒，纷纷加入了这个环球复兴祷告运动。

福州十二间排的聚会，以及福州的复兴，也成为代祷的项目之一。王载曾从十二间排写一封信给林亨理师母，信末引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并希望林安德夫人寄下数份《神为什么使用慕迪》给福州十二间排的弟兄们。王载在信中又述及林师母透过石美玉医生，曾奉献二十美元给王载作路费，奉献四十元给十二间排的聚会，作购置诗歌集之用。兹照录英文原信如下：

Dear Mrs. Woods:

Praise God for His faithfulnes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letter and the enclosed \$50-which reached me this morning, Dr. Mary Stone gave me your gift of \$ 20.-toward my traveling expenses and also \$ 40.-for the hymn books. I want to express my hearty thanks. I am still weak. God is my strength.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again. Thanking you for the books you so kindly sent to me. Can you spare some copies of Why God Used D. L .Moody for my brothers in Foochow?

yours in His Love

Leland Wang (Gal. 2 : 20)

奇怪的是，细读倪柝声所作的见证，以及审阅倪的《往事的述说》，他竟从未提及环球复兴祷告运动领导人林亨理师母，遑论述及她曾对十二间排聚会所需的诗歌集的奉献。

一九二四，许多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教牧同工，包括该内地会总监何斯德（Dixon E. Horst）和中国长老会路崇德，分别回到原来的教堂或机构：只有伍尔牧师（Rev. Earl Wookberry）和其师母（Ada Woodberry）

留在上海，推动整个运动，伍尔牧师是伍恩兰姊妹的兄弟，是伍约翰（John）牧师的公子。

祷告运动一开始，余慈度小姐、安汝慈小姐、石美玉医生等，就向林亨理伉俪提出，把当时中国最大的复兴——倪柝声和王载带领的福州大复兴，纳入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历史轨迹。她们注意到，倪柝声母子是余慈度小姐带领得救的，而王载师母是安汝慈小姐带领信主的，即王载间接地也是安汝慈的福音果子。

既然福州聚会一开始擘饼的三位信徒——倪柝声和王载夫妇，都是余慈度和安汝慈所结的福音果子；如今余慈度、安汝慈都加入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她们有意把十二间排的聚会，即当日中国最大的复兴运动——福州大复兴，纳入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轨迹，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王载，除了与这个运动的主持人林亨理夫妇有直接联系外，又与这个复兴祷告运动的伍家姊妹——上海宣道会守真堂的伍恩兰和伍美兰，常常讨论福州十二间排聚会的路向问题。伍氏姊妹的父亲伍约翰牧师（Rev. John Woodberry），是宣道会的资深牧师，任宣道会上海议会委办长；伍约翰建议十二间排的聚会，建立教牧按立制度。

王载就把按立牧师的想，正式向倪柝声提出来，说伍约翰牧师若到福州，会先按立倪柝声为牧师，按立王载为传道，和按立王连俊为教师。

倪柝声听了，说他需要一两星期读圣经，才能答复这问题。倪柝声查考圣经时，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倪柝声于是说，牧师乃是基督给教会的恩赐，不是由人按立的。

有一个主日，倪柝声讲了一篇关于约柜的信息，说神的见证是跟着约柜的，约柜实际上所预表的是基督。约柜是神的子民敬拜的中心，约柜在会幕里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在那里。倪柝声并说，约柜离开会幕时，会幕就空泛泛，失去了属灵的实际，神的眼目也离开会幕，跟着约柜而去。倪柝声总结说，今天聚会的原则也是如此，不在于外面的会幕，即形式的基督教；神要看的，是那里有没有基督的见证，也即是约柜所预表的，他强调应该跟随的是约柜，不是会幕。

倪柝声反对按立制度，即是说，王载在短期间内，无望按立为牧师，王载因此就对倪柝声很反感。很自然地，两人不能同心。王载和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关系，更加拉近；他跟倪柝声的关系，则逐渐疏远。

后来倪柝声又写信给同工们，说明他反对按立制度的原因，他又手印油墨复本，派发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多久，倪柝声被人邀请到杭州传福音，福州的同工们就乘他不在时，因着倪柝声所派发的信件，把他革除了。不少弟兄姊妹，站在倪柝声一边，反对王载等同工们所作的，此时十二间排的教会面临分裂，弟兄姊妹们与同工们意见分歧，有些弟兄姊妹们打电报和写信到杭州，告诉倪柝声他被革除的事；然而同工们仍不让步，坚决拒绝倪柝声，尤其是带领聚会的丁素心姊妹，她反对蒙头，对倪柝声成见很深。

当倪柝声乘船回福州时，他原本打算回去表白，但是圣灵在他里面作工，要他静默，不许他自己表白。一九二四年七月，当倪柝声到达福州时，许多弟兄姊妹到码头迎接他，说其它同工如何对他不公平，倪柝声的血气稍为激动，主就在里面制止他。弟兄姊妹们等着他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答说，主不许可他为自己表白，他叫弟兄姊妹们安静。倪柝声的态度令弟兄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倪柝声离开福州，

往外地去，避开那个局面。哦！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倪柝声虽然没有介入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神却保守他，使用他，他虽然和环球复兴祷告运动保持距离，却不知不觉地也因这祷告运动而蒙福。

一九二五年六月，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在上海苏州路的新天安堂（Union Church），有十天的复兴聚会，讲员是日本福音团（Japan Evangelical Band）的总干事魏克斯牧师（A .Paget Wikes），担任翻译的则是来自福州十二间排聚会处的王载。主持这次复兴聚会的，除了余慈度，还有汪佩真。汪佩真日后和倪柝声在上海开始有聚会，成为倪柝声的得力同工之一。那次上海的复兴聚会，带动了整个上海教会的复兴，在这次复兴聚会中被感动献身的，有计志文、赵世光，他们后来被主大大使用。

由于十二间排聚会的同工没有被宣道会上海议会的伍约翰牧师按立，福州聚会处没有被纳入宣道会的建制；但是宣道会一直视王载为同路人。一九二八年九月，在广西宣道会协会主席翟辅民牧师（Robert Jaffray）的邀请下，王载担任香港培灵研经会讲员，后来更在翟辅民的支持下，王载出任中华国外布道团团长，总部设在广西梧州；翟辅民本人则表现得非常谦让，自愿屈居副团长。王载的弟弟王峙，亦受翟辅民邀请，出任《圣经报》主笔。

第五章受到弟兄会的影响

倪柝声与福州同工们分手的一个潜在原因，是他的信仰，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弟兄会的影响。根据倪柝声在《基督徒报》介绍《直道》时披露，一九二一年，当倪柝声得救才一年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送他好几本属灵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英文本的《直道》（Straight Paths-for the Children of God）。《直道》为弟兄会的亚力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所著。

亚力山大·马歇尔出生于苏格兰（Scotland）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十八岁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亚瑟公司（Arthur & Company）的货仓任职。两年后，亚力山大·马歇尔在听到一位弟兄会的传道人福朗（Gordon Forlong）传福音时得救。得救后，亚力山大·马歇尔前往各地传福音，包括挪威、瑞士、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法国等。亚力山大·马歇尔除了有讲道的恩赐之外，还有写作的恩赐。他在文字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光是他的小册子《神救赎的妙法》（God's Way of Salvation）就销行了数百万本，并已译为多国文字，其中文本为圣教书会出版。在亚力山大·马歇尔一生中，受他影响最深远的读者，恐怕就是在中国服事主的倪柝声。

一九二五年倪柝声在福建福州附近的罗星塔住下，出版定期刊物《基督徒报》。这期间，倪柝声曾和南京的李渊如姊妹谈过福州聚会分裂的事故，以及他反对被按立的原因。根据倪柝声在《往事的述说》所透露的，李渊如当时的态度很强硬，并未被倪柝声说服，因此他就索性不再向她提教会路线问题了。在这时期，李渊如和贾玉铭、高师竹在南京主持《灵光报》，她并且在明德女校任教。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份的《灵光报》，王载的《晨更篇》和倪柝声的《与主同死》都收编在《灵光报》内，相容并蓄，显示李渊如并未偏颇王载或倪柝声，而是对他们一视同仁，都视他们为主内同道。

到了一九二六年初，倪柝声把《直道》再读一遍，倪柝声承认：「我又把这本书看一遍。何等的奇妙，神在这几年来引导我所思想的、所教训的，和我所实行的，真是与此书的各项看法完全符合。」

倪柝声于是马上汇钱到伦敦弟兄会的出版社 Pickering & Inglis，买了十多本《直道》，赠送与他走同一道路的同工们。

一九二六年，倪柝声在厦门患了重病，医生说只有几个月的命。倪柝声虽不怕死，但南京的成寄归和李渊如，都写信请他到南京休息，他于是到了南京，住在成寄归家里，带病校对司可福（Cyrus Ingersoll scotland）的圣经函授课程。倪柝声同时受贾玉铭聘请，在《灵光报》任编辑，与李渊如、汪佩真等女同工一起工作。

在南京时，倪柝声把《直道》借给李渊如看，李渊如读了《直道》之后，对教会的神学观完全改变，完全认同弟兄会的作家亚力山大·马歇尔在《直道》中所阐述的各项观点。李渊如与倪柝声在教会问题上的看法是如此一致，促使她下定决心要辞去《灵光报》编辑的职位，只是当时未被贾玉铭所接纳。一九二六年底，李渊如在南京已经和几位姊妹有擘饼聚会，倪柝声在南京很自然地也就和他们一同擘饼。一九二七年五月，《基督徒报》出版特刊，将《直道》全文发表，李渊如并亲笔为特刊写了序。

在序中，李渊如这样说：「《直道》之内容，有不少优点，值得人注意的：第一，是能以简单婉转之笔，发挥属灵的要道；第二是每一断案，皆以经训为本，且又证之以事实；第三，是打破遗传的教训，言人所不敢言，以领人直求真理。至若旁征博引，巧譬善喻，真是妙语风生，知隽而又能发人深省者！余愿《直道》的结果，不是领人推崇欣赏一本亚力山大·马歇尔的著作，乃是带领人一如乔治·怀特排（George Whitefield）所说的：『但愿人名、宗派，及公会都失败；惟有耶稣基督是一切，而又充满一切！』」李渊如在序的末了，注明一五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她居住于上海的寄庐。原因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灵光报社的办公室被一些反基督教的人捣毁，报社只好结束。李渊如到上海之后，就在辛家花园二十号汪佩真家里，和上海的几位弟兄姊妹们有擘饼聚会。（由于汪佩真比李渊如早一步离开南京，所以辛家花园的擘饼聚会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已经开始。）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的擘饼聚会迁到赓庆里举行；不久，倪柝声将他在福建罗星塔所办的福音书局也迁到新闻路赓庆里，改名福音书房，由李渊如负责编校工作，先后出版《复兴报》，和《讲经记录》。这几本基督教刊物很有属灵的份量，质素很高，各地很多信徒因之得着供应。

一九二八年一月，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和加拿大一位传教士祝康宥（Charles H. Judd），共同租下了哈同路二百四十弄文德里三十号一幢房屋，每周举行讲道、擘饼、祷告等聚会，这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开始。

在那年间，祝康宥是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差派的传教士。大家知道，内地会是由戴德生（Hudson Taylor）所创立。正如《戴德生小传》所写的，内地会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戴德生本人来自弟兄会；不约而同的，祝康宥也同样来自弟兄会。倪柝声经常到祝康宥家里拜访，祝康宥向倪柝声介绍了许多弟兄会出版的书籍，同时也向倪柝声分享了他多年来在中国差传的经验。

祝康宥每主日早晨，例必骑着脚踏车，从内地会在吴淞路的办事处，到哈同路与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等信徒一同擘饼。祝康宥和倪柝声的配搭时间不很久，就被调回加拿大。倪柝声对祝康宥早期给他灵性上的帮助，从未忘怀，这从他一九三二年底在加拿大温哥华探访祝康宥，重温在上海相聚的美好回忆，可兹证明。

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我的百姓》（My People），是弟兄会的作家贝利斯（Robert Baylis）所撰写。该书

是北美弟兄会的一部简史，书内也报导了弟兄会的祝康宥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布道的事迹。

弟兄会有一本诗歌名为《小群诗歌》(Hymns for the Little Flock)，命名的出处来自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在那处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

倪柝声在哈同路文德里编译的诗集取名为《小群诗歌》，共一百六十四首，名称是否效法弟兄会领袖达秘编纂的《小群诗歌》，或者如此起名纯属巧合，因时过境迁，无从稽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倪柝声当年手头肯定有一本英国弟兄会出版的《小群诗歌》，因为倪柝声的诗集采用了英国弟兄会《小群诗歌》中达秘所创作的《听哪，千万声音呼喊。》(Hark! Ten Thousand Voices Crying)、和《父啊，儿女称颂你名》(Father, Thy Name Our Souls Would Bless)。自福音传入中国一两百多年来，这是中国首次有诗集收录了这位弟兄会伟大诗人达秘的诗作。在《信徒造就》的《唱诗》这一篇，倪柝声对达秘的诗《听哪，千万声音呼喊》，赞不绝口，倪氏说：「我想，全世界，过去这一千九百多年之中，难得有一首诗像这首诗这么伟大的。这一首诗是达秘写的……这首诗写的是启示录四章五章的光景，是升天之后宇宙里的情形，在这里有各各他，有复活，又有升天，天上充满了荣耀。」

还有，倪柝声在哈同路讲道时，又经常引述弟兄会解经家开雷(William Kelly)、马金多(Charles Henry Mackintosh)、柏勒(John Gifford Bellet)、寇迪(C.A. Coates)的信息内容，充分说明倪柝声深入地研读弟兄会各大解经家的书籍。即使在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得胜聚会，与会者也多次认真地学习倪柝声所写的《向读直道特刊者先说几句话》。倪柝声借弟兄会的亚力山大·马歇尔的信息，在得胜聚会期间，介绍了地方教会的概念：特刊的前言说：「凡不合乎真理的，是当破坏的。惟破坏的目的，是要领人顺服真理，不是建立自己。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恶，我们就当自己先脱离，也领人脱离；切不可空谈教训，定别人的罪，以致失去爱心！我们的元首是基督；我们这许多人——基督徒——不过是肢体，借着基督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神的言语，是我们的亮光。」

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内地会传教士祝康宥回加拿大之后不久，弟兄会发生了变故。在伦敦北部十一英里巴涅(Barnet)闭关弟兄会举行的特别聚会中，来自美国的弟兄会领袖詹姆斯·戴勒(James Taylor)在讲道时，竟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并非由永世开始的，他说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早在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弟兄会的芮文(F. E. Raven)，就因在圣子的解释上出现错误，而被一些正统的闭关弟兄会的主流派开除出去。一九二九年这些芮文派(The Ravenites)的弟兄会，就追随詹姆斯·戴勒的教导，是为芮文——戴勒联盟(The Raven-Taylor company)，或称戴勒一党的(The Taylor faction)。

一九二九年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在英国的分裂范围扩大，分裂情况出现在爱丁堡(Edinburgh)、巴斯(Bath)、伯明罕(Birmingham)、伦敦等地的聚会。从此可见，詹姆斯·戴勒在闭关弟兄会之中，有一些追随者，才使他的异端，有一定的市场。詹姆斯·戴勒著作甚丰，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出版七十六本书。他到过加拿大、法国、新西兰各国，本人则坐镇美国纽约。毫无疑问的，他的异端教训，也给美国弟兄会带来重大的冲击和破坏。

话说回来，正如前文所说，倪柝声于一九二六年，写信到伦敦的 Pickering & Inglis 买《直道》时，曾在信中说出自己仰慕那些书的原因，即他佩服弟兄会对圣经的认识很深入和透彻，但是倪没有意识到内地会内部有人变质和蜕化。一九三〇年，芮文派拥戴詹姆斯·戴勒为领袖之后，芮文派的弟兄会，就

有一位成员，到上海来看倪柝声在哈同路的聚会。倪柝声在《往事的述说》中也作过类似的叙述。一方面芮文派有人与倪柝声有接触；另一方面，神借着弟兄会早期领袖柏勒（J. G. Bellet）的著作《神的儿子》（The Son of God），驳斥了芮文派头目詹姆斯·戴勒的异端。历史学家挪尔（Napoleon Noel）在《弟兄会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Brethren）一书中这样说：「柏勒所著的《神的儿子》，被神大大使用，实在是神的怜悯，借这本书拯救弟兄们脱离异端，并持守神的真道。」

在哈同路的福音书房，及时地出版了《神的儿子》的节译本，该书由缪安信姊妹翻译，而倪柝声则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为该书写了序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英国芮文派的查理·巴露（Charles Barlow），他任职的工程公司，正好差派他到香港办事；芮文派就托他到上海哈同路看看聚会处的性质。查理·巴露听见倪柝声、张光荣和一班弟兄们，声称他们脱离了宗派，完全归于主的名下。查理·巴露听了，就觉得很稀奇，因为禁闭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芮文派，素来自称「圣徒聚集以归于主的名下」（Saints gathered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有别于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他们一向确认自己为新约模式的基督徒聚会 New Testament Companies of Christians。

自从弟兄会的祝康宥离开上海之后，如今有另一弟兄会的查理·巴露到临，正好弥补了倪所企盼的属灵同伴的空缺。不同的是，祝康宥来自信仰纯正的弟兄会，而查理·巴露却来自新冒起的、散布异端的、以詹姆斯·戴勒为首的芮文派。

倪柝声这时仍未透彻了解到，弟兄会的内部派别林立、分门别类、派中有派。倪安排查理·巴露，每天下午四点，在哈同路聚会处，向四十多位信徒讲道。查理·巴露讲的内容属一般性题目，乍看不偏不倚，并没有涉及圣子的位格问题。至于英国那边芮文派的信徒，接到查理·巴露的信件，获悉中国也兴起了一批同路人，大受鼓舞。

查理·巴露回到英国之后，将他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处的所见所闻，发布到英国和与他们芮文派有关的各地聚会。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芮文派共有八位代表，抵达上海探访哈同路的聚会，他们是，来自英国的查理·巴露和美佑夫妇（Mr. & Mrs. A. Mayo）；来自美国三藩市的鲍威尔博士（Dr. Powell）；来自澳洲的乔埃斯妇（Mr. & Mrs. Joyce）、菲力普斯（Mr. Phillips）和豪斯（Mr. W. J. House）。

在这八位芮文派弟兄会的代表参加擘饼之前，倪柝声特别声明，哈同路只接纳他们个人，纯是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交通，并非弟兄会的芮文派和哈同路聚会处的交通。倪柝声郑重宣告，除了在众圣徒所共有的交通，不愿有另类的交通，就如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话虽然这么说，倪柝声对芮文派的接待，还是非常隆重的，他于同年十一月间，召开特别同工聚会，由查理·巴露和豪斯主讲，倪柝声任翻译。

一九三三年六月，倪柝声应邀访问英国，参加芮文派的年会。在英国时，倪柝声在查理·巴露的陪同下，访问了芮文派散落在英国几处的聚会，并会见了芮文派的领袖詹姆斯·戴勒。詹姆斯·戴勒亲自陪同倪柝声，横渡大西洋，到彼岸访问芮文派在美国几处的聚会，倪柝声还应邀在西田（Westfield）的聚会中讲道。

詹姆斯·戴勒和倪柝声的多次谈话，显示了两人在信仰上的差异。芮文派是闭关的，而倪柝声在伦敦时，则私下到伦敦贵橡路（Honor Oak Road）的基督徒团契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聚会；在

美国时，又到纽黑文（New Haven），在长老会传教士单惠泉（Thornton Stearns）家里参加擘饼聚会。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伦敦的芮文派弟兄会写信给哈同路的负责弟兄，指责倪柝声在伦敦和纽约期间，违反闭关弟兄会的规则，和不同立场的基督教团体有交通，甚至和彼等一同擘饼，芮文派要求哈同路的负责弟兄给予一个适当的解释。

紧接着，芮文派的负责人詹姆斯·戴勒，从美国纽约，直接写一封私人信件给陆忠信，指出倪柝声没有认真恪守闭关弟兄会向来持守的严明立场。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哈同路的负责弟兄，由杜忠臣、吴锡佑、张光荣具名，指出当年接待芮文派的八个代表在哈同路擘饼时，聚会处已经郑重声明那次的接纳，是接纳个人，而非确认两个团体的合并。

芮文派接信后，非常不满，向哈同路的聚会处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聚会处若不认错，芮文派要与倪柝声带的聚会断绝来往。为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倪柝声，和杜忠臣、吴锡佑、张光荣联名，指出信徒只有道德上犯了罪，教会才可以拒绝信徒参与擘饼，至于有弟兄若对预言解释不同，以及弟兄们和不同团体有接触，不能作为排斥弟兄们擘饼的根据。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伦敦芮文派召开大会，包括三名到过哈同路的弟兄，认为倪等的态度傲慢，无法接纳；同时指出芮文派与贵橡路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的性质不同，不可能有属灵的交通。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伦敦芮文派由查理·巴露（Charles Barlow）、莱因（Percy Lyon）、加丁纳（Alfred Gardiner）署名，正式割断与哈同路聚会处的一切关系，并断绝彼此之间的交通，不再相互接纳一起擘饼。

有一点必须澄清的，即倪柝声在一九三五年七月的《通问汇刊》第十二期，所登载的《覆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是发表给国内的弟兄姊妹看的。第一，没有注明日期；第二，局外人不知道伦敦罗区福街英文何所指，明确一点，应是罗区福街二十五号，英文原信是 To the Saints at 25 Rochford Street and Elsewhere in London。末了，英文原信署名只有四位：分别时 D.C. Du（杜忠臣），Y. A. Wu（吴锡佑），W. Nee（倪柝声），K. Y. Chang（张光荣）。而在《通问汇报》登载的，代表上海哈同路北四川路聚会的弟兄们，顺序是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张光荣。信件全文请查阅基督徒出版社出版的《倪柝声书信集》。

从芮文派弟兄会和哈同路的分手，看到了神实在恩待了中国的教会，使国内的教会不至陷入詹姆斯·戴勒所传的异端里。几年后，弟兄会终于有人被神兴起，把詹姆斯·戴勒一伙人从纯正的弟兄会开除出去。

第六章经历神的医治大能

倪柝声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得了肺结核病，这病断断续续，缠绕他达十年之久，至终肺结核得着医治；但肺病期间，即一九二七年间，他又得了心绞痛，这心脏病如一根刺，在肺病痊愈后伴随着他，至离世为止。

无论如何，倪柝声的肺病，从人的眼光看来，严重到无法可医，可说群医束手无策，但是神却在他身上彰显了大能；甚至在数度传出他因肺病去世的谣言之后，他仍然活在人间，不能不说是一项神迹。

以下是倪柝声所作的见证：

「一九二四年我在厦门时，开始患病。起初只有一点热度，浑身觉得无力，胸部有点痛，只是不知道患上什么病。该地的王和声医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有信心，相信神能医治你，但你可否让我检查一下，看是什么病？王和声检查我的胸肺后，就低声对王灯明弟兄说了一些话，只是不向我明言。我向他们说，直谈好了，我不怕，王和声于是说，我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恐怕要长休息，以免病情急转直下。

「当晚我辗转难眠，无法入睡。想到工作未完，即将回去见主，似乎对主不起，心情未免沉重。我于是离开厦门，告别王灯明等同工，到福建乡间休息，与主多有交通。我寻问主说，到底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如何，是保留我生命，或是要我回天家见你？若是你要我为你舍命，我死也不畏惧。约有半年之久，我摸不着主的心意，但我心中有喜乐，相信主的定规总不会错。那些日子全国各地多人来信，不是对我说劝慰的话，而是责备我工作不知节制，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有一位弟兄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的话责备我，该节经文是：『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不久，南京的成寄归弟兄请我到他家，一面休息，一面帮助他翻译司可福的圣经函授课程。日过一日，肺病未见痊愈，虽然勉强作一点文字与查经工作，但甚为吃力。每日下午发烧，晚间失眠，常出冷汗。有位弟兄劝我要多休息，我答说，我唯恐会休息到生锈的地步，我想到自己横竖活不长了，应当一面信靠神加我力量，一面为祂作工，我问主有否什么未了的事要我作的。主若要我作未了的事，就求主留我的性命，不然，世界对我也没有何可留恋的。我把司可福的函授课程只改了头四卷，就痛得作不下去了。我本来还能起床，以后就不能了，有一次被人请去领传福音聚会，我勉强起来，求主加我力量。我在赴聚会的途中，常常要抱住电灯柱稍为休息。我每次抱电灯柱休息时，我就对主说，主啊，我为你而死，实在是值得！有些弟兄知道我这种患病的情形，责怪我不懂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我总是说，我爱我的主耶稣，并且愿意为祂舍命。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祷告，我觉得应当将我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写成一本书。以前我以为一个人要到老年时才可以写书；但那时我以为自己快要离世了，所以必须开始写书。于是我在江苏省无锡城租了一个小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终日写作。那时我的病开始加剧，连躺下来都不能。我写的时候要坐在一张高背椅子上，胸部顶住桌子，以减轻胸部疼痛。撒但对我说，你既然快要死，何不死得舒服点，何必如此受苦？我说，是神要我这样，你退去吧！经过了四个月，我写完了三卷《属灵人》，在写作期间，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和眼泪；在生命无可指望中，神的恩典都将我带领过去。每次写作后，我都对自己说，这是我对教会最后的见证。虽然是在百般的艰苦中写作，但我觉得神对我非常亲近。人以为我是受神的折磨。成寄归从南京来信对我说，你如此拼，终有一日会后悔。我回信说，我爱我的主。我在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光景，正如我在《基督徒报》二十四期所述说的；『我这年中的身体软弱，几乎是到处知道了，并且，有三个地方竟有我地上帐棚已经毁坏了的讹传，因此，我所得的代祷也比往常加多了。我真是感念着那些关心我身上事的人！自然，往日的精力好像衰败许多，平易的工作好像也很快叫身体觉得其担负；但是，感谢神，因为今年的日子究竟还是工作的日子。与其休息而生锈，何如劳碌而信靠。应许的力量在必需的时候，还是没有减少的，这是不能不感赞我主的。』

「《属灵人》出版以后，我在神面前祷告说，如今请让你仆人安然去世！那时我的病恶化了，夜间不能安睡，晚上醒来，在床上翻来覆去，骨瘦如柴，夜间盗汗，声音嘶哑。人听我说话时，将耳朵放在我口边也听不见。有几位姊妹轮班服事我，其中有一位是老练的护士，一见到我就哭起来。她作见证说，

我看过很多病人，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可怜的光景，恐怕只能活三四天吧！有人将这事告诉我，我就说，就这样苟延残喘吧！我自己也知道快要死了，有一位弟兄打电报给各地教会说，我没有希望了，不必再为我祷告。

「有一天我问神说，为什么这么快召我回去？我在神面前认罪，因怕我还有不忠的地方。同时我也告诉神，我没有信心，那一天我专一地禁食祷告，也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答应神只作祂派定给我的工作。那一天我禁食，是由早晨起到下午三时，同时，在上海的同工们，也在李渊如姊妹家，为我迫切祷告。我向神祷告，求祂给我信心，祂就给我话语，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第一句：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而活；第二句：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凭信而立；第三句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因信而行。这几句话使我充满了喜乐，因为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感谢赞美神，因祂已经给我话语，我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

「试验立刻就紧跟着来。圣经说，凭信而立，但我还躺在床上。这时我心中交战，是要起身站立，还是继续躺卧在床？人到底是爱自己，以为躺在床上死，总比站着死舒服一点。但是神的话发出能力，我就不顾一切，穿上我一百七十六天未穿过的衣服。我下床要站立起来，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撒但对我说，你连坐都不能，还想站立起来？我说，是神叫我站立。我就站起来，全身又出冷汗，几乎倒下去。我一直说，凭信而立，凭信而立！我就走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穿好了，我就坐下。一坐下，神的话又来了，叫我不只凭信而立，还要因信而行。我觉得我能起床，并走几步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已经是了不得了，我怎能希望再行走呢？我就问神，你要我往哪里去？神说，你下楼梯到二百十五号李渊如姊妹的家里去。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为你的病已经禁食了两三天。我以为在房间里走走也许可以，我怎能下楼梯？我祷告说，神啊，我凭信能站立，我因信也能行走下楼梯！我立刻走向通往楼梯的门，把门打开。我老实告诉你们，当我站在楼梯顶的时候，我看那是我一生所看见最高的一道楼梯。我对神说，你叫我走，我纵使死了，我也要走。但我接着对主说，主啊！我走不动，求你用手扶着我走。我扶着栏杆，一阶一阶地走下去。我的全身又冒出冷汗，我一面走，一面喊着说，因信而行，因信而行！我每走下一阶，我都祷告说，主啊！是你叫我能走！在信心中，我似乎是与主手拉着手，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阶的楼梯。下到楼梯底时，我觉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后门，开了门，一直向李渊如姊妹的家中走去。我对主说，从今以后，我因信而活着，不再是个躺着的病人了。我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那样地叩门，只是没有罗大出来应门。门一开，我走进去，七、八个弟兄姊妹注视着我，不出声，也不动。大家安静坐着，约有一小时，如同神出现在人间。我也坐在那里，心中满了感谢和赞美。以后我就作见证，向他们述说我蒙医治的经过。大家灵里畅快喜乐，高声赞美神奇妙的作为。那天，我们租了一辆汽车，到郊外江湾去见著名女布道家余慈度。她看见我，觉得非常惊奇。因为她不久前才接到我快要去世的消息。我的出现，被当作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在主面前，我们又有一番的感谢和赞美。那一周的主日，我在讲台上足足讲了三个小时。」

一九二八年七月，倪柝声弟兄在《复兴报》第四册，虽然没有向读者详述他大病得痊愈的整个过程和细节，却在《公开的信》中，说出「在才过的日子中，我真是感觉前所未有的软弱，真是叫我看除了神的恩典之外，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

倪柝声虽然在一九二八年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拜访余慈度，见证神医治的大能。但在该月的《复兴

报》第六册，由李渊如执笔的《代启》中，李渊如吐露了倪柝声在那一时期的危急情形。

「在这个时期内，我们的弟兄倪柝声，竟然是度着兵凶战危的生活！当他写《属灵人》时，是如何在撒但的齿缝间度日；当《属灵人》写成之后，撒但更是竭其阴府的权势，想把我们的弟兄打到一败涂地，好使《属灵人》的见证都归于空虚而后已！这样的战争，好像真是旷日持久，要使我们唱悲歌的了，但是，我们慈爱的父亲，得胜的救主！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候，领我们的弟兄在升天的地位里，胜过了仇敌猛烈的攻击！我们今天含着欢欣的泪向主感恩！」

倪柝声病愈之后，听到有一个德国医生的家拍卖东西，他就到那里去，一经查问，才发现这位医生多年前曾为倪的肺部照 X 光。当年该医生拍了三张菲林，并告诉倪没有存活希望了。倪请该德国医生再拍一次，医生说，不需要了。医生于是拿了一张另一个肺病人的 X 光片给倪看，说这个人的情形比你的情形好，但他拍这张 X 光片后回家，两周内就死了。你不必再来见我，我不想赚你的钱。倪柝声当年听了就非常失望地回家去。事隔四年，倪柝声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某某德国名医去世，要拍卖房子和家俱。当他查问到这位德国名医是拍过他肺病 X 光照片的那位时，倪柝声这样叙述：

「我举起手来，赞美主说，这位医生死了，他曾断言，我将不久人世；现在，他反而先我而去，倒下来死了，主啊！你真是恩待我，我感谢你！靠着主的宝血，容让我这样说，在人眼目中，这位医生比我强壮，可是他竟先我而死了；我倒因着神的医治，仍然活着。」

倪柝声对神医治的大能，有透彻的认识和充分的经历。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在鼓岭时，他亲自作见证：「我有肺病，腰子病、肝病、现在还有心脏病。一九二三年我头一次患上腹膜炎，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一呼吸就发痛，热度甚高，很是痛苦。那时缪绍训弟兄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为我祷告。他祷告时我不觉得什么。当和受恩教士祷告说，主啊，坟墓里没有人赞美你，弟兄若是死了就不能赞美你。她这样一祷告，我心里就通了，但热度还是那么高，里面还是那么痛，但我有了神的话，不看病状，因神是信实的，第二天我就起身，走到罗星塔编了一期的《基督徒报》。」倪柝声对于疾病，归纳为三点：若没有神的话，就不能试探神；若有神的话，就不要看病状；若有神的话而不是立刻医治，则祂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难处除去，而是恩典加多。主没有意思让我们生病，又不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在鼓岭的当晚，倪柝声向同工们，引名布道家斯敦利（Charles Stanley）为例。倪这样说：「斯敦利只有三分之一的肺，但他却作露天布道的耗力工作。人少的时候，有两三千人，人多的时候有六七千人，他传了三十年。他有神的话，叫他能作这样的工作，一点没有问题。但若是没有神的话，他这样作，就是等于自杀。倪柝声对疾病的结论是：保罗虽病，但他所作的工比任何人都多。疾病没有限制保罗作工，疾病也绝不能拦阻我们事奉神。要学习简单地把自己交托给那忠诚的、信实的主。主会按祂所认为好的来对待我们。」

第七章娶了贤慧的妻子

一九二〇年间，倪柝声信主还没有多久时，他觉得自己缺少圣灵的能力，他于是到白牙潭向和受恩教士请教。和受恩说，要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将自己奉献给神。和受恩并向倪柝声说了浦力金（Mr. Prigin）的故事。浦力金在牧会期间，攻读哲学博士的学位，认为以博士头衔来事奉神，会叫神得荣耀；但

是浦力金在面临最后一次口试前，心里一直不平安，一直得不着圣灵的充满。到最后，浦力金向神降服，放弃博士学位，第二天讲道时，只述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结果全体会众眼泪盈眶。浦力金成为神大用的仆人。

倪柝声听了这故事，彻底地对付罪，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向二、三百人认罪，以便除去自己与神之间的间隔，但他依然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

一九二二年一月，有一天，倪柝声准备讲章时，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经文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读到这里，倪柝声承认自己内心另有爱慕。有一女孩子妨碍他和主耶稣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个女孩子叫张品蕙，十多年来，倪柝声一直深爱着她。倪家和张家是三代的世交。在倪柝声得救之后，就尽力地向张品蕙传福音，张品蕙非但不接受主，还倒过来讥笑倪柝声，取笑倪柝声所传的主耶稣，这使倪柝声感到很沮丧。尽管如此，倪柝声的内心仍深深地爱着张品蕙。张品蕙在倪柝声的心里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张品蕙此时追逐时尚，既化妆，又打扮得很摩登，和当时聚会处的姊妹们的朴素作风，很不相称。那一天，倪柝声才发现，他口头上说要彻底奉献，心里头却有所保留，在他心的深处，他仍无法放下她，他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天，倪柝声虽然硬着头皮，上讲台讲了一篇道，但是他不晓得自己讲的是什么。整整一星期，倪柝声和神挣扎，他并确实知道，他对张品蕙的爱慕，成为他被圣灵充满的拦阻。

一星期后，倪柝声以沉重的心情求神改变祂的心意，允许他继续爱慕仍未信主的女朋友，但是神坚持祂的要求，于是倪柝声求基督的爱充满他，他愿意放下他心爱的人。

几天后，当基督的爱摸着倪柝声时，他真能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那样对主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这一天，倪柝声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下面是他自己的见证：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爱人放下，基督的爱那样地激励了我，使我决心将她放下。作了这决定之后，我能从心里说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来了，我里面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我虽然没有上到第三层天，却能说我已到达了第二层天，我真是充满了喜乐。现在世界对我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好像是飘浮在云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脱落了；而这一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在我心里所有与主之间的障碍都挪开了。在这一天之后，我得着了圣灵的能力，许多人相继被我带领得救了。」

在倪柝声放下心爱的人张品蕙之后，他受感写了一首诗歌。

一 主爱长、阔、高、深！ 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 怎能满被恩泽？

二 我主出了重价， 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 忠心一路跟祂。

三 我今撇下一切 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 有何使我回顾。

四 亲友、欲好、利名…… 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作苦贫， 我今为主亦穷。
五 我爱我的救主； 我求祂的称是；
为她之故安逸变苦， 利益变为损失。
六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稣！
除你之外在天何归？ 在地何所爱慕？
七 反对、艰苦、飘零， 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爱情， 绕我灵、魂、身体。
八 主啊，我今求你， 施恩引导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 过此黑暗罪世。
九 撒但、世界、肉体， 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 恐将貽羞你名。
十 现今时候不多， 求你使我脱尘；
你一再来，我即唱说：「阿利路亚！阿们！」

倪柝声和张品蕙分手之后，倪柝声多年时间在上海服事主，张品蕙则到北京燕京大学攻读生物，并得硕士学位，几年后品蕙学成回上海，也得救信了主。因着主的美意，张品蕙一直云英未嫁，并于一九三四年参加上海的聚会，距离倪弟兄因舍她而作的《主爱长阔高深》，已相隔十二年。此时，倪柝声认定，他为主的缘故所放下的，神重新赐给他作配偶。正如腓利门书十五节所说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两人于是谈及婚事，只是张品蕙的姑母张美珍认为倪柝声只是个穷传道，高攀不上张品蕙，这使倪柝声对婚事诸多顾虑，不敢贸然进行。在这关键时刻，倪柝声的弟弟倪怀祖打电报到福州，给倪的父母倪文修夫妇，要他们不顾张美珍的阻挠，为倪柝声主持婚事。倪氏一家人均关心倪柝声的婚事，因他已是三十岁。

倪林和平姊妹一到上海，就去约见张品蕙的合法家长张汝霖，张汝霖与张美珍的态度正好相反，他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只要我侄女品蕙答应，我绝不反对。不过他关注地查问倪林和平有关倪柝声的生理状况，他说，风闻令郎身子不好，是否属实？倪林和平据实地说，柝声早年患过肺病，已经康复，不过他一直患有心脏痛，随时有夺命的可能，只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生命气息掌握在神的手中。张汝霖听了说，既然这样，只得听天由命吧！张汝霖并答应说，到了婚期，他就到杭州来主婚。张汝霖虽答应张品蕙的婚事，但倪林和平姊妹觉得还需要印证神的心意，她在《恩爱标本》一书中这样叙述：

「我觉得我应当与这位未婚媳妇有相当的接触，看她属灵的情形到底如何。我也祈求神，若是祂的旨意叫她作我的媳妇，就求神使我能爱她过于爱我自己的女儿。因此我就向张家请求，要品蕙告假与我一同到杭州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得胜特别聚会。感谢神，祂成就了我的心愿，我有机会与品蕙在杭州同卧一房达一星期之久，我们同宿同祷告。有一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见她真是神所预备给我儿子作妻子的，我感谢祂，到了十月十九日，他们两人就结婚了。这日子正是我丈夫与我结婚的日子。」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杭州得胜聚会结束。两日后，倪柝声举行结婚。婚礼是由男方家长倪文修和女方家长张汝霖主婚，证婚人是来自长春的老弟兄田品方。参加婚礼的有二百多人。

我的父亲（陈则信）也在杭州参加婚礼，他在《倪柝声弟兄简史》里，对于这桩婚事作了详尽的叙述，说倪柝声的婚事使倪遇到不少的难处，后来甚至弄得满城风雨，叫许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影响，在《简史》中，我们得知张品蕙的姑母张美珍，把张品蕙从小抚养大，有意将张品蕙许配给一个世界上有名望、有财富、有地位的人。所以倪柝声虽然对张品蕙有感情，为了不拂逆张美珍的意思，一直拖延这桩婚事。

当初倪柝声知道母亲决定在杭州特别聚会结束的日子为他举行婚礼时，倪柝声大吃一惊。他深知在张美珍的反对下，一旦与张品蕙结婚，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他于是打算一领完聚会，就逃婚。但是有几位同工反对倪逃婚，有一个同工声色俱厉地对倪说：「你若逃婚，对你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想到，张品蕙姊妹在结婚的日子，新郎跑掉了，那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这位同工又警告倪弟兄说：「如果你走掉的话，我们就不与你同工了。」

家父在《简史》中，又这样忆述：「倪弟兄不得不接受环境的安排，举行了婚礼，他事先毫无准备，他穿了一件长袍，后面还破了一个小洞洞，他讲道时穿的是那一件，结婚的时候穿的还是那一件。婚礼完毕，倪柝声夫妇就回到了上海。」

倪柝声回到上海后，张美珍威胁说，倪柝声若不按风俗礼仪去拜访她，她就要用办法对付倪柝声。倪柝声觉得不能在威胁下屈服，也就没有去拜访张美珍。

结果张美珍不惜金钱，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连续一星期刊登启示诋毁倪柝声的品德，从各方面彻底毁谤倪柝声，她又在众信徒之间广泛派发单张，破坏倪柝声的名誉，使倪柝声精神上深受打击，几乎抬不起头来。他被迫携带新婚的妻子，远离上海，退隐在远地，有几个月停止了公开的讲道。在事态稍为平息后，倪柝声跟大约十位同工，在杭州西湖，查读了雅歌书两星期，该次讲道记录后来辑印为《歌中之歌》。

第八章获闽南一带同工的支持

翻阅倪柝声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左右他一生的，是一批属灵的女强人，包括倪的母亲倪林和平、余慈度、和受恩、李渊如、汪佩真等。

汪佩真从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就宾士各地传福音。汪佩真经常在半夜三时起身守晨更。她屈下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虽然年纪很轻，膝盖已经变成瘀黑。她对主的忠贞至为感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汪佩真应邀到山东烟台美南浸信会礼拜堂讲道，有些年轻人对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传道人传福音，感到好奇。那天汪佩真讲的是埃及的法老如何奴役和操纵以色列人，正如撒但今日如何奴役和霸占世人。汪佩真的讲道是如此带有圣灵的能力，以致她的信息抓住了许多人，令他们受感动归向了基督。

由于汪佩真对主忠心，在一切的事上都把荣耀归给神。有一次她重回烟台，见那里的弟兄姊妹正在痛哭流泪，为病危的一个负责同工祷告，她们执意要求神医治这个负责同工。

汪佩真看到这情况，不留情面地指责当地的负责弟兄们：「你们在神面前这样表现是恰当的吗？烟台的教会是私人的吗？还是教会是神手中的工作？你们简直以个人作为教会的偶像了！如果你们再不认罪

痛悔，神也许会拿去你们的偶像，来复兴烟台的教会。」烟台的教会的其它负责人一听，就幡然醒悟，认罪悔改，不再认心目中的偶像求神医治。

现在谈一下倪柝声一九二六年春天在福建南部一带事奉的情况，底下是家父陈则信的叙述：

「主带领他到厦门开特别聚会，然后又到漳州领会。那时我恰好在漳州的浔源中学读书。他去的时候，年纪才二十四岁。我们的校长见他年轻，就看不起他，以为一个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领什么奋兴会，作他的学生倒是差不多！倪弟兄未来之前，学校里的祈祷聚会，常为他领奋兴会的事祷告。……他步上讲台后，穿着蓝布长衫，一坐下来就低着头默祷，什么都不看，只在那里祷告。他倚靠的不是自己的口才，乃是神的话语。当他讲了五分钟道以后，会场的空气就改变了！全体学生都聚精会神地留心听。散会时，众人都非常惊奇！因为他的讲道，就如经上说：正像有权柄的人。……最末了一晚，就是让这几晚蒙恩得救者作见证的聚会，许多人争先恐后地起来述说所蒙的洪恩。那时写赞美称谢的声音，充满了整个会场！漳州城的教会便有了空前的大复兴！

「在那次漳州大复兴时，漳州城四间礼拜堂的光景完全改变了。本来聚会死气沉沉的，现在充满了生命，许多信徒生活改变，灵性上有进步。」

家父陈则信从漳州浔源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厦门的闽南圣道专门大学攻读神学，装备自己，以便日后出来事奉。

倪柝声在自己的本家——福州，即他开始聚会的仓前山十二间排聚会处，受到王载等同工的排斥，却在福建南部得到广泛的同工们的支援。闽南一带教会的同工，包括厦门的王灯明、先父陈则信，漳州的吴仁杰、韩进修，同安的陆忠信、邓志诚、蔡志崇。

这些闽南的同工，始终站在倪柝声一边。即使在倪柝声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也一直扶持倪柝声，从来没有背弃他。

当倪柝声与李渊如、汪佩真等在上海有了新的起头，而聚会处发源地的福州十二间排的聚会，却逐步疏远了倪柝声。某些福州的同工，甚至一度断绝了和倪的属灵交通。因此，家父陈则信等闽南同工，这么多年来取的取态和立场，无疑地对倪是一种激励和安慰。

一九三五年，倪柝声在季永同、朱臣两弟兄和汪佩真姊妹的陪同下，在福州南部漳州吴仁杰弟兄的大院子举行特别聚会。根据先父陈则信的见证，那次特别聚会，蒙恩情形还超过已往在上海、杭州等地举行的几次得胜聚会。倪柝声在那次泉州聚会之后，特别邀请家父陈则信到上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倪柝声和闽南一带同工的关系。我们一家五口——一母亲加上我哥哥、本人和大妹，于是于一九三五年底迁居上海。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因着汕头聚会的主要负责弟兄姜子航出了事，我父亲（陈则信）才携眷离开上海，被倪柝声安排到汕头去服事教会。对倪柝声本人来说，他生于汕头，对汕头一直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倪安排先父一人兼顾闽南一带和潮汕一带的教会，显示倪柝声一直非常器重先父。

我们一家住在汕头期间，由于倪伯母——倪柝声的母亲——有时从上海南下汕头，在饮食上经常指定吃一些合她自己口味的菜肴，我的母亲（陈张雅淑）有时觉得穷于应付，但母亲说，她因此从倪伯母那里学到不少厨艺。

一九四〇年，我父亲到东南亚一带布道，之后足迹遍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一带；二次世

界大战后他更把我们一家大小，带到暹罗曼谷。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父亲从鼓岭下山后，仍兼顾闽南一带和泰国的各地教会。一年后，倪柝声对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被他电召到香港负责教会事工的，仍是闽南同工——我的父亲。倪柝声从不忘怀闽南一带同工们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

第九章认识了史百克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一八八〇年生于苏格兰（Scotland）的丹伦（Dunoon）；父亲是英格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不过，史百克从幼年开始，就自认是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歌剧团的经理人（impresario），自小耳濡目染的是舞台艺术、音乐演奏等等。至今没有人查考到，他的父亲是否重新得救，是否真正重生。

但是史百克的母亲却是一位真正敬虔的爱主的姊妹。她爱慕主，不断地祷告，对主有无比的忠贞。她属于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中的艾文派（Irvingites）。

艾文派的称谓，是对那些追随艾文（Edward Irving）的信徒而说的。艾文实际上，一直被称为灵恩运动（the father of charismatics）的父辈，他坚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艾文对使徒行传中记载的圣灵的浇灌深信不疑。在一八四〇年左右，艾文所带起的复兴运动扩及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带。

史百克从小看到母亲定时参加祷告聚会，在母亲的感染下，他坚信神的话语是一切信仰的根据，是最高权威。史百克在十七岁那一年，仍未清楚得救，在一个主日下午，他走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街道上，听见一些青年人在作露天布道。他听了大受感动，母亲多年来在他潜意识里所播下的福音种子突然间绽开了。当晚，他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救主；他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耶稣。重生后一星期，即下一主日，史百克就加入那些青年人，作露天传福音的工作。

再过一两星期，他开口作见证，简述自己如何归向基督。信主后，他看到了受浸的真理，就脱离苏格兰教会，接着他受了浸，后来他分别在浸信会和公理会被按立为牧师。在浸信会和公理会两个宗派，他都被肯定为一个合格的牧师。

本人曾在《摩根小传》中，述及坎培·摩根（Campbell Morgan）是二十世纪初叶最卓越的解经家，被变誉为「解经王子」。该书又述及摩根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担任主任牧师期间，每星期都主持解经聚会。当年参加解经聚会的，不乏年轻的教牧同工，内中就有史百克。史百克可说是摩根最有恩赐，和最优秀的门生之一。那些日子，英国许多教堂，都争恐后地轮流聘请史百克为讲员。

后来，史百克担任贵橡浸信会（Honor oak Baptist Church）的牧师；没有多久，整个教堂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挂名的教友，包括教堂的文书、执事，一个跟着一个，清楚得救。整个教会的属灵气氛焕然一新。这一期间，每星期二，史百克都乘火车到伦敦市区，和两位追求主的弟兄——一位政府官员伯得逊（George Paterson）和一位元工程公司职员岱勒（George Taylor），一起祷告读经。

有一天，史百克接到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的信，邀请史百克参加为期三天的伦敦教牧同工聚会（Workers' Conference），史百克就去赴会，第一晚他坐在最后一排。宾路易师母一讲话，史百克就

在神的光照下，愈听愈进入圣灵对基督的丰满的启示。不久后，史百克转来与宾路易师母同工。史百克的功用是这么显著，使宾路易师母视史百克为属灵的接班人，每当宾路易师母往欧洲大陆传道时，伦敦的讲坛就由史百克担任。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带领了当时的得胜运动（Overcomer Movement）。

史百克和宾路易师母走在一起的时日不长，一九二六年，史百克和伯得逊、岱勤在奥格夫人（Lady Ogle）的支持下，开始在贵橡基督徒交通中心（Honor Oak 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有聚会。

倪柝声最初是从和受恩教士口中听到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的名字的。当和受恩一九〇八年再度从英国重返中国时，和教士在余慈度的敦促下，征得宾路易师母的同意，准许将宾路易师母在《得胜报》释放的信息，译成中文发表。

在倪柝声出来服事主后，和教士和余慈度同认为，最适当翻译宾路易师母信息的人选是倪柝声，于是在倪柝声主编的《复兴报》，常有宾路易师母的文章登载。倪柝声后来又从英国的属灵刊物《得胜者》（The Overcomer）知道了史百克这个新人。史百克与宾路易师母后来虽然分道扬镳，却并没有影响倪柝声对史百克的敬仰。实际上，史百克以基督为中心的亮光，成为倪柝声末后一段日子的主题信息。

一九二九年初，倪柝声到罗星塔拜访和受恩教士，事实上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的晤面。此时，和受恩教士对倪柝声紧跟《直道》这本弟兄会书籍的教训，感到不安，她甚至觉察到芮文派弟兄会的詹姆斯·戴勒的教义，混杂着异端的成分。

和受恩把史百克主编的《见证报》（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拿给倪柝声看，说这一年她从《见证报》得着很多供应。史百克有关十字架的信息，颇有宾路易师母的风格，但是史百克爬得更高。史百克的信息登上高峰，让基督在一切上居首位。

一九三三年六月，倪柝声应美国芮文派弟兄会的邀请，到英国访问芮文派在英国的数处聚会。访问期间，倪柝声在百忙中仍不忘和受恩教士的推介，悄悄地跑到贵橡路十三号基督徒交通中心去拜访史百克。史百克恰巧此时不在伦敦，由其它两位负责弟兄——伯得逊和岱勒——接待。正如前文所述，倪柝声和贵橡路的接触，掀起了轩然大波，芮文派在兴师问罪之后，正式宣布与倪柝声决裂。

当一九三八年七月，倪柝声再度访问英国时，他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地与史百克交通。从此，两人一直有信件往来，倪柝声并尊称史百克为年长的弟兄。倪柝声这样说：

「神叫史百克看见一件事，即神一切的中心都是在基督身上。基督乃是神的中心，也是神的普及。神所有的计画，都离不开基督。我们应该少提那些零碎的真理，以及那些引起纷争的道理，我们应该在各方面叫人看见主是在万有之上，不让自己有地位，让神的旨意——基督——能在我们身上得着成全。」

倪柝声在英国期间，认识了英国一位元贵族的遗孀奥格夫人（Lady Ogle）。若非奥格夫人奉献一笔巨款，买下伦敦东南部贵橡山（Honor oak Hill）一所空置的学校，作为基督徒交通中心，史百克不可能在一九二六年脱离宾路易师母之后，一下子就自立门户，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将他在英国的事工，扩展为国际性的职事。史百克所出版的《见证报》，使数十个国家地区的信徒得益。

一九三九年中，倪柝声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并在德文兰（Phyllis N. Deck）和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her）两位姊妹的陪同下，离开英国。倪一到上海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召开同工聚会，信息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奥格夫人财政上的支持下，倪柝声开始培训国内各地的同工，先后在上海蒲石路友华村七号、十二号、十三号和愚园路七四九弄八十一号租下房子，开办「基督徒交通传道处」，仿照史

百克主持的「基督徒交通中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触发了太平洋战事。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业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同工们的生活，端赖教会的照顾；不过，寄望信徒十一的奉献来维持，实有困难。倪柝声给一位同工的信中这样说：「教会的事务和这世界上事，都压在我的身上，超过我所能胜任的，但我仍要靠着主往前走。」

一九四二年初，倪柝声认为，他的弟弟倪怀祖在澳门经营的生化药厂，地理位置不适中，不能作全国性的市场推广，应该迁移到全国的工商业中心上海。

许多坊间传闻，说倪柝声访问英国回来，才成立生化药厂。事实是，在倪柝声二度访问英国之前两年，即一九三七年，他的弟弟倪怀祖已经在澳门经营生化药厂，生产一些家庭便药。而一九三七年倪柝声、倪怀祖的母亲，当时住在九龙深水埗石峡尾街39号三楼，曾不时前往澳门探访倪怀祖。

一九三九年五月倪柝声从英国回到上海时，倪怀祖仍在澳门主持生化药厂。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倪伯母、汪佩真和我父亲曾从香港前往澳门，会晤了倪怀祖；那时澳门有聚会，参加聚会的就有五位是在澳门生化药厂任职的弟兄。

一九三九年八月，倪柝声弟兄在上海主持特别聚会，我父亲才离开香港，前往上海赴会。

由于汪佩真，我父亲知道生化药厂在偏远的澳门，无法开展业务。上海生化药厂引起是非时，李渊如也有意见，但先父和汪佩真都保持缄默，这也许与他们两人赞成生化药厂从澳门北迁上海有关。

英国的奥格夫人（Lady Ogle）虽曾奉献款项给倪柝声，但其数目终究有限，不足以作为扩充生化药厂和添置机器、设备、厂房的庞大资金。生化药厂的资金来源，不少是聚会处的信徒认股筹来的，但绝大部分来自倪柝声的堂兄倪树祖。倪树祖是上海市中国银行行长。倪柝声后来一度没有专职事奉，却抽身主持生化药厂业务，成为他一生备受争议的话题。

第十章 职事的恢复

一九三九年底，为了安置外国差派到中国的同工，倪柝声提议购买了亚尔培路培福里的凡尔登公寓的两套房子，作为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居所。另一方面，倪柝声也关心国内同工们的生活需要，在全国两百位同工中，差不多有四十位是由他直接照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聚会处的外国籍同工们全部被日军关入集中营。至于东北各地的聚会处，因拒绝向日本东京帝宫遥拜，受到残酷的镇压。在上海，日本兴亚院牧师阿木、铃木等筹组基督教华东教团，但上海聚会处同工们、长老们坚持爱国立场，拒不参加，并停止文德里的所有聚会，长达一年半之久。至于聚会处的擘饼聚会，则搬到常熟路荣康别墅俞成华弟兄家里举行。（上海的分家聚会是在胜利后，为了交通方便，于一九四八年，才分到十六家去的。）

倪柝声一面在经营企业，一面又要以传道祷告为事。这种角色的冲突，遂引起上海长老们的质疑和困惑；此外，他又将生化药厂扩展到大后方重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两头奔跑，往返于上海、重庆两地。

这里有必要用一点篇幅讨论一下，神仆倪柝声经营生化制药厂是否恰当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而言，倪柝声为了照顾同工们的生活和教会的需要，办药厂似乎是为势所迫；不过，事奉神的人不能专一以祈祷传道为事，很容易被卷入人事的是非问题中。

聚会处的许多同工和一些全时间事奉的负责弟兄，效法弟兄会靠信心生活。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靠信心实际上造成生活上的困苦，所以这些家属——包括配偶和子女，可能不认同这种信心生活。笔者本人身为同工家属就有同感，后来我们全家生活也是依靠先母办企业支撑。同工织帐棚的作法是由倪柝声提出的，倪柝声五弟倪兴祖的妻子倪徐恩秀姊妹也是以倪柝声的高尚动机，作为倪柝声兴办生化药厂的理由。

倪徐恩秀姊妹这样说：

「当时教会在各地非常的兴旺，同工的需要也日益增长，照着倪弟兄从圣经所教导的和所实行的，在我们中间从来不向人募捐，当然也没有基金、差会的支持，经常有众同工在靠信心过生活而生计贫乏，多人因营养不良而生慢性疾病，以及儿女求学因贫困而作罢的情形。倪弟兄为此常常自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倪弟兄开始了生化药厂的事业。」

倪柝声的二弟倪怀祖，得救后与倪柝声、倪伯母——他们的母亲，三人同日受浸。过了一些日子，倪柝声才和王载夫妇一同擘饼。许多人谈到倪怀祖时，只偏重于他和倪柝声的亲属关系，而忘记了他是非早期的一位弟兄。倪怀祖后来成为知名的化学家，有自己的发明，具有丰富的医药常识，并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化学教授。倪怀祖虽有学问，在科学研究上有成就，但不会做生意，倪柝声在这一方面，觉得有必要帮助他，同时倪柝声心底里，想以企业的营利，来支持同工。

倪怀祖把澳门生化药厂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华山路常熟口租了几间房子，开办锡安化工厂，厂长由上海教会长老吴锡佑担任。倪柝声另从杭州请来张浩然弟兄帮助倪怀祖的制药生意。

锡安化工厂毕竟是一间小厂，一间小厂扩展为一间大厂，实在需要资金。

许多人传言，史百克汇给倪柝声一千英镑，这种传言没有根据。史百克和宾路易师母（Jessie-Penn-Lewis）分道扬镳，在伦敦东南部的贵橡路开始聚会，在很大程度上因着奥格爵士夫人（Lady Ogle）的财政支持。我本人在贵橡路结识奥格爵士夫人，曾到过她在蕴莎（Windsor）的宫殿式城堡，深知她有雄厚的财力。

不错，奥格爵士夫人曾汇给倪弟兄一千英镑，这笔款拿来分派给同工，在当年可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是一千英镑拿来扩厂，就是区区之数，还需筹措资金。倪柝声于是在各地的聚会处向信徒招股，为的是积累更充裕的资金，以扩大药厂的规模。各地的信徒的财力毕竟有限，这时候倪柝声的堂兄倪树祖，也出来支持倪柝声。倪树祖是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当过上海的中国银行行长。一九四〇年，倪柝声改组锡安化工厂，正式成立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在胶州路三九七号租得大片的厂房和空地，倪柝声任董事长，倪树祖为主要投资人，由倪树祖负责向银行融资，倪怀祖仍任化学师，又延聘李升伯任总经理。逐渐地生化药厂在全国药厂中，论规模和品质，都位于前列了。

现在问题来了：倪柝声曾是教会的领袖，为同工们筹谋一切，包括起居生活。像生化药厂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当家的应是总经理，但倪柝声出乎好心，过度关心，事事要过问，结果总经理李升伯辞职不干了。结果，药厂前后换了六个总经理，顺序是李升伯、陆干惕、杨世潮、梅以琳、殷祖澜、张汝励。一九四二年董事会集体辞职，严重地损害了倪柝声的形象。再下去几年生化药厂每年都亏本，红

利都发不出，许多人都到李渊如姊妹那里投诉。同年倪柝声到重庆和内弟张宜纶合开重庆生化药厂，生产 D. D. T 和避倦丸等。与此同时，倪柝声主动地停止了他在上海的公开事奉。

其实在倪柝声的事业中，此时已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上海生化药厂总经理张汝励，是倪柝声师母的叔父，实为中共地下党员，一度被国民党逮捕，写过自新书自保。故解放后，张因历史问题不被中国新政权重用，只任上海市参事。张汝励为了邀功，不惜捏造各种罪名来指控倪柝声，诬告倪柝声为反革命分子。

抗战期间，倪柝声和他的妻舅张宜纶在重庆经营重庆生化药厂。根据张宜纶的忆述：

「我在重庆时观察倪弟兄作工的方式，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老板自居，从未强使他的权柄。相反的，他亲自设立榜样：每日早起，工作时间有规律，不轻率作出决定，不随意而行，不怠惰，他不因自己是老板，便强迫别人去作连他自己也不愿作的事。他总是亲手作工，并教导职工一同作工时要温柔、有爱心、忍耐并合作。」

在属灵方面，张宜纶见证倪柝声在重庆时如何彰显了基督的品德：

「倪弟兄是一个完全被主浸透的人，也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经过和受恩教士多年亲手的培养，他的个性、性格，和行为改变了。他能虚心聆听别人的说话意见，而不中途打岔。他这人内里被主摸过，并因被对付而得了丰富的经历。不然，像他这样的天才，很难与像我这样愚拙鲁钝的青年弟兄相处。」

另一位在重庆的张郁岚弟兄，对倪柝声在重庆的表现，印象也同样深刻。

张郁岚作见证说：

「有一次，倪柝声被他在重庆生化的下属指脸拍桌子责骂，约有四个小时，闹得邻居皆抱不平，但是倪弟兄坐在椅子上，手持报纸，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不时还要点一点头，倪弟兄两眼常常忽然望天，口中念说，祂是神，含意是人一切的遭遇皆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甘心接受顺服这些遭遇。」

「在重庆，弟兄们屡次请倪柝声弟兄参加擘饼聚会，他却只是坐在那里，默默祷告，而不吃饼喝杯。他的原因是：上海教会中的问题尚未解决，不能在此擘饼。」

张郁岚对倪柝声在重庆的起居生活，作了细微的观察，张如此评述：

「我观察倪弟兄的生活，觉得他已学会如何处丰富，如何处卑贱，随事随在都学了秘诀。倪弟兄初到重庆时，住在一间角楼上面，只有一床一桌一凳而已。我去看他，登那角楼之时，木梯还会摇摆，又会吱吱作响。倪弟兄后来住入重庆的生化药厂大楼，在他没有两样，态度依然如前。关于饮食，他有时一餐只吃一个馒头，喝点白水，有时也赴丰富的爱筵。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情况，他都处之泰然，全不在乎。」

倪柝声恢复他的职事是从福州开始。他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在聚会中释放信息。他说：

「我们读罗马书五章时，需要注意其中的原则与应用。这一章所启示的原则，乃是一切皆是神的怜悯。使徒把这原则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叫我们看见一切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事，都是出乎神的怜悯。那里说，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只有圣灵才能引领人到正确的地步。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怜悯。我没有得救以前，准备留学美国。假如早去两个月，就不会与余慈度小姐相会，或许就永远不会得救。即使后来有机会，我也不一定能信，乃是神的怜悯叫我不早不晚，

刚好在那个时候碰见余慈度小姐。……只有神的怜悯才能够叫人真正的谦卑下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倪柝声再度在福州讲道。在讲道之前，倪柝声点了弟兄会诗人郝尔顿（Richard Holden）的名作《耶稣基督亲爱救主》（To Thee, Dear Lord, O Christ of God）。郝尔顿本是圣公会的牧师，他脱离圣公会，单凭信心，到葡萄牙作差传工作。一八八六年八月，当郝尔顿在葡萄牙快要病逝之前，他对医生说，我认识主耶稣共三十八年，我知道我是蒙祂所救赎的，如今，我是何等喜乐的去与祂相晤。

倪弟兄点郝尔顿这首诗时，郝尔顿已在六十一年前逝世，倪弟兄读出诗歌的第一节

神的基督，荣耀的主，

你的心慈，你恩溥！

我们现在全魂、全心，

到你面前来朝见；

我敬拜你，赞美你，

你的道路无可比！

倪柝声读完该诗第一节，说，诗歌里所题的「神的基督」，我们常说神的儿子。神的基督乃是指为神所膏的，被神差遣完成工作的那一位。

那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九节，说到施浸约翰曾为主作见证，却因基督的工作绊跌了。以前施浸约翰说，他不配为基督解鞋带，如今他差人去找基督，请祂老实说出来，祂是否基督……人常常预定好一个属灵的人应该要如何如何，如果没有合乎他们的观念，他们就会被绊跌。

倪柝声在福州恢复事奉之后，许多同工向他讨教灵性的问题。一九四八年二月，倪柝声在福州海关支巷四号召集福建各地的二十多位同工，进行为期十天的培训。

一个月后，即一九四七年三月，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倪柝声在福州与张启珍分手。这是倪柝声在福州与王载、王约翰分裂之后，另一次重大的分裂。由于先父陈则信生前与张启珍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先父与倪柝声的关系。倪柝声与张启珍分裂之后，先父保持与张启珍的交通，直到先父返回天家。

福州原有两处聚会，一个在津门路，由郑证光、唐一帆、徐绍华、张诗贞、江遵信等弟兄负责，三月三日，津门路聚会处几个负责弟兄开会，同意将聚会交倪柝声等年长弟兄带领，但没有通知另一聚会处——即球场后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受到球场后负责弟兄张启珍、施希增、倪玉龙等的责备。

倪柝声此时，对事工方面，在已往所主张的安提阿原则上，又提出耶路撒冷的原则。由于双方不能同心，沟通上有困难，倪柝声和张启珍只好各走自己的路。

必须指出，胜利后国内各地教会的复兴，是圣灵直接作工的结果。正如笔者在《宋尚节小传》和《王明道小传》所稍微述及的，与倪柝声同代的神仆，曾有过失、失败和软弱之处，倪柝声不是完人，同样有瑕疵。但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许多人在末了的日子，都得着恢复。至终是神得着荣耀，是神的名得着高举。

倪柝声在上海恢复职事之前，各地的土壤已经松动，到处结出福音的果子。先说南京的弟兄姊妹，他们仿效二十年代初期福州大复兴的作法，穿着福音背心，上街游行。不久，南京的经验被介绍到上海

来，参加福音游行的弟兄姊妹们，买了大鼓、小鼓、喇叭、扩音器等。上海福音队的总领队是张愚之，大队长是交通大学助教万绍祖，三个小队的队长分别为何广涛、孙务信、张锡康。福音队一路唱着「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诗歌，又喊着口号「上海人哪！赶快悔改！罪恶不去，平安不来！」「信耶稣得永生！」得救人数与日俱增。

在上海起始复兴的时候，倪柝声为了生化业务，不时往返于重庆、上海之间；至倪柝声在福州恢复事奉之后，倪柝声又往返于福州、上海两地之间。倪在上海期间，大多居住在他五弟倪兴祖的家里。那些日子，上海的同工们，特别是汪佩真姊妹，恳请倪柝声弟兄出来主持大局，带领各地教会向前。不过，当时仍有许多在上海的同工们不谅解他。彼此之间经过了一些日子坦承的交通，同工们才一致接受倪柝声的解释，知道他当年办生化，实有苦衷。倪柝声在公开讲道之前，先有几次在华山路钱泽山弟兄家里和少数兄姊有讲话交通。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来自中国各地的四十多位同工，聚集到上海，举行同工聚会。在聚会时，倪柝声请大家唱《葡萄一生的事》，当唱到该首诗第十五节时。同工们失声痛哭。该节诗是：「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

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
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
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倪柝声向同工们交代了他经营生化药厂的原委，倪柝声这样说：「我当年目睹同工们的家庭，经济困难，营养不良。有些同工的孩子不能上学，肚子饿，在家里哭。有许多同工因患肺病而逝世——包括福州的沈丁玲、浙江的韩复生等，我们当中一共有五个寡妇没有人纪念；事实上，算起来，在我们同工中的寡妇，不止五位，有二十多位。这些姊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是抛弃自己的地位，辞掉自己的职业，但他们死了以后，都被人忘记了。同工们，我承认我们有缺欠，在工作，在奉献，在主的恩典上，都有缺欠。当时我办生化药厂的时候，我的情形就宛如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盼望养活他们，但是养活他们的盼望不幸落空，因此寡妇就改嫁了。遇了一些日子，连孩子都没有了。我看着一个一个同工的去世，我里面生气；也许我作了许多的错事，但是神知道我为什么缘故这样作。」

说到这里，倪柝声一面讲，一面哭，众人也当场哭出来，会场里一片哭声。

翌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倪柝声继续带领聚会，他的五弟媳，即倪兴祖的妻子倪徐恩秀姊妹，忆述如下：

「当时倪弟兄住在我们家里。他自己没有子女，对我们的孩子特别疼爱。我还记得那天早晨他正要出门，我的次子天赐见到大伯，一定要他抱，倪弟兄满面笑容地将孩子从我手中接过去，不多久他对我说：『恩秀，快把孩子抱去，我要赶去聚会，时间来不及了。』没想到孩子用两只小手把大伯的脖子抱得紧紧地不肯放，我只好勉强地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他今早很高兴，于是大胆问他说，大哥！我可以和您一同去参加聚会？他回答说，好。我们于是坐上吉普车，到了哈同路文德里。我随着倪弟兄进了会所，大吃一惊，原来今天是全国长老及同工聚会，照理我没有资格参加，只见不一会儿，倪弟兄站起来，带着非常的心情，眼中含着泪，轻声慢语一句一句地说，我开生化是出于不得已，我好像一个

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因为同工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学费上学，有些同工们因缺乏营养，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还有每次买会所都是老寡妇们拿出钱来，于是我对主说，下次买会所，我拿出钱来。倪弟兄讲到这里，全场弟兄姊妹痛哭、流泪。李渊如姊妹站起来请倪弟兄赦免她，李渊如姊妹说：『生化是生活。对我来说，长时间以来，这类的话我听得太多了，实在是令人无奈。』读了倪徐恩秀姊妹上述的话，让我们重温李渊如姊妹当日所说的：

「我从乡下回来的时候，看见教会里白发的人多了。再一次回来，白发的人更多。……我今天请倪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也请负责弟兄们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对倪弟兄作生意这件事是表同情的。关于生化的话语听得多，叫我生气，所以到后来这些气都归到倪弟兄身上。倪弟兄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是倪弟兄，许多的话我不能替他讲。人家说倪弟兄错，我怎么能够接受这种话？我不能把倪弟兄一个人提出来责怪，人是想要把我当作工具，来反对倪弟兄。对于生化，我说生化就是『生活』。我的存心对生化是不利的，对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不说我没有定罪，我的确有过不去的地方，人去了生化，不进则已，一进就倒下去。如果这几天早上的情形那个时候发生，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我巴不得我今天流的眼泪是最末一次的眼泪。」

李渊如说完话，倪柝声当天就把上海生化药厂的管理权交出来。倪柝声说：

「我今天能够说，我也摆上了。我是一个有感觉的人，我作生意是羞耻。我知道有人在生化这件事上有话，我也知道有人来诘问。但是，我冒着在路上别人不打招呼、不点头的羞耻，我冒着寡妇出嫁的羞耻。到了这个地步，儿子没有了，自己也不知道为着什么在这里。手里好像抱着一个死孩子。我八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头来，难道我今天不能说一句：我也摆上了。」

原本生化药厂的管理权操之于倪柝声两个弟弟——倪洪祖、倪兴祖手里，上海聚会处委出六位弟兄去接管。即马万春任总经理，单亦洁和沈荣庆任副总经理，江睡悟任营业经理，孙务信任厂长，张锡康任审核主任。

倪柝声既放下了生化药厂，就更专心于教会的事工，这时他对年青的弟兄姊妹说，奉献一切，才能专心事奉神。

倪弟兄既然与同工们言归于好，也就与同工们一起配搭事奉。他对同工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我们都必须为主而活，为福音而活。事奉神是最高的荣耀，是神高举我们，优待我们。同工们同心合意的事奉，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上海的得救人数一路上升，南阳路会所挤满了四千人；另在虹口扎江路买了一个会所，可容一千人。

这次上海同工聚会又决定，成立执事之家。由于倪柝声早已买下了福州鼓岭的二十余栋房子，他决定拿来作执事之家，以便培训同工。执事之家于是又称鼓岭同工训练班。

倪柝声恢复全时间事奉之前，靠着信心，已经作出了一些具体的、实质上的部署。包括奉献了在福州的家族物业，购买了鼓岭的二十多幢洋房。那些洋楼，是战争期间西方教士撤退卖出来的。

在台湾工作的开展，也是首先由倪柝声启动的。早在一九四七年间，倪柝声已在福州找过刘湛庠弟兄，鼓励刘湛庠作福音移民，到台湾从事差传工作的。倪柝声本人又随着也亲自到台北视察。一九四八年，倪柝声本人奉献美金五万元，买下台北市上海路一栋日式塌塌米的房子，这是聚会处在台北最早的会所。初期聚会人数有二十多位。

一九四八年四月全国性的同工聚会之后，由于大陆政局突变，许多党政军人员，和学界人士，纷纷迁居台湾，内中不乏基督徒，同年九月，曲邹民一家到了台北；十一月间，孙丰露、张晤晨、刘效良、马癸春、沈岳等抵达台湾；一九四九年张郁岚、张振也抵步，台北聚会人数增至一百五十多位。在这一年，菲律宾的信徒林光华、刘碧人奉献了一笔款项，购买了仁爱路二段的一片土地，建造了一个可容三百五十人的木建会所。

在倪柝声的一生中，一九四九年二月，是一个关键性的月份，当时他第二次亲临台北，住在张晤晨家里，印证了赵静怀、张郁岚、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五位弟兄为台北教会的长老。

台湾的祷人，在所著的《四十年来的回顾与前瞻》一书中，确认倪柝声是神忠心的仆人，另一方面，荣耀却该归给神。祷人写道，「倪弟兄的榜样和他撒下去的种子，这四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和中国不断地发芽、生长和蔓延。究竟今天发展到什么程度？真实数字没有人能清楚，只有我们的主知道，相信有一天主会让它显明的。由此可见，主的工作是主自己借着祂无往不透的圣灵，运行在众圣徒里所作出来的，并不是什么人可以特别居功的。若有人确是主忠心的仆人，在众圣徒的良心和灵里也是雪亮的。同样，那些假冒或变质的工人和其工作，迟早也会败露。」

倪柝声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十月，在福州鼓岭主持第一期同工训练班。笔者的父母亲，一起由暹罗的曼谷，前往鼓岭接受倪柝声的培训。

训练班实行家长式的管理，总家长为倪柝声，下设分家家长，按房屋原主人的姓氏为各分家的名称。一、白家家长为黄履铨弟兄，管理浙江、温州地区来的学员；二、禅家家长为缪韵春姊妹，管理女学员；三、沙家家长张子洁，管理华北地区来的学员；四、何家家长为先父（陈则信），管理港澳及海外地区来的学员；五、吴家家长为魏光禧，管理三对夫妇及其孩子；六、倪家则为总家长倪柝声的住处，倪柝声常在倪家，召闻各家家长会议，商讨培训的有关事宜。此外，鼓岭又设有诊所，负责西医的，是周康耀师母周李碧霞；负责中医的，则为黄国斌弟兄。至于招待所，则由郁瑞姊妹和左弗如姊妹负责。

先父在他所著的《倪柝声弟兄简史》中，叙述了他在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班时灵性上的转变：

「我开头参加两次聚会，倪弟兄都是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复活的信息。主立刻就给我看见：『不是养病，乃是复活！』并且那一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里头了！我相信这话，我感谢主，很稀奇，我的属灵情形，就如同从死里复活，立刻有了大的改变！我继续参加聚会，主实在逾格地恩待了我。那四个月，成为我一生最蒙福的日子，也是我流泪最多的日子；我所得到的造就和供应，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们在鼓岭山上的生活，除了参加训练聚会外，其它时间都是各人单独地亲近主，有的人在家里安静，有的人就在树下或草地上，专心读经、祷告，或唱诗。有一天，我在树下寻求主的时候，主叫我遇见了祂。我从前真像约伯一样，乃是风闻有祂，到了那一天，我才亲眼看见祂！倪弟兄很注重个人亲近神，注重每个人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和光照。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他所说的是何等重要！并知道他的带领是何等正确！」

第十一章中国的耶路撒冷

鼓岭第一期的作息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上八点聚会到十点，稍为休息后，再聚会到十二点，下午休息到三点，即分派工作，晚间亦有聚会。

倪柝声在开始聚会时，说出了鼓岭执事之家的功用：

「我们在鼓岭怎么作呢？是各地教会把当地有追求、有意事奉的人送来，给他们几个月的帮助，再把他们送出去，让他们在各地教会负责任。」

从人数上来说，上鼓岭最多的是来自浙江的平阳地区，其次是广东的汕头地区。倪柝声器重平阳地区的前辈弟兄黄履铨，以他为白家家长，又安排在汕头负责过的先父为何家家长，实际上这些安排是顺理成章的。

在鼓岭第一期的学员中，来自浙江温属一带的同工，占与会人数的最高比例，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单是温属一带，共有一百多处教会，还不包括其它浙江的县份。浙江一省，也就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以黄履铨为家长的白家，被称「鼓岭第一家」，学员人数多达三十多人。这些在鼓岭被培训的平阳同工，包括黄履铨、薛崇新、周达卿、苏梯升、范佩真、周清玉、张悟生、林维中、吴新造、蔡琦、陈敬超、徐荣三、陈宝华等男同工，以及林金菊、苏美秀等女同工。

这里概述一下温属一带教会成长的经过。

一九二五年，当倪柝声主编的《基督徒报》在上海出版后，一些爱慕主的温属信徒读了，大得帮助。神就借着倪柝声在《基督徒报》释放的亮光，开启了浙江一带一些弟兄们的眼睛。

一九二八年，倪柝声在上海带领第一次得胜聚会时，王天佐、张悟生两弟兄前往赴会，会后把复兴的火，带到平阳，开始了南港乡和蒲门乡一带的聚会。随着复兴的火的蔓延，更多的人得着圣灵的光照，决定走完他们从前所未走过的道路。

与此同时，陈钦法、王雨亭等弟兄，又在平阳的北港乡、万全乡、江南乡相继建立教会，更把聚会点，扩展到邻省福建的福鼎。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温属的桥墩门，有第一次的特别聚会，由于各地的同工们同心合意，聚会很有震撼力，与会者都得着生命的供应，参加聚会的同工，包括王天佐、张悟生、蔡际清、毛庆诗、苏梯升、金子芳、苏洁民等。

一九二九年正月，平阳地区的第二次特别聚会，增加了三位很有属灵份量的同工——陈钦法、黄履铨、戴云章，一九三〇年的第三次特别聚会，又多了林维中、王竹友、郑盛助等弟兄前来参加。

曾参加过这三次温属特别聚会的，作见证说：

「三次的特别聚会，都有圣灵的同在，都看见圣灵在运行和作工。每次聚会参加的都是泪如泉涌的向神呼求，求神开众圣徒属灵的眼睛，能以看见神的计画和心意，好使众圣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必须指出，倪柝声的信息，一直是浙江一带同工们的支配思想，和灵性的供应泉源。陈钦法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给倪柝声的信这样坦述：

「弟兄灵中，环绕着一个甘美的思想，就是『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在作工的时候，每逢提起这个信息，总是觉得有一种新鲜的意味和能力。哦！这个荣耀的真理，真是一般信徒灵性的泉源，尤其是同工们作工的焦点。」

到了一九四八年，平阳一带的教会，一方面蒙神祝福，增加到一百多处；另一方面，许多同工，息劳归主，包括蔡际清、王天佐、王锦义、张明华、潘活灵、李树人、傅宣羔等弟兄，和黄兰如师母。最可惜的，是很有恩赐的两位前面同工，王雨亭和陈钦法，也同样离世与主同在，留下黄履铨，有独木难支之感。

在鼓岭，身为平阳地区的负责同工黄履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率先作见证：

「我是在无意中得救的，得救后我喜欢读经祷告，自己想要作标准的牧师。后来我进神学院读书，三年后毕业，被派出去作传道工作。我读到倪弟兄出版的《基督徒报》，得着很大的供应，看到了亮光，对真理有更透彻的、深入的认识。我于是前往上海，在哈同路文德里倪弟兄面前受教。有一天，倪弟兄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我听了以后，就认识到什么是复活，认识到复活的生命，所释放的是莫大的能力。张光荣弟兄曾在浙江平阳布道，说到事奉之人的标准，我个人实在觉得不配。我祷告主，使倪弟兄能带领全国同工有聚会。主果真垂听了我的祷告，在上海起始有全国性的特别聚会，我过去多有患难，遇见海盗三次，土匪一次，内战两次，自己又多病；但感谢主，都蒙主保守平安，我觉得年老，许多事可让年轻人来作。但在事实上，教会的责任又在我身上，我不愿意作，又不得不作，这是我的难处。」

黄履铨作见证时，在鼓岭的全体学员屏息静听。这些年来，黄履铨长期驻守浙江平阳宜山耶稣堂，巡回温属一带讲道，并探访软弱的和年老的弟兄姊妹。黄履铨熟读圣经，查解圣经时，可说深入浅出，层出不穷，满有亮光，实在是神赐给浙江的祝福。在他作见证时，吐露了时日不再的唏嘘心态。

倪柝声在黄履铨作完见证后，就对黄履铨作了属灵的判断和评语：

「黄履铨弟兄在浙江温州一带，是主要的负责人，绝不能退去。这些年因着国内的战事，同工们之间确实缺少交通。你对主的工作，天然的兴趣减少了，这是好现象。一面你能由你的天然脱离出来，这是好的现象；一面你需要在复活的能力里更积极。在主的工作，是会出现矛盾的情形。在黄弟兄身上，这种矛盾的情形更加突出和明显。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之下，你就会看见，你到底为着主有多少。然后，你才能清楚那一样是更单纯的事奉神。一面来说，你的事奉不是出乎天然的兴趣，你作也可以，不作也无所谓，这是『死』的经历。但光有死，没有复活也不对，所以在另一面，在积极方面，你必须要有复活生命的扶持，好使你比年轻时作得更多。我所担心的是一个人重工作，但拿不出果效来。我们在神面前事奉祂，坚持为主作工，是责任的问题，不是喜好，而是责任。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若可以作，就有赏赐；若不可以，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种矛盾加强了是好的。」

「一个人若是太重工作，就难以放手；若放手，又容易变成消极。神在许多时候，乃是领人经过暗的幽谷。王雨亭、陈钦法等带头的弟兄先后去世，平阳的教会缺少同工，黄弟兄顿觉担子过于沉重，教会实在有难处。我要告诉黄弟兄，当你不喜欢工作时，正是要显明（你是否真正为着主。一个人年轻时，喜欢作这事，喜欢作那事，这乃是天然的力量。如今你年老了，情形就不一样。只有在许多黑暗的日子里，才能看见你有多少是为主的。恐怕少年时热心所作的，没有多少是为着主，许多是为自己，或者是为人。惟有当自己退出来时，才是主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使我们越过越单纯地事奉神。」

「黄弟兄，你要注意两点，一是面对矛盾的生活，特别是在工作无兴趣的时候，仍要坚持地作工；二是在复活的生命里刚强。对于第一点，你作时可能是失去天然的兴趣；但对于第二点，你总要觉得我

有责任，有托付，许多事非负责不可，不能让教会塌下去。你要从死里爬起来，面对教会的危机。有的人作工是有狂热的，是有情欲的，若不让他作，似乎是要他的命。弟兄，你要从工作狂、工作欲中出来，把这些天然的狂热和情欲置于死地；但另一方面，你要在复活的生命里得着能力，得到加强，要知道你乃是主的仆人，祂有要求、祂必加力。我们到年老时服事主，不是自己乐意与否的问题。就如彼得，主对他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正如约翰福音二一章所记载的。这时乃是一个主仆受试验的时候。看见主的工作的需要和迫切性，而为主摆上，为主工作，这是奉献最大的试验。这时不是我高兴作或不高兴作的问题，乃是恩主要我作的问题。我为主而作，在我不高兴时作，甚至比我高兴时作，会作得更可靠。」

「我们为神工作，不是高兴就作，不高兴就不作乃是要在复活里作，需要仰望身体的供应。复活是在教会里，所以复活生命的供应也是在教会里。你要靠着身体的供应，与众圣徒一同冲过去。不要理会有兴趣，或没有兴趣；有情感，或没有情感。众弟兄姊妹，就是那样在教会中，靠着复活的生命，全体一同冲过去。保罗有一次也似乎是灰心了，好像说，工作要停一停。但使徒行传十八章记着说，当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保罗每逢安息日，都会在会堂里辩论劝化。或者他曾经受挫，想停一停，或者他有时受压，力不能胜；但当西拉和提摩太来到时，他就为道迫切，又讲基督，题目不变。在此我们看到，在保罗似乎灰心的时候，两个年轻的弟兄一来，保罗的灵又刚强起来了。对于你，黄弟兄，目前或者没有两个年轻弟兄来，但盼望以后会有。你现在若是退去，情形并不好。你若多看难处，又没有得着复活的能力，那个难处就是死的，一无用处。你若能得到身体的供应，虽然你生活中的矛盾加增，天然的兴趣在死去，但就是在这种死的情形下，能有复活能力的彰显。」

在鼓岭，倪柝声在倪家召集家长会议时，担任白队队长的黄履铨和担任任何家家长的先父经常碰头。黄履铨和我父亲陈则信都是正规的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他们若不是与倪柝声同工，黄履铨会是内地会的牧师，我父亲会是长老会的牧师。

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结束之后，黄履铨回到平阳一带，继续牧养那里的教会。过了没有多久，倪柝声又差派我父亲到温属一带去主领一次特别聚会。此时，两位鼓岭「家长」又在异地重逢。

一九五六年一月，倪柝声在鼓岭对黄履铨说的预言应验了，黄履铨就如彼得，伸出手来，让别人把他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黄履铨虽然被捕，温州一带的教会仍然蒙主祝福不断茁壮成长。

为了撰写这本倪柝声传，我翻阅了浙江各地部分同工于一九九四年编写的《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这本小册子出版时，已经与鼓岭第一期的时间相隔四十六年，但他们的信仰还是那么纯正，对真道的认识还是那么正确，对倪柝声弟兄还是那么敬爱，那么怀念。他们在扉页引述《耶利米哀歌》的话：

「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直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最感人肺腑的，是这些在中国的耶路撒冷——浙江的同工，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仍日夜思念着主，仍唱着感伤的《自伯大尼与我们分手后》（Since Long Ago at Bethany）这首诗歌。这首诗是倪柝声改写的，原作者是波拿（Horatius Bonar）。

波拿于一八〇八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 (Edinburgh)，是长老会中最有恩赐的圣诗作者。波拿与倪柝声有许多共通点，他们的一生都渴慕主的再来，他们的一生都对教会忠心耿耿，不贪爱属世的名利地位，绝不看风转舵，出卖原则。

倪柝声的生平最喜爱的诗人中，波拿是其中之一。倪柝声点唱诗歌时，经常点唱他亲自翻译的波拿的圣诗，包括《没有血，没有坛》(No Blood, No Altar Now)、《我们从前所有》(All that We Were)、《为着这饼和这杯》(For the Bread and for the Wine)、《主，在此，我要与你面对面》(Here, O My Lord, I see Thee Face to Face)、《求你拣选我道路》(Thy Way, Not Mine, O Lord)等。

时至今日，在浙江——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论是在擘饼聚会中，或者是在祷告聚会中，都不时点唱波拿创作、倪柝声翻译的诗歌，思念波拿和倪柝声的忠贞与敬虔。

这些鼓岭第一期同工的遗民，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中强调：

「这就是纯正信仰基督教会的历史，犹太为区区三十块钱枉死树下，千万圣徒面对饿狮猛虎，焦黑刑柱，染血的钢刀、长矛。只要他们说一句否认主的话，就可妻儿团聚，但他们眼望天上，神情安详，站在前一位圣徒洒血的地方，安然等候那「最上算」的时刻来到，因为他们早已坐下算计好了。

在本书《倪柝声传》余下数章仍未缕述之前，兹录下中国耶路撒冷的遗民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的哀鸣：

「苦难中的中国教会，刚有十多年的喘息，在伤痕累累中稍有建造，却被那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弄得千疮百孔，一片片尚未完工的耶路撒冷城墙，又纷纷被推倒在地。刚从被掳之地归来的百姓，凡有心建造耶路撒冷的有谁不哭？有谁不向耶和華呼求呢？」

概括一句，读了《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一章，就知道倪柝声的属灵影响力，无远弗届，甚至可说是深入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第十二章在鼓岭所见所闻

在倪柝声的一生中，他在鼓岭对同工的两次培训是他事奉的高峰。

来自甘肃省天水县的李因信这样叙述鼓岭第一期的聚会：

「每天第二个聚会，是个人的见证，和倪弟兄对个人的评语。每次只限一个人作见证，跟着解决他的难处，好像是神家中审判之实际学习。我自上山后，灵在神面前，渐渐苏醒，近来有点往上爬。盼望我不再挣扎在消极对付中，而能在积极方面得到加强。」

再谈谈史祈生在鼓岭的感受，史祈生被分配到沙家，家长是来自青岛的张子洁，恻然在《主仆史祈生》中这样撰述：

「一百多人聚集的场合，倪柝声并不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大声疾呼，而是坐在众人面前，一杯茶在手，用慢慢聊的方式，娓娓道来。祈生形容倪柝声的讲道，好像剥洋葱。你跟着他一层层的往里剥，从一节圣经引进另一节，无法不服从他的带领。剥下的洋葱，片片可吃，香味扑鼻。」

从厦门前往鼓岭，参加第二期一小段时间培训的同工柯怜悯这样追忆：

「倪柝声弟兄在鼓岭，一天三次，每次两、三个钟头交通，连说了四个月，哪里来的丰富和力量？我

们想也想不来。但是看到生命的能力，吞灭了人的软弱，我们的灵、魂、体，都蒙了恩，就不能不俯伏敬拜神。真的，若不是蒙了恩，人是受不了的。神的爱的价值是算不出来的。」

「有人以倪弟兄的工作为题写论文来问我，要我提供资料。我告诉他：他的信息你还可以写出来，可是他讲的话有一个灵。这个，你写不出来，如果你摸着这灵，你就得着造就，也得着光照。有一位姊妹，和我同是在鼓岭受训的，一回想当日在鼓岭遇见的情形，就说，那些日子，天与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父亲（陈则信），在他所著的《倪柝声弟兄简史》中，述说他在鼓岭受训的亲身经历：

「他所释放的亮光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话语的能力有如利刃扎人心坎！听完信息在祷告时，常有多人流泪痛哭！有好几次他讲完了道，全堂几乎都仆倒哀痛着祷告，其情形宛如五旬节的再临，圣灵同在是如此明显，真像大风吹过能感觉得到一般！参加那次训练的人，实在是太蒙恩了！」

鼓岭两期的同工训练班开支庞大，没有经济上的实质支持是不可行的。当时在上海一些比较富有的弟兄，有李升伯、孙佳如、许石泉、杨世潮、杨玉树等，也体会到倪柝声经营生化药厂，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教会事工的需要，此时也希望生化药厂能够有长远的收益，就筹款借给生化药厂买原料，生产 D. D. T. 和肺病特效药 P. A. S.，并在报章大作广告，来促销这些产品。此时因倪柝声已将管理权，由他两个弟弟移交给六位主内弟兄，有关生化药厂的闲言闲语顿然消失，倪柝声本人可以全心全意地、专心地在鼓岭领会；生化药厂赚来的现钞则定期地由孙务信和张锡康亲自从上海坐飞机带到福州，再捎上鼓岭，应付鼓岭执事之家的需要。

鼓岭第一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结束，停歇了半年之后，一九四九年四月，第二期同工训练又开始。

第二期同工训练在鼓岭只举行了三星期左右，就迁移到福州南台海关支巷四号，那里原有三栋楼房，是倪家奉献出来，作为执事之家之用。当时局势动荡，吴仁杰、柯怜悯两位同工提前回到厦门。

从学员的背景资料进行分析，看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明显分别。在鼓岭第一期受训的，许多是浙江平阳一带的老同工，包括黄履铨、周达卿、苏梯升、张悟生、蔡琦等；来自山东的同工有张子洁、孙丰露、张晤晨、刘效良、赵避尘等；来自上海的弟兄们几乎绝迹，除了作记录的周行义，只有作短暂逗留的俞崇恩、张锡康；但是在上海女同工缪韵春的率领下，上山的女同工，有左弗如、倪规箴、刘慧芬、吴佩雪、桂如玉、郭孩真、纪钟毓等。此外，汕头地区加上香港和广州两地，同工们的人数也不少。第一期的受训同工，在区域上担责任的，除了四位家长，黄履铨、先父陈则信、张子洁和魏光禧，还有来自北京的阎迦勒、来自重庆的徐仲洁、来自新加坡的陆忠信，和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缪绍训。

在鼓岭第二期，闽北一带的有分量的同工，成为被培训的同工的主流。聚会处在福州开始，但是倪柝声在福州长期受到排斥，更曾一度被福州某些同工们开除。倪柝声虽然诸多迁就，却先后在原则问题上，与许多福州的同工们不能走在一起，包括王载、王连俊、丁素心、张启珍等。在鼓岭第一期同工聚会之前，福州教会又出现了分裂，津门路的聚会的负责弟兄，包括郑证光、唐一帆、徐绍华、张诗贞、江遵信等，接受了倪柝声的带领，而球场后的聚会，在张启珍的带领下，加上倪玉韵、施希增等负责弟兄，表明要坚持自己的既定立场。

所以在鼓岭第一期，闽北一带的同工们不多，比较单薄，弟兄方面计有林维中、余笃信、黄国赋、郑光濡，姊妹方面则有郁瑞、周寄尘、黄安慧。

倪柝声常引述圣经的话，说先知在本地往往不受尊敬。

正如上文述及，当倪柝声在当年被福州同工们拒绝的时候，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的同工们一致地支持了他。由于倪柝声出生于汕头，在某种意义上汕头不啻是他的第二故乡。

此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在聚会处的“心脏”上海，即使来自南方一带的弟兄们，在上海也非常乐意奉献，包括来自汕头的孙佳如和来自闽南的杨世潮、许石泉；至于上海聚会处在购买南阳路地皮时，来自菲律宾的闽南籍弟兄张兴荣，就奉献了那笔关键性的十万美元。

在鼓岭第二期，可喜的现象出现了：闽北一带甚有分量的同工，一反第一期的现象，成为聚会的主力军和有生力量。光是福州一地，就来了二十多位同工，计占第二期全部受训同工的三分之一，包括陈恪三、陈必荫、郑证光、陈希文、陈贞藩、林子隆、郑光弘、叶逢生、包幼道等。上海方面，则由灵性方面很有追求的俞成华弟兄和汪佩真姊妹领队。

至于在地方上担负带领责任的，来参加鼓岭第二期的，计有来自武汉的蓝志一弟兄、来自长春的华天民弟兄、来自厦门的蔡志崇弟兄、来自南京的季永同弟兄和一位非常前面的，来自青岛的女同工侯秀英。

以属灵的年日，灵性上的经历来讲，鼓岭第二期的学员比第一期的稚嫩，时至今日，由于年日的推移，许多当日的第二期的青年弟兄，至今多已经进入垂暮之年，部分甚至已经离世与主同在。无论如何，倪柝声在鼓岭的两期培训，以及在聚会时所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不少且已被整理成书出版，供应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信徒，成为教会的祝福。倪弟兄所传讲的纯正信仰，使许多地方的教会，不致落入异端的教训里。

第十三章在香港的部署

聚会处在香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起头。一九三七年初，江德茂、陆忠信、魏光禧等弟兄，加上缪安信姊妹，在九龙南昌街一五五号三楼开始有聚会，神动了奇妙的善工，仅仅几个月，聚会人数就猛增至二百人左右。

一九三七年底，神大用的仆人倪柝声，乐非力和祂的使女于素真、李拉结也到香港来。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倪柝声弟兄连续三个主日讲道。在一月十日，倪柝声乘船前往上海，留下他的母亲和妻子在港，住在九龙深水埗石狭尾街三十九号三楼。当时，于倪柝声的弟弟倪怀祖，连同张息吾、刘王安等弟兄在一水之隔的澳门经营生化药厂，大小倪师母似乎有定居香港。

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于魏光禧移居云南昆明，香港教会的主要同工是乐非力，其它同工有江守道、陈主言。姊妹方面，则有于素真，李拉结。

一九三八年二月，广州的黄若琛姊妹，迁居到广东中山良都竹秀园乡郭海珍姊妹家里，黄姊妹有负担在竹秀园有一次传福音聚会。

在黄若琛姊妹的邀请下，香港的乐非力和江守道前往竹秀园布道。

当时我父亲正在汕头牧养教会，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则留在厦门鼓浪屿，那段日子，父亲因鼻窦炎，在汕头手术后流血不止，自忖在世日子不会太久，正为遗下妻子和几个孩子而担忧。这时他忽闻黄若

琛在竹秀园有传福音聚会，就赶到竹秀园会晤年青同工江守道，向当时仍未有小孩的江守道托孤。江守道于是应允先父，若先父有何不测，他会承担陈家一家大小的经济责任。

接着一九三八年七月、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九四〇年初，先父都到过香港布道，最后与江守道前往新加坡。其后江守道从印度前往昆明，先父则由马来亚转入暹罗南部的那汶、宋卡，然后北上到暹罗京城曼谷，在浸信会的心联堂讲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同工训练班第二期在福州海关巷结束之后，倪柝声重临香港。

倪柝声和香港有不解之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都在香港释放过信息，带动了教会的兴旺。此番到港，预感到香港在中国的历史上，将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先父陈则信在《倪柝声弟兄简史》中如此叙述：

「神的带领及管理，是何等的奇妙！倪柝声到了香港，看见香港教会的光景，觉得这一个地方，必须加强，这里的教会和事工。为此，他就写信给我，要我离开厦门，来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没有征求我的意思。同时一连好几次打电报催我从速来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应命而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我父亲带着我祖母、我与两个妹妹，和在鼓岭受训过的女同工柯翠琼，乘船来到香港。接船的是父亲多年的同工江守道。最初几星期我们一家借宿于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的会所，住了没多久，其时身在香港的倪柝声，就为我们一家安排了居所。为此倪柝声自己付出一笔可观的顶手费，约等于六个月的租金，这笔款退租时结果不能取回来。当时倪柝声安置我们一家住在九龙钻石山上元岭十七巷的菁社别墅，而倪柝声夫妇则住在附近的寄庐。

倪柝声在安顿好我们一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跟我父亲商讨省港澳一带和海外的事情。

菁社别墅分两层，我们租的是地下那层，中间是客厅，前头两间睡房，分别由我父亲和我住，我的睡房搭两张床，其中一张床是给张兴荣用。后面两间睡房，一间是我祖母（陈李蕉姊妹）住，后来张宝珠姊妹搭多一张床，另一间是我两个妹妹（秀琼和秀美）和柯翠琼姊妹用碌架床挤在一起住宿，后来更加入了许美莲姊妹，有时候张兴荣自己下厨，请倪柝声和一位英国女传教士芮智英（Joy Betteridge）到我家来吃饭，我们三个小孩子要等大人们吃完了才能进食。我两个妹妹比较调皮，曾搬凳子爬高去看倪柝声的耳朵，我责问她们为何如此作，她们答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倪柝声弟兄比一般人聪明，因为他耳朵里长了一颗黑痣。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这说法不科学，纯属迷信。

我生性较敏感，总觉得倪柝声夫妇因膝下犹虚，后继无人，在潜意识上多少若有所失，在这方面倪柝声似乎有意对妻子张品蕙作出补偿。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倪柝声嘱咐我改称倪师母「裸母」。我母亲（陈张雅淑）从鼓岭下来后，一直逗留在泰国曼谷，在香港只有我父亲照顾我们三个小孩子，但是父亲身为教会主要负责人，要照管教会许多繁杂的事务，形成我们三个小孩子乏人照顾，这使我有空就多往寄庐那边跑。住在寄庐的，除了倪柝声夫妇，还有倪师母的弟弟张宜纶、张师母和他们的儿子张振融。由于张振融年龄与我相若，振融也就成为了我的玩伴。

我有一项喜欢的娱乐，就是下象棋；刚巧倪柝声的堂兄倪承祖，也喜欢下象棋，我常常不理睬倪柝声是否在意，就和他堂兄倪承祖在寄庐客厅下起象棋来。有一天，当我赢了象棋兴高采烈时，作为裸母

的倪师母从厨房走出来，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堂兄倪承祖，只管称赞我聪明，又赞我小孩子说大人话。我虽小，却也明显觉得是倪栢声叫他妻子要与我搞好关系。

倪栢声和我父亲都是香港教会的重要同工，当然有许多倪家的年长姊妹们，经常有事要找他们商量，碰见她们时，我为了讨人欢喜，学会口乖，也称呼倪栢声的姐姐陈倪闰臣姊妹和倪承祖师母（倪陈慧宣姊妹）裸母。

没有多久，倪栢声即告别妻子，独自回上海去。在他离开香港之时，他觉得香港教会的难处是信徒奉献不彻底。香港弟兄姊妹相当富裕，多人拥有洋楼，而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的会所，却连门口电铃都没有安装，仅靠一条铁线拉动小铁钟叮当作响。倪栢声认为，不是弟兄姊妹没有钱，而是对神的教会漠不关心。

倪栢声恢复职事后的一些表现，说明他对自己当年办生化药厂，并不认为是项错误。他认为自己当年办企业的动机是为了神的工作，不是因着拜玛门，并不是失去见证。因此，几年前他与上海同工们冰释前嫌，澄清误会，消除间隔，完全是为了职事的恢复，是为了教会的合一，绝不是一项对罪的悔改。事实上，当他在鼓岭主领同工训练班时，之所以不必为钱担忧，可以专心讲道，完全得助于上海生化药厂的盈利。当时多亏张锡康和孙务信轮流把现钞从上海带到鼓岭，培训工作才得以维持下去。故此，倪栢声从香港北上上海后，又在上海开设了以琳印刷厂，以任钟祥为厂长；又开办翠华化工染料厂，以谷羽苍任厂长；倪栢声并在华中的武汉，设立璐珈药厂，并以何广涛、孙务信为正副厂长。

当倪栢声重返香港时，他的头发长得很长，我父亲问他原因；倪栢声才说，因为在上海时太忙，甚至忙到了连理个发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倪栢声跟着对香港的教会企业，作出了安排，即决定成立香港生物化学制药厂。在兴办香港生化药厂时，倪栢声再三强调，香港生化药厂的利润，是为了支持国内的同工，及作推动国内福音工作之用。香港生化药厂总经理一职，由我父亲（陈则信）担任；家父不在港期间，由第二经理魏光禧（也是鼓岭第一期学员）顶替；执行经理一职，由张兴荣负责，张兴荣是菲律宾的富商，负责筹集香港生化的资金。香港生化药厂厂长一职，由倪的妻舅张宜纶出任，会计是倪栢声的姐夫陈贤璋（即陈终道、陈供生的父亲）。此外，倪栢声又成立香港生化药厂的营业部门——合一行，营业经理为廖作新，主任为杨志坚。

倪栢声对香港企业的安排和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父亲在香港负责教会工作，并没有领取薪水或津贴，同样家父在生化药厂也没有领薪水。我们一家的经济来源，是靠我母亲，她在泰国曼谷经营家宰两合公司。

在香港，倪栢声提到，事业应当怎么办才能得主的祝福？他说要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五节、四章三十四节，按着各人所需的分给他们。当时定下的薪水，张宜纶、廖作新为港币三百元，杨志坚为一百五十元，其它员工，包括倪连生（倪承祖的儿子，倪的侄儿）、陈慰中（我的哥哥）、林双木等，一律为一百元。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倪栢声开始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有聚会，他开头就说：「这次来香港，我要说出真话，我对香港教会这几年停滞不前的光景不满意。我对香港教会一直未能复兴，有些失望。」倪栢声这样宣布，是为十多日后安排我父亲为第一长老定调子，并从侧面批评魏光禧多年来未能带领教会

往前。当晚，倪柝声又说出，从厦门调我父亲到香港作教会领头的原由：

「在神的工人中也有领头的职分（leadership），许多人以为这些职分是因着年龄和恩赐，但我要说，这不在乎年龄、恩赐等，乃在乎在神面前的奉献有多少。神面前奉献得多，自然在神面前就有职分的显明，你就能带领神的教会或工人往前。你有神的光，你领头了，人自然跟着，不会不服，你割自己最深，流出的生命就最丰富，人也能从你得着最多的供应。」

接着几晚，倪柝声谈到奉献，他说，神若肯悦纳我们的奉献，是祂的怜悯，是我们的荣耀。又说，我们就是跪着、爬着、俯伏到神的面前，也要求祂让我们能事奉祂。祂若肯收纳我们的奉献，乃是祂怜悯我们，恩待了我们。奉献是我们蒙了祂的恩。是神优待我们，肯收留我们。

当时许多弟兄姊妹纷纷写字条，交出自己的财物、前途、一切。我虽然只是十七岁，也写了一张字条给倪柝声弟兄，表示要把自己所有的，包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前途，所有的未来事业，交在主手里。有一天晚上，倪柝声对我们这些仍在学校读书的青年弟兄姊妹讲话。他说，你们要从现在起，就起首保守自己的清洁。你们要定意：有许多事我不愿意碰，不愿意摸，我站在外面，求神施恩给我，保守我清洁。我盼望你们能唱小姊妹达拉（Dara）的诗歌，这首诗乃是说到一个属乎神的人对世界该有的态度。达拉可说是过去五百年中，灵里最干净的人。约在五六百年前，白小姐（Miss Bride）为主大用，能行异能神迹，有一次白小姐为小姊妹达拉按手祷告，使她天生的盲眼复明，那时达拉才十几岁，当神迹临到达拉，达拉眼睛能看见了，她就大大欣赏日月星辰和世上一切的景物。但几天后，达拉跑到白小姐那里，满脸忧愁；白小姐于是问达拉，你要我为你作什么？达拉说，请你再为我祷告。白小姐问达拉，你还有什么病吗？达拉说，请你为我祷告，使我的眼睛复盲，因这些美丽的景色叫我偏离主的喜悦。后来白小姐就把达拉的话编成一首诗歌，倪柝声又把这首诗歌，译为中文，照录如下：

一 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求主使我目复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

（副）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

二 晨曦、晚霞、星光、云锦，留等乐园再接触；

今天在此祂的怜悯，已可满足我盲目。

三 离开苦刺我今不望，甘心软弱望加恩；

幔内交通无上荣光，依然照亮无眼人。

四 黑夜沉沉何等美丽，用心摸索不用眼；

祂受欺侮，祂被讥讽，我见祂的发光脸。

五 超过月亮，超过日头，超过星河并云霄；

乃是圣者披荆的首，所显无比的荣耀。

尽管倪柝声对我们在校的青年弟兄姊妹说，你们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我却由于天性败坏，未能清洁，我在寄庐的客厅，找到一份小报《上海日报》，该报常登载有关上海的轶闻，倪柝声来自上海，关注上海的动态，是必然的事。我在倪柝声走出大门，就翻阅《上海日报》的副刊，内有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我读了津津有味，由于小说是连载，我每天例必在倪柝声出门之前，从菁社别墅走到寄庐，等

到倪栢声出门，我才开始翻阅《上海日报》的副刊，追读连载的言情小说。

有一天，我读到言情小说的半途，倪栢声突然折返，不说一句就从我手中拿走了《上海日报》，我觉得内心的隐秘被他识穿了，满脸通红。从这宗小事，可看出倪栢声一直希望弟兄姊妹们存心清洁，以便毫无隔阂地亲近神。

倪栢声住在寄庐，起居简朴，除了属灵的书籍，和新闻报纸刊物之外，没有任何不洁的海淫的书籍，否则张振融和我，完全可以在翻箱倒篋中，找出他的把柄来，但他非但自己清洁，也期望我们这些后辈心里同样清洁。

对那次的特别聚会，倪栢声要求很严格，每晚要点名，点名时要答出声来，一没有回应，大家就会留意到谁缺席了。

我记得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三，我想连连数晚有聚会，想放松一下，没有去聚会。到了张兴荣聚会回来，就对我说，倪弟兄对你很关心，在连连叫福中的名字之后，听不到你答到，又重复地呼唤你的名字好几次，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倪弟兄对你的关心，超过对一般人的关心。我就查问倪栢声当晚信息的内容，后来也借来讲道记录，想探测该晚是否有涉及我的内容。

该晚的信息，是说到青年人在前途上容易失败的问题，倪栢声要求青年人注意三件事：旅行、婚姻、职业。由于我当时才十七岁，还未考虑到婚姻和职业问题。那年，我正读高中一，由于香港当时没有中文的大学，我打算高中毕业后离开香港，到外地求学，看情况可能远行。只是当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过了两年，在将高中毕业后，倪栢声和我父亲，会送我到遥远的英国，并把我交给他们最敬仰的年长弟兄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抚养。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倪栢声弟兄对香港的长老和同工作出安排，他安排的五位元长老，顺序是陈则信、魏光禧、曲子原、许骏卿、郑谦原。倪栢声又指出，长老们只负责香港地方的事务；但是同工们则要兼顾区域的事务。我父亲身为同工，也就要兼顾广东一带和泰国各地教会的带领。

不久，香港每主日晚，又有分家擘饼聚会，我们一家，被安排到九龙太子道二百九十号鲍志成医生的家里，这样一来，我和媒母倪栢声师母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除了到寄庐串门之外，连聚会也和倪师母在一起。有一次，上海的汪佩真姊妹到寄庐住，我一到寄庐，倪栢声师母就说，福中，过来，你小时在上海汪小姐都看到过你。想当年我才两岁，举家住在上海，我的二妹秀美就在上海出生，事隔十四年，我已经长大了，连汪小姐见到我也惊叹说，则信弟兄的儿子已经这么大了。我父亲身为香港的负责弟兄，见到汪小姐显得很敬重，当汪小姐在佐敦道七号二楼向姊妹们讲道时，我父亲隔着布帘，细心聆听，并且作了笔记。

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汕头教会致电倪栢声，通知他倪伯母安息主怀；在这关键时刻，上海教会也来电报，催他回上海处理教会面临的诸多难题。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安葬母亲，诚属大事，这时他在家事和教会事务之间，必须作出抉择。结果，他打了一封电报到汕头，电文只有短短的六个字：「就地安葬谢谢」。下款并无署名。他先交代妻子倪张品蕙和大姐陈倪闺臣前往汕头料理母亲葬事。在她们两位姊妹奔丧之前，倪栢声于三月十二日独自先回上海。（倪师母和倪大姐迟至三月十八日，才与林双木弟兄乘搭「英航」客货轮返港。）

在倪栢声动身回上海前几天，我父亲劝倪栢声不要回上海。我父亲以哀求的口吻对他说，只怕你此番

回去，再也出不来。我父亲又直言，你将来必后悔。

在我父亲苦苦劝谕之下，倪柝声遂答应我父亲说：「让我打一个电报到英国去，请问史百克弟兄，因他终归是我属灵的兄长。」

恰巧在这时候，史百克患严重胃病，危在旦夕，正为是否听从医生意见，进行胃部手术，仰望神的带领。后史百克接受手术，整个胃被切去三分之一，此后，史百克每餐不得进食太多食物，一餐要分成多次吃。

大难不死的史百克在手术后这样说：「我感谢主耶稣留下我的性命，但我不知道主耶稣因何留下我的性命。主让我多几年存留地上，一定有其原因。」几年后，史百克才恍然大悟，神留下他的性命，纯粹是为了中国。

话说回来，当倪柝声从香港向史百克致电的时候，史百克远在伦敦，因患重病未能向倪柝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香港的倪柝声于是单独寻求主的心意，仰望主在环境上的带领。末了，他作出决定，要与国内众信徒同甘共苦，一起走主所命定的道路。临离香港前，倪柝声说，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

第十四章遭到了挫折

倪柝声回到上海之后，重视属灵的文字工作，加快了属灵书籍出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人事上，也扩大了上海福音书房的建制。福音书房总编辑一职，由李渊如担任，另外增聘唐守临为总经理，汪以存为编辑，蓝志一为会计。在书房任职的还有周行义弟兄，纪钟毓姊妹、萧自若姊妹、李铭约弟兄、陆耀华姊妹、黄得恩弟兄等。

在教会问题上，倪柝声开始探讨各宗派合一的问题。他所提及的合一不是口号性的，而是真诚的、实质的。他开始认识到，已往所强调的地方立场，不啻使聚会处成为宗派中的宗派，是一种闭关自守、眼光狭窄的作法。他竭力争取杨绍唐、金罕、姜蒙光为同工，好一致对外传福音。他真正争取到的同工，有陈本伟、高晨光等。

倪柝声还带着唐守临到上海新闻路内地会总部，与内地会的传教士们交谈。从历史渊源上说，上海聚会处，从一开始，就有内地会传教士祝康宥的参与；而后一阶段，倪柝声的得力女同工之一，就是内地会出身的巴若兰。内地会既决定从中国撤出所有的西教士，就将一些内地会聚会点移交给聚会处。在内地会眼中聚会处是本色化的、信仰纯正的教会。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基督教的新派成员吴耀宗，联络基督教各宗派，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以划清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界限。倪柝声的超政治立场，并不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这给他内心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单纯从信仰方面来审视倪柝声，他是个十足的清教徒，清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倪柝声所传的信息，在一般人看来，带有浓厚的奥秘派的色彩。至于他所带领的聚会，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的，互相关怀的特色。他们取消居间阶级，不盛行牧师制度；在擘饼聚会、交通聚会、祷告聚会中，每个信徒都有权利和机会祷告、分享，和交通。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自从倪柝声恢复职事之后，在教会中安排了长老、执事、家负责，教会实际上有了组织的雏形。在新政权的眼中，这种无形的组织，或者说这种没有组织之名的组织，这种繁殖力强的有机组织，更需要纳入国家政治的轨迹，这些聚会不应享有超政治的、不受政权操纵的超然地位。另一方面，倪柝声复出之后，对他从前所著的《工作的再思》，作了补充。《再思》所揭橥的地方教会立场，倪又作出了全新的修订，即在安提阿的原则之外，加上了耶路撒冷的原则，从而使聚会处在中国政府眼中，蜕变为一个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组织。

倪柝声在信仰上是清教徒；在政治上却是新丁。换言之，他对政治的认识模糊，不够清晰。

有一件事他处理得不好，给人留下把柄。原来倪柝声为了保留鼓岭的房产土地，好作教会未来培训同工之用，就发动全国各地四百七十五个聚会处的信徒签名。这件事做得不够智慧。在倪柝声个人来说，他这样作是出于高尚的、纯正的动机；在政府当局看来，是纠众要胁政府，是违抗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更加离谱的是，为了迎合新政权的政治需要，倪柝声和少数的同工们，又在各地信徒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份32782人的签名名单，作为各地信徒赞同加入三自教会的表态。这种移花接木的作法，倪柝声固然有责任，其它在上海有分参与和献计的同工们，也难辞其咎。

在解放初期，全国房屋登记管理方面仍未完善。倪柝声当日号召信徒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无可厚非。只要聚会处的反革命罪名得着洗刷，冤案得着平反，宪法已捍卫了聚会处的业权。

这样采用人的办法和头脑，以移花接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讨主的喜悦。当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刊物，毫无实据地，抓住机会，凭空捏造一些消息，来攻击倪柝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于同月出版的《敞开的门》第二十二期发表《几句迫不得已的话》，全文如下：

「近来外面有的刊物，责难到我们的见证，并攻击我们的同工倪柝声弟兄。我们对于这样的刊物，一向是抱静默的态度，不乐于争辩。因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唐守临 俞成华 张光荣 江守道
杜忠臣 许达微 朱 臣 张愚之
缪韵春 李渊如 汪佩真 张耆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办理「接受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专门登记时，倪柝声对上海的各长老说，过去我个人曾接受过弟兄会芮文派和贵橡路督徒交通中心的奉献。但这是我个人的事，与教会无关。南阳路的教会一直是自治、自养、自传。在这一点上，倪柝声所说的符合事实，绝无欺骗成分。因此，上海聚会处的长老，包括俞成华、朱臣、杜忠臣、唐守临、张愚之、顾柏涛、任钟祥等，发表联合声明：「按本教会是中国信徒自行设立的宗教团体，一直自治、自养、自传，亦未与任何外国差会发生关系。」

政治局势演变之迅速，远远超过倪柝声的想象，实非他所能适应。不过，倪柝声为了追上时代，学习新思维，尽量调整自己。问题在于，他所持守的信仰和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何况，要在基要的信仰上不妥协，他需要确定自己的底线。这确是一场痛苦的思想挣扎。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务院文教事务组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了「处理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参加的基督教领袖有一百五十一人，倪柝声也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后所发表的宣言，说明了一件事，即基督徒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新的政治环境，不容许任何基督徒置身度外，以超政治的身份自居。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在全国有一千多个聚会处，弟兄姊妹人数高达九万多人。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倪柝声在上海的弟兄姊妹面前，作了一次石破天惊的讲话，他说：

「从北京会议之后，我回到上海，我里面起了一个极大的争执，或者说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思想斗争，就是到底我们『超政治』可以不可以。……你们知道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完全传宗教，不摸任何其它的事。我们好像对于所有的事，都不感兴趣，只感觉宗教的事有兴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工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摇动。我在北京所听说『超政治』是错误的，这叫我非常为难，因为我没有认识超政治是错误的。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我在这么多年之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来没有作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最近的时候，联络员特别提起应当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我觉得如果要我起来这样控诉，是叫我撒谎。弟兄们，我实在是难过，我觉得我如果要避免人的审判，而落到撒谎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又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接我回去！』……这几个基本的问题，叫我非常困难，困难到盼望早日离世。」

在这篇《我是怎样转过来的》的讲话中，倪柝声的结论改变了他多年来所持守的理念。他说：

「我现在是转过来了，但是这也不是一下子转过来的。我们已往认为信徒是能够超政治的，如今我看见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觉得也好，你不觉得也好，总有某种政治的观点。你不能说你相信了耶稣，就没有政治的观点。……就如我们的三自，从宗教的观点上去看，我们的的确确已经三自三十年了，但是从政治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三自，连一天都没有起头。……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有许多东西是神圣的，圣经是神圣，祷告是神圣的。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一样是神圣的。任何东西能够达到它的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国主义的眼睛里没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你们必须有反帝的立场，有人民的立场。」

有的人为了本身的政治立场，在海外不承认倪柝声曾发表过《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但事实终归事实，最近灵石出版社编的《王明道日记选辑》一书中，也述及倪柝声曾写《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是为佐证。另有一班人，说倪柝声全盘抹煞了西教士对中国教会的贡献，抹煞了和受恩教士和其它西国传教士早年对倪柝声的帮助——灵性上的和实质上的，其实不然，倪柝声在政治立场上进行再思时，并没有出卖福音派，也没有全盘抹煞了某些福音派宣教士历来对中国教会的贡献。他在《我是怎样转过来的》，这样结语：

「但是我们要清楚，反帝不是排外，不能把一切西国传教士都看成是帝国主义，当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传教士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那些彻底奉献一切，撇下一切，为爱人民的灵魂来传福音的人，

不至于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这是极少数的人。」

倪柝声虽然转过来了，但是转变得不够彻底，政府当局对他仍有保留，仍在密切地观察他。另一方面倪柝声发觉到聚会处后继无人。这时他幡然觉醒，已往他反对神学院，认为办神学院是错的，此时反而觉得要尽速成立神学院，为教会培养新一代的教牧同工。他为此专诚拜访了杨绍唐，想与杨绍唐联手创办神学院，为时已晚。

实际上，倪柝声也无法完全否定神学院的功用；倪柝声的几位重要同工，汪佩真、家父陈则信、阎迦勒、黄履铨、缪韵春，都来自神学院。倪柝声的恩师和受恩教士也出身于神学院。不错，倪柝声生前来不及办神学院，但鼓岭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训练，就具备了神学院的雏形。他晚年与杨绍唐办神学院不遂，至今多数人不知这个历史事实，也就不见报导。

倪柝声除了在政治立场上的再思，承认已往超政治的立场是错误的，连带地，他也立意从生意中抽身，不再介入企业上的经营。已往，他赞同使徒保罗织帐棚的作法。不过，保罗织帐棚毕竟是个人的操作，是个人的兼职，如今生化药厂这类大型企业，涉及数百人复杂的人事关系，无法避免一些是非问题。此外，大企业还要面对股东的质询、董事会的监管、政府对逃税漏税的查究等等。因此，转变后的倪柝声，完全赞成把上海生化药厂合并到东北制药厂，以正面的态度，积极地回应新政权所推动的公私合营运动。

在上海生化药厂并入东北药厂之前，上海生化副经理史济汤以三万美金买进一台高压锅，用来制造 P. A.S.。当时爱国心切的倪柝声，一心一意要突破美国禁运封锁，在国家外汇短欠的情况下，向香港的陈锡日弟兄借三万美金，倪柝声向陈锡日声言，会以美金归还。当年美金和人民币官价的比率是一比二，黑市是一比十。在高压锅送达沈阳的东北药厂时，东北药厂也同意付倪三十万人民币。一生谨慎的倪柝声，就在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时，被人检举他盗窃国家资财达人民币二十万。事实上，他在购买高压锅上并未得益，三万美金悉数归还了陈锡日。

有一件事，是别人罕有提及的，即前生化药厂总经理李升伯，为上海纺织界购入数百万美金的纺织机器。机器到达香港时，大陆变色，不义的人会扣押这批昂贵机器在香港，藉以牟利。此时李升伯适任香港永生布厂董事总经理，当时他与在港的倪柝声常有接触，在倪柝声的爱国教育下，加上李升伯本人也是一个民族意识甚强的资本家，他既爱国，又公义，决定把全部留港的纺织设备送到上海。此项行动，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倪柝声固然转过来了，认识到超政治是错误的。中央政府也再三强调，说明共同纲领保障宗教自由。只是有一样令人担心的，即政府作出一项保留，声言宗教自由为拥护政府的人所享有，而不为反革命份子所享有。这时，一些新派处心积虑地要把倪柝声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使他不能享有共同纲领为他提供的宗教自由。有人首先要倪柝声控诉芮文派弟兄会和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倪柝声控诉不来，他与芮文派来往时日甚短，早已断绝了关系；至于他和贵橡路负责人史百克，从未谈到政治的话题，史百克一直是一个主张政教分离，信仰纯正的清教徒。

在摩登派的眼中，倪柝声思考过多，不肯轻易就范，是不服从党的领导的表现——此时新派控制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他们一旦认为倪不服从领导，就予以无限上纲，说他阳奉阴违，是与政府对抗，认定他是反革命份子，应该予以控诉揭发。

上海青年会的刘良模，于是发动一次控诉倪柝声的集会，他搞来一个守真中学的学生吴维樽。吴维樽在会中站起来控诉倪柝声所创作的诗：「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与会的弟兄们听了，说这根本不构成罪证。有的弟兄姊妹动了义气，非常激动，齐拥向前，抢去吴维樽的发言稿。王大和弟兄跳起来喊：「你控诉我们的信仰了！」刘良模也和吴耀宗一样，属摩登派，他们仇视福音派。在基要派眼中，摩登派的信仰不纯正。

倪柝声预感到，不久，自己将失去自由，有感而作了诗，共七节，兹录下第一节和第三节：

一 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
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
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
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
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虽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副歌 你来！你来！我们呼求你快来！

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
我们等候你快来！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倪柝声在上海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被来自沈阳的公安人员逮捕，被送到东北囚禁。五反之后倪柝声又被押回上海，继续审查倪柝声的其它问题。

从一九五二年四月到一九五五年中，海外的信徒不知道倪柝声在监狱里的实际情况，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有关倪在狱中的传说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主要原因是审讯过程中，没有任何律师为他辩护。许多罪证不是在现场搜查到的，是否栽赃，成为案件的关键。

第十五章深入研究传记人物

几乎所有的属灵人物，都喜欢研究传记人物，希望从其它属灵伟人的生平和教导得着帮助和鼓励。整本圣经罗列了许多传记人物，四福音更集中述说了主耶稣的生平，可说是主耶稣的传记。

我们若阅读倪柝声着的《七个金灯台》（原名《教会的正统》），和《我们是什么》，读者们会发现，倪柝声博览群书，对传记人物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倪柝声甚至对天主教中的奥秘派和敬虔派都有涉猎。这里录下他在《我们是什么》中的一段：

「在天主教中间有一个新的发现，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其中有莫林诺（Michael Molinos），为他们中间最属灵的人。他于一六二七年出生于西班牙的萨拉歌沙（Saragossa），死于一六九七年十二月。一六七五年他所著作的《灵程指引》（The Spiritual Guide）出版，教导人如何舍己、如何与主同死。这本书在六年之内译成西欧几种主要的语言，包括义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这本书成为当年一本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与莫林诺同时的有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生于一六四八年，死于一

七一七年，是法国历史上罕有的属灵伟人，她对于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如何舍己等，更有认识。她所写的传记《馨香的没药》，是一本很好的、很属灵的书。她的见证著作，非但影响了法国，也影响了全世界。

「此外还有法国的芬奈伦 (Francois Fenelon)，是法国甚有威望的主教，他竟肯为主受苦，付出重大代价，与受尽迫害的盖恩夫人同工。神在天主教内部兴起了这些人，释放了很多属灵的亮光。在当时的世代中，属灵生命最深的人物，都是产生于天主教中；更正教在初期所着重的，主要是因信称义的道而已。除了以上三位，尚有亚尔诺德 (Arnold Gottfried)，他曾著作了许多书，论及教会问题。亚尔诺德认为当时的教会已偏离了真理，而正确的教会，必须回到新约圣经的立场上，才能被建立起来。在这里你看见有两道水流：第一道水流是

从莫林诺、盖恩夫人、芬奈伦等人流出来；第二道水流是从亚尔诺德所代表的人流出来。这两道水流，以后汇合在一起，成了一七〇〇年间兴起的非拉铁非教会 (Philadelphia Church)，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

以上摘录的是倪柝声在《我们是什么》一书中的片段，重点在于说明，他阅读传记时，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能够融汇贯通，说出历史是一脉相承，说出历史是有其明晰的脉络和轨迹的。

倪柝声又在《怎样认识自己》一书中，引述了一系列传记人物。在该书里，他说：

「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能看见许多最圣洁的信徒，因着他们看见神的光的缘故，知道了他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我们底下要引述的人，谁能说，他们不是教会中最突出的人物呢？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却是这样的卑微。这无他，乃是因为越亲近神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软弱；越得着神亮光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败坏。骄傲、自是的人，都是因为没有看见神的光。」

接着倪柝声在《怎样认识自己》里，引述了历史上的八个伟人，他们是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本仁约翰 (John Bunyan)、乔治·怀特腓 (George Whitefield)、亚古士督·托普雷狄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约拿单·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大卫·布莱纳 (David Brainerd) 和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转载倪柝声在《怎样认识自己》一书中，对这八位属灵伟人的简介。我在基督徒出版社的《属灵伟人小传系列》中，已经出版了八位伟人中的六位的小传，还有亚古士督·托普雷狄和大卫·布莱纳的小传仍未推出。

倪柝声既熟读了历史上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又尽其所能把他所学习到的心得，与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晚上，倪柝声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讲道，当晚我也在场，他介绍了一位华人布道家乐非力，内容如下：

能很坦率地向你们见证说，乐非力是很早就把自己奉献出来，变卖一切为着主的人。他在属灵上是一个很强、很肯出代价的人，他有许多东西是信主的第二天就交出来或者了结的，包括他拥有的烟厂结束了。乐非力在东北三省被号称香烟大王，辖下的烟厂没有一间是小规模，共有二十七处分公司，一百多处代售所，但他信主后一两天就不计代价地把全部烟厂关门。在此之前他所拖欠的债他都偿还，至于别人欠他的，他一概不讨还。乐非力弟兄是一位顶会给人的弟兄，有一位弟兄向他借一百元，那时他口袋中只有二十元，他就把家中仅有的一张俄罗斯制造的、顶好的绒毯子拿到当铺当掉，凑足了

一百元给那弟兄。等一下乐师母回家了，到卧房里一看，绒毯子不见了，就追问乐弟兄，乐弟兄就安慰她说，我们乃是给主。我们是主的仆人，乃是事奉主，理当尽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祂。乐非力作为我的同工，在配搭事奉时，显出他是舍己的人。他在好多年前曾到香港服事主，在经济上不知道受到多少的试炼。他原是东北的大财主，竟甘心为主自愿成为贫穷。乐非力弟兄不仅爱主，许多人能见证他真是爱弟兄姊妹，是彻底脱离自己的人，神借着祂，拯救许多人、造就许多人。在此我们看见有一位弟兄脱离玛门，就能爱主、爱弟兄姊妹。断没有一个弟兄是斤斤较量而能爱弟兄的。」

倪柝声在不同的场合，说他亏欠乐非力弟兄，说他多年来在生活上照顾乐非力不够，倪并承认乐非力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布道家。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晚上，倪柝声弟兄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续谈传记人物。在讲道之前，他领唱罗伯斯（Evan Roberts）的诗歌《我王必定快要再临》。该首诗共八节，这里仅录下首二节：

- 一 我王发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祂！
待赎宇宙快见光明，主要完成救法！
我已听见祂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
我已看见祂的荣身，隐约显露在天；
- 二 我今仰望我主「同在」，不敢懈怠一点；
我今等候我主再来，使我得着所天。
除了我主此刻就来，接我与他同在，
除了这件美事以外，我心别无所爱。

唱完这首诗歌的第八节之后，倪柝声开口说：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罗伯斯，他带进了威尔斯（Wales）的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乃是从罗伯斯起头的。罗伯斯没读什么书，不过是个矿工；但是他带进世界第一大的复兴，就是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是一个顶大的地方，罗伯斯则在一个小礼拜堂里；他没有讲整篇道，也许只讲五句话，或者祷告几句。但会众都是又哭又跳。他们没有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聚会，无论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有聚会，半夜可以，清晨也可以。几乎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有复兴会，都有祷告。讲道者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这一个人起来选一首诗让大家唱，有时候有人起来读几节圣经。

「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有贵格会背景，对自己很严紧，她也跑到威尔斯去看，看见那一个聚会真不像聚会，有的母亲在那里抱着孩子喂奶，有的人在那里吃饭，有的人祷告，有的人唱诗歌。外面乱极了，好像作买卖似的。但宾路易师母见证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有个顶莫名其妙的东西，是顶特别的；外面听起来是顶吵，但在里面他们是合一的。这是发生在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的事。到了一九〇九年时，有弟兄们从英国去那里访问，有某城的牧师告诉来访的弟兄说，我们这里得救的人数一年少过一年，到这一、二年简直就没有人得救。访问者说，那岂不是说，这复兴退步了吗？那牧师回答说，不是的，乃是因为这里的人全都得救了。

「今晚我们在这里唱罗伯斯的诗，能够从诗里摸着历代以来最刚强的灵。罗伯斯能带进这样的复兴，因为他是什么都能摆上，什么都能舍得，什么都能不顾念的。

「罗伯斯作的这首诗的第二节，『同在』在希腊文是 *parousia*，是指因着主的降临，主的显现，享受主

的同在。主固然还没有再来，但我们能够把主的同在移来。这样的同在，要使我们受捆绑，受祂爱的约束，不敢稍有懈怠。但愿我们所有的生活工作，都受主同在的围困、制约，不敢稍微偏离。」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倪柝声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领会的时候，他首先点唱了英国的杰出诗人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诗歌。

这首诗分三节，照录如下：

一 主，你得胜，我今服矣；恩典强迫我的心意，奉献一切于你。

你的可怕我能久排，但谁能抗你的大爱？爱大，我无能力。

二 你若命你万钧雷霆，鞏我灵魂向我施刑，我仍固执不悔；

但是怜悯征服我心，以往抵挡销化净尽，现今我恨我罪！

三 我今羡慕单独归你；主，来，占领这个陋器，作为你的所有。

我既脱离撒但暴手，就愿全人毫无保留，服事你到永久。

弟兄姊妹们唱完这首诗，倪柝声开始说话：

「这是约翰·牛顿的悔改诗歌。虽然也有些人把这首诗歌当作福音诗歌用，然而这首诗歌在信徒聚会中吟唱时仍然极为有用，许多人从这首诗得着启发，得着帮助。」

倪柝声接着说：

「牛顿于一七二五年生于英国伦敦，他父亲从事航海事业，常年在外，教养的责任全落在他敬虔爱主的慈母身上。她常带着约翰·牛顿屈膝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她并教他读圣经，牢记诗歌。当他七岁时，慈母突然因操劳成疾而病逝，这打击使他步入歧途，十岁起就跟随父亲航海，在异乡他过了二十多年流荡的浪子生涯。他少年时就效法其它水手放浪形骸、酗酒赌博。他曾多次听福音，每次听时，就倍感扎心，忆起儿时慈母的容颜与教导，但他始终无法自拔，仍旧沉溺在罪恶之中。之后他在非洲从事贩卖黑奴的勾当。结果却闹出事情，反而自己被卖为奴隶，遭到苦待、折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曾使他企图逃亡，但却换来剥衣鞭挞之苦。几年后他父亲才探知其下落，用钱把他赎回。

「就在他坐船返乡途中，有一天忽遇暴风，眼见小船就要倾覆，但主耶稣就在这时答应慈母在他幼年时将他奉献给主的祷告。一阵阵暴风猛烈的吹袭，竟吹热了他冰冷的心。那激浪的摇撼，摇醒了他死沉的灵。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犯罪作恶，想到年幼时慈母对他所讲述的恩主爱他的故事，就是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却为他流血受死！这恩是如何的大！他不觉大声地呼求主的名，向主祷告，悔改认罪而信主，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日后，他将自己完全奉献，事奉主一直至死。

「约翰·牛顿写了许多很好的诗歌，包括《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我们今晚选唱的这首诗，是他悔改时写的诗。这首诗是关于悔改写得最好的诗歌。这里说，人虽然说地狱可怕，虽然说神的刑罚多可怕；但我不怕，你将奈我何？但神不是用祂的刑罚来威吓人，乃用祂的恩典、祂的大爱，强迫人悔改。许多人信主进来，不过就是信主而进来，但是约翰·牛顿乃是顺服而进来。保罗的悔改乃是被打倒了，顺服而进来。约翰·牛顿也是这样。我们如今吟唱这首诗歌，是应用在难以奉献之时。」

笔者再三地述及倪柝声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介绍传记人物的事迹，因为这对本人有多重的意义，影响了我长大后也研究传记人物。

一九五一年初，九龙天文台道五号会所建成，佐敦道七号二楼，这个倪柝声传讲传记的历史性场所，

竟奇妙无比地成为我们一家七口——祖母、家父、我和四个妹妹——的住宅。每当我站在倪柝声传讲传记人物的位置，留连这年前的讲台，感慨万分。我望向窗外，看到对面的佑灵堂（Union Church）——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王明道在该教堂讲道时，我父亲曾为王明道把国语译为汕头话。

我非但从倪柝声口中听到许多传记人物，我一生也接触到许多属灵的伟人，同时也会晤过一些政治上的传奇人物。在潜移默化中，使我对研究传记人物情有独钟，从而喜欢阅读人物传记。长大后也从事撰写传记人物的工作，包括主编及撰写《属灵伟人小传》。

第十六章 隐秘的事知多少

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样写道：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的父亲陈则信在东南亚作差传工作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于是由马来亚辗转到暹罗，战争结束后父亲才回到福建厦门。

当先父决定携带我们全家到暹罗的时候，我只好从鼓浪屿英华中学辍学。那时我并不喜欢离乡背井，只是我们的脚步乃是神所规定的，完全不在我们掌握之中。

新加坡聚会处的陈郑树庄姊妹，还有她丈夫陈怀天，此时到暹罗教书。透过他们的介绍，我父亲把我送到被称为「暹罗华侨最高学府」的中华中学就读。陈怀天是该校的教务主任，其妻子陈郑树庄则任该校英语教员。

我父母亲和郑张萍姊妹——郑树庄的兄嫂在鼓岭参加第一期同工训练的时候，暹罗的銮汶元帅实行排华政策，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查封了中华中学。

中华中学被查封时，父母正在鼓岭。有一天，我在家时，突然看到自己满身污秽，由于我从小听过福音，知道唯有倚靠主耶稣的宝血，我的罪才能得着赦免，我于是向主耶稣认罪并接受祂为我的救主，同时我也把自己奉献给祂。

为了继续求学，我就回到汕头。我一到汕头，就写信给在鼓岭受训的双亲，请求他们的指引。他们于是把我回到汕头的情况，告诉了倪柝声。倪柝声看着我长，在厦门、在汕头，在上海，他都到过我家，甚至住我家里，读者可以从我父亲写的《倪柝声弟兄简史》中了解详情。起初倪要我上鼓岭与父母住在一起，过了天，他们又觉得一般学校九月开学，而鼓岭又没有一所较象样的中学，遂吩咐我暂时留在汕头。我于是报读汕头的韦怀中学，在韦怀同班的有来自曼谷中华中学的同班同学林少明和罗楚荣。韦怀中学的校长是国民党的死硬派卓效良，而当时的汕头又在喻英奇的极权统治之下。我在汕头，与一些年弟兄姊妹作露天布道。我当时只有十五岁，一穿上福音背心，就在中山公园传福音，我说国语，由林双木翻译成汕头话。我也曾到汕头的医院，向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伤兵传福音，内中有一位彭勉奇，听了福音后信主得救，后来成为我父亲在香港的同工。在汕头，我由蔡寄庐给我施浸，归入主的名下。

在上述的情况下，我没有想过——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供述我出身于左倾的、进步的中华中学。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为止，中华中学校友总人数为一千三百一十七，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

件无法否认和抹煞的历史事实。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更加不适宜向汕头的任何人披露。而倪柝声弟兄远在福建鼓岭，我更没机会向他陈述这一切。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刻意向倪柝声隐瞒既往的一切，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華我们的神。发生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事，都有神的美意，冥冥中都是神的安排。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黄得恩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致史伯诚的信中，透露了一个历史秘密，即黄得恩参加鼓岭第二期训练时，他亲耳听到倪柝声在鼓岭用两晚时间，讲及倪柝声在抗战时期及抗战后，曾跟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倪柝声并吩咐黄得恩等人不要写下这两晚讲话内容的笔记。问题在于，中共中央档案部门，整理中共地下党南系的档案时，有否发掘出倪柝声与地下党发生关系的笔记，又中共中央社会部封存的档案中，在时机成熟时，会否公开倪柝声的档案资料。

我父亲在《倪柝声弟兄简史》中，提到倪柝声调到香港的简单过程：

「第二期鼓岭训练结束后，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先后离开，倪弟兄也来到香港。神的带领及管理，是何等奇妙！他到了香港，看见教会的光景，觉得这一个地方，将来可能成为主见证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必须加强这里的教会和工作。为此他就写信给我，要我离开厦门来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同时一连好几次打电报催我从速来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应命而来。」

我在这里要补充我们一家未来香港之前，在厦门鼓浪屿发生的隐秘的事。

有一晚，我父亲在鼓浪屿黄家渡的聚会处讲道，聚会完，我伴随父亲步行回住宅时，有一位元在厦门中南银行服务多年的单亚生弟兄突然要我们到他家里去，说有重要的话要跟父亲说。我们到了单家，单亚生对我这小孩子在场，并不在意，其时我才十六岁。从小我就和他儿子单寄平为伴，也曾到过他家里住宿过夜，故单亚生对我也就绝对信任。单亚生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先父说，他实际上是中共的地下党员，由于厦门的国民党特务其时正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他不日要到漳州避一避。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我父亲反应平静，默不作声，我则大吃一惊，想不到单亚先对我父亲这样信任；另一方面，我更想不到远在曼谷的中华中学，近在鼓浪屿的黄家渡，都有共产党人。

我们一家到香港后，在搬进菁社别墅之前，曾有一段短时间住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而单亚生一家，在解放后，也在我们抵港后不久，借道香港和我父亲小叙数天，然后北上，后来在中央财政部任职。述说这件事，是要说明：聚会处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在聚会处的信徒当中，有不少是热爱国家，忠心于人民的。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倪柝声在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开始讲交出来的信息之后，我作出回应，把自己奉献给主，当时并没有人要求我交代自己的历史，更没有人要求我述说自己的思想状况和政治观点，何况当年我只有十七岁，我又是教会领袖陈则信的儿子。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眼光中，我的出身最为清白单纯。

到了一九五二年初，在倪柝声弟兄失去自由时，我正在培正中学读高中三，此时突然收到一封信，安排我到英国读书。我从来没有想到倪柝声弟兄会真正留意我的前途。以往，我曾感到倪弟兄在暗中注意我，暗中关心我，并有意培养我，如今我的揣测被证实为准确的。

更加令我惊喜的，是倪柝声和家父把我交托给他们一直尊崇和敬爱的史百克弟兄，史百克被委托为我法定的监护人。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我乘搭 Corfu 号客轮前往英国，同行的有培正中学和我一起毕业的赵世彭、赵世仪两兄弟。同船的还有聚会处的王镇辉，和一位曾在安徽大学任教授的任纳（George Rainer）。

在船上，任纳对我说：「Cepher（我的英文名），一到英国，我们一起去拜访陈源，他别名陈西滢，是中国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一切的事，其实都有神暗中的安排。我在到达英国之前，从来没有想到会和法国结下不解之缘，任纳说起陈西滢时，又说到陈西滢人住在伦敦，却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这个新「双城记」，在年仅十九岁的我，听起来新鲜，却没有想到，同样的事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原来倪柝声认识前南京中国银行程觉民；而倪柝声的堂兄倪树祖则是上海中国银行行长，当然也认识程觉民。程觉民在香港期间，和我父亲交往频繁，当他获悉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建议我去拜访中华民国驻法国大使段茂澜，说段茂澜是他好朋友，他会直接另写一封信给段茂澜，段茂澜确是盛情招待我。就这样我在法国巴黎有了两道重要的人事关系。

至于国际刑事员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在我出生之前十年——一九二三年是由维也纳警察局长约翰·萧柏博士（Dr. Johann Schuber）发起，约翰·萧柏曾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出任奥地利首相，在欧洲甚有威望，顺理成章地，当年国际刑事员警委员会的总部也就设在维也纳。约翰·萧柏出任国际刑事员警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战后的一九四六年，召开国际刑事员警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会议决定把国际刑事员警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巴黎，秘书长一职，由路易士·都洛斯（Louis Ducloux）出任。

由于我还未年满二十一岁，根据英国法律，我父亲必须书面授权史百克，为我合法的监护人，而史百克就以我父亲的授权书，向英国移民局办理我的居留。在经济上，史百克不需要支援我或补贴我，因为我母亲（陈张雅淑）在泰国曼谷经营家宰公司（Grace Limited Partnership），每年收入可观。我母亲每年把一笔数百英镑的款项（在当年是笔大数目），直接汇给史百克，而史百克对我监管甚严，每星期支付我十先令的零用钱。

在我到英国之前二十年，即一九三三年，当倪柝声访问英国弟兄会时，私下访问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结果被弟兄会大兴问罪之师，导致倪弟兄与弟兄会的关系破裂。当我在英国期间，也作出类似的事。史百克一直严禁我与不同教会立场的人有频密的交往。我刚到英国头几个月，曾在米道塞斯郡（Middlesex）的小镇宝纳园（Pinner Green）的彻斯德私塾（Chester House）进修英国语文，主日则往威伯利公园（Wembly Park）一个聚会点聚会，该聚会由赫利斯（David Harris）弟兄——史百克的同工带领。那里的负责弟兄之一郝洛卫（Stephen）Holloway，和我谈话很投契，不久我们常分享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福分。

可惜，威伯利公园的聚会，竟不幸分裂，我的知交郝洛卫到别处聚会，但私下仍与我有来往。这事被史百克知道了，大为不悦，写了一封长达十页的信件，劝郝洛卫今后不要与我来往。史百克说，他对我负有属灵上的教导责任，他是经我父亲亲笔授权的，他是我在英国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拂逆史百克的意思，不完全顺服他，因我与郝洛卫私交甚笃，两人一直保持来往。

另外，我又间中参加王又德牧师（Rev. Stephen Wong）主持的伦敦华人教会。王又德一见到我，便想到他在北京与王明道相处的日子，常为王明道被监禁一事而祷告；我则为倪柝声被囚禁而求神施神迹释放倪柝声。于是王又德同样成为我在伦敦另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不过，史百克弟兄那里的聚会虽然常为倪柝声祷告，却并没有和王又德的华人教会有来往。王又德于是不时向我抱怨，说史百克是闭关主义者，说史百克对华人教会毫不关怀、漠不关心。

实际上，我不喜欢在英国的行动受限制，希望有自己活动的空间，在这方面和倪柝声当年在英国的表现，毫无二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对原来的教会组织不忠，有叛逆性；而是我们寻求属灵交通时，想扩大接触面，与其它信徒分享更多灵性上的经历。

此外，由于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心，我非但参加华人教会，也参加伦敦的中国学生会（China Institute）。为了推动世界和平，平息朝鲜战争，我又支持在日内瓦所举行的和平会议，和中国外长周恩来、副外长李克农建立了友好关系。宦乡到伦敦出任代办之后，我又和宦乡、军事参赞李欣有接触。由于我太活跃，史百克开始控制不了我。史百克除了讲道之外，出版《见证报》，他既不能全时间看管我，就委托岱勒（George Taylor）夫妇分担看管我的责任。

有一次，鲍志成夫妇带着女儿鲍俊贤由非洲的毛里求斯岛来到伦敦。鲍医生一家经王又德牧师安排，住在王牧师的「安息之家」（House of Rest）。鲍志成医生一家人在英期间，曾来贵橡路探访我，我介绍他们给岱勒夫妇和奥格公爵夫人（Lady Ogle）认识。我又告诉贵橡路的人说，倪柝声师母，和我们一家，在九龙就是在鲍志成家里参加主日擘饼聚会的。

一九五四年，我报读麦德西学院（Battersea Polytechnic），每天从贵橡路坐火车往返，太过劳碌；我于是向史百克请示，可否让我暂时到麦德西公园（Battersea Park）附近住宿，这样上课方便得多。由于我找到的房间是圣公会的牧宅，史百克也就放心，让我在上学期期间，暂时搬离贵橡路。

一九五五年中，台湾浸信会的张容江牧师突然到伦敦参加世界浸信会大会，我征得房东圣公会牧师巴威尔（Rev. Edward Bardwell）的同意，在我房间多搭一张临时床，安顿了张容江。张容江的妹妹张宝珠，是我父亲在香港的同工，曾住过我们的家（菁社别墅）。张容江的姊夫赵君影，则是我父亲的朋友，当我搭船经新加坡时，曾拜访了赵君影。

在世界浸信会大会上，我遇到了来自香港的代表，一位是我在培正中学的校长林子丰，一位是刘光升——培正中学的宗教主任。浸信会大会期间，每晚巴威尔牧要师、张容江牧师与我共进晚餐。张容江牧师很健谈，滔滔不绝，三人的交谈又涉及广泛的问题，每晚都尽兴才回寝室。

有一天下午，我在森林山（Forest Hill）一人独处时，忽然痛哭起来，想起我于一九四八年得救时，我向神许愿要作传教士。当我在一九五〇年回应倪柝声的呼召时，我写下纸条，白纸黑字写下要奉献一生事奉神。当倪柝声、我父亲把我交给史百克教导时，他们原是盼望我成为属灵事工的接棒人，谁料到，我的复杂社会关系竟然不能取悦于史百克，这个变化太大了，粉碎了我原来的心愿。至于我所素来敬仰的属灵启蒙大师倪柝声，此时却身陷囹圄，下落不明。

一九五五年秋天，史百克访问香港。见到了我父亲，史百克问我父亲有否倪柝声的最近消息，我父亲答说没有。史百克又谈起，贵橡路的巴若兰小姐（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和钟玛利小姐（Miss Mary Jones）不久会到香港作宣教工作，他们会在属灵事工上，襄助我父亲。巴若兰小姐曾是倪柝声得力的

助手。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由伦敦飞回香港，在我抵步前，史百克已由香港飞到台湾，在台北仁爱路聚会所有一系列的讲道聚会。史百克在台北期间，接到伦敦史百克师母的通知，说我在伦敦行踪飘忽，不留宿贵橡路，另外巴若兰和钟玛利两位传教士又有信息传来，说她们两位在伦敦 Peckham Rye 的莱恩餐厅（Lyon Restaurant）和我碰头，劝我要回贵橡路教会，要我亲近主，她们只见我支吾以对，似乎心神不定。

史百克在台北的聚会一结束，和女婿金弥耳（Angus Kinnear）一起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同工们——吴仁杰、缪绍训、庄德添等会晤。他们在机场匆匆数语后，史百克就返回旅馆房间，写信到香港给我父亲，述说我这浪子，在伦敦颠沛流离，不受他师母的管教约束。史百克信件到达香港时，我父亲已飞到曼谷。那段日子我母亲正在管理家宰公司，而我哥哥慰中在辞掉香港生化药厂的工作后，在曼谷帮助我母亲数年后，其时慰中正在美国留学，所以我父亲不时要到曼谷探访我母亲。

史百克给我父亲的信寄到香港，我乘父亲不在，就拆开来看，发现史百克向父亲说我的不是，我心里十分难过。我不责怪史百克，是我行动不会拘束所致，我于是作出一个决定，要亲自到上海，在现场审视倪柝声的案件，因为这案件牵连甚广，并与我休戚相关。

第十七章这是一桩冤假错案

我是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从罗湖进入大陆的。

这是一九五五年底，从北方至南方，最后轮到上海，倪柝声弟兄在聚会处的其它同工，纷纷受到逮捕。人数高达数千人，计有北京的房爱光、天津的夏习灵、青岛的张子洁、西安的李因信、烟台的赵旭初、南京的季永同、杭州的徐明、马迪生、苏北的丘日鉴、牛文淦、吴名灰、苏州的俞崇恩、温州的黄覆铨、南京的丁荣施、重庆的陈希文、福州的陈必荫、余笃信、福清的林子隆、广州的余道胜、郑德尔、汕头的孙律典、厦门的王灯明、蔡志崇、柯怜悯等等。

这场政治风波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冤狱，结果构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冤假错案，被逮捕的数千人，都是一些抚尘不染，不知政治为何物的清教徒。他们有如中世纪在欧洲的重浸派和贵格会，被定性为反政府分子，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本钱，也没有能耐，去推翻政府当局。许多聚会处的信徒，在牢狱中被折磨了许多年——有的达数十年，不少甚至命丧狱中。正如南京的丁荣施所言，当局始终找不出真正的反革命罪证来。

对上海聚会处同工的逮捕，开始发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先后逮捕了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朱臣、陈本微；稍后又逮捕了俞成华、左弗如。

黄得恩亲历其境，作证说：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南阳路那座楼，上上下下一片哀哭，许多人痛不欲生，都切望自己也被捕，甚至有人要求政府逮捕。」

翌日，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宗教事务处在天蟾舞台召开了二千五百名基督徒的大会，大会由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伯明当众宣称破获了倪柝声为

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宣布了所谓的首恶份子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的罪状。此外，公安部门又委派邵洛羊任肃反队长。邵洛羊在五反时期曾任上海生化药厂五反检查队队长，深获上海市公检法部门的信任，南阳路聚会处，特别成立了信徒学习委员会，由刘约翰任主席，张锡康任办公室主任，许梅骊任秘书、张主怀任《通讯》刊物的主编，在其它几十名委员中，还有同工左弗如。

一九五六年三月中旬，正当我往日所认识的周康耀、张主怀、俞崇信等在南阳路学习之际，我来到南阳路，告诉他们我从英国、法国回来。

我甫到上海，一下火车，就投宿在天目路的嘉露旅馆。在南阳路遇到俞崇信时，他很有爱心地要招待我住在他家里。其时俞崇信的父亲俞成华刚过世没有多久。我压根儿不相信俞成华会如他们所说的是反革命分子。在俞家，俞成华师母对我的爱心款待，使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至今我对他们一家的爱心，仍感激不已。

不久，我从俞家搬到上海外白渡桥的上海大厦六〇五号房，在那期间我更冷静地思考整个聚会处数千弟兄姊妹被逮捕的案件。我出身于聚会处，而我的父亲更是倪柝声有数的最重用的同工之一。

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瞎子作见证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我无法找出倪柝声的任何罪证。所以倪柝声有没有犯许多不可告人的罪，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没有委身给神，没有奉献，感谢神，借着倪柝声，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借着倪柝声，我被送到英国，接受史百克的属灵教导。即使我日后获得尊荣，我也绝不应忘本。

在上海，我还分别见到了许美莲、张主怀、张锡康、唐守临、周康耀等，还曾拜访了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陈一鸣。上海召开控诉大会时，我还未到上海，但控诉倪柝声的十人中，有两个和我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其中有一位是张主怀，他的女朋友王光霞，是我在香港的朋友王明理的妹妹，王光霞后来前往伦敦，成为我在伦敦的知己王又德牧师的义女，而张主怀的母亲张林元德姊妹，是我母亲在鼓浪屿的好朋友，我从小就认识张主怀和他弟弟张主恩。一九四九年我到香港的几个月，我曾在鼓浪屿张主怀的家里，向其时还未得救的张主怀传福音，张主怀在倪柝声被捕之前从未与倪柝声见过面。所以张主怀控诉倪柝声赋予他特殊的任务，又说倪柝声差遣他到厦门从事反革命活动，是弥天大谎，是绝不真实的。

另一名站出来控诉倪柝声的是许梅骊姊妹，她是香港高秉衡的未婚妻。一九五二年，我未往英国之前，曾与高秉衡、陈供生、单既惠、陈锡日前往浅水湾游泳。那时候我不知道倪柝声就是因为向陈锡日借过三万美金，以黑市价套汇人民币而被东北的公安人员拘捕的。我当时作梦也没有想到，高秉衡和身居上海的许梅骊不能遂愿成婚，后来秉衡竟娶了我的第二妹妹秀美，成为我的妹夫。

从许梅骊在南阳路会所举行的上海基督教青年大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许梅骊和聚会处的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一样，具有典型的清教徒的心态，在潜意识里，实际上他们已受到倪柝声所宣讲「不要爱世界」的影响，这种意识，是这么根深蒂固，塑造了这些青年弟兄姊妹的性格。他们是以极其痛苦的心情，控诉他们心目中原本最敬重的年长弟兄倪柝声。

兹录下许梅骊的控诉：

「我积极，我爱祖国，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所信的神是我多年所认识、所事奉的。自从我蒙恩以来，

多少次祂吸引我，激励我，多少次我曾把自己献给祂——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这一个爱是我没有法子离开的，但我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对祖国对人民有益处的人。这一个要求是实际的，也是严谨的。需要主的恩典和支援，我愿意好好工作学习，我愿意把自己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一面我也有心在教会中摆上我的时间、力量。有时候我会感到负担太重，感到力不能胜，但我总有一个意念——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没有权利为自己有任何打算或保留，我整个人是属于主的。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但是主的命令不停在这里，还要我们爱人如己。所以我整个人也得摆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为广大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属灵方面，我感到需要更多的恩典，更深的舍己。舍己的路必没有错。今天的舍己是真为着神的心意，为着众人的益处，我们所信的、所盼望的、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神在圣经中所命定的，不能有所改变。奉献、舍己、仰望主，求祂纯洁的爱充满我们，叫我们用祂的纯爱来爱世上的众人，渴慕主的显现，盼望神永远的计画成就，并愿祂的国度早日显现。这是我的路。如果看不见这些，恐怕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爱国、爱教的基督徒。但愿神借着实际生活，借着新时代对我们实际的要求，使基督的爱得以流露，使基督的生命得以彰显、成长，使教会装饰整齐，预备迎接基督。」

从许梅骊的控诉言论，察觉到聚会处信徒的一个特点，就是单纯和童真，不喜悦尘世的虚荣，富有浓烈的出世思想；但最令人可惜的，是这些信徒脱离现实，不敢面对现实，以至不知道现实的残酷——特别是政治现实的残酷。

这种性格，也出现在我身上。在我身上，也就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多重性格。

在上海，我有许多可信任的朋友包括俞崇信、许美莲等，他们认识我时，只知道我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是香港聚会处负责弟兄陈则信的儿子；他们哪里会想到，经过了短短的六年，我已经被残酷的政治现实所压碎，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然后又回到福州。我在福建逗留了一年之后，于一九五七年中，重返上海，这次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媒母倪柝声师母叙旧。

有一晚，我请倪师母到锦江饭店吃晚饭，吃饭时她向我查询了许多有关贵橡路的信徒情况，我一一回应她，并说出她所查问的伯得逊弟兄（George Patterson）已经逝世。从倪师母的反应，我发现我所说的贵橡路情况，与倪柝声平时对她说的，毫无二致。从我口中，她证实倪柝声已往对她所言的一切属实，并证实他们夫妻之间无所不谈，非常坦诚，绝不虚假，从不向对方隐瞒一切。我对此感到惊奇，这与我父亲对我说过的，倪柝声不向家人说及工作的事，并不相符。谈话中，倪师母有时重复发问，我显出我不满这种盘问的态度，偶而也就发急了，于是我对倪师母说：

「媒母，倪弟兄在贵橡路住了十个月，而我在贵橡路住了三年，我对贵橡路的了解还不可靠吗？还会少吗？何况，经过了这十几年，贵橡路涌现的新一代的青年弟兄姊妹，为数不少，他们是倪弟兄所不认识的。」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倪师母在香港时，和我一起到九龙太子道鲍志成医生家里参加主日晚的擘饼聚会，就对倪师母说：

「媒母，你还记得我们参加鲍师母家的主日擘饼聚会吗？他们在毛里求斯岛住得厌倦了，过到伦敦，住在我朋友王又德牧师的招待所。鲍志成医生、鲍师母、鲍关柔馨姊妹，和女儿鲍俊贤曾来贵橡路看

我，我介绍他们给贵橡路的弟兄姊妹认识，只是那时史百克不在伦敦，却遇到了奥格公爵夫人（Lady Ogle）。」

吃完晚饭，我送倪师母到万绍祖家里，临别之前，倪师母告诉我翌日她会带牙医到提篮桥给倪弟兄检查牙齿，可见提篮桥看守所对倪弟兄也很照顾。倪师母知道我日后要到北京，就说她会亲自到火车站来送行。翌日，当倪师母告诉倪弟兄她与我见面的情况时，在狱中的倪弟兄叮嘱倪师母去买一条绒裤送给我，因为北京气候不日将要转寒。在火车站临别时，倪师母又再三叮嘱我到北京，要找她大姐张品琤姊妹，又说林家是厦门人，我若在北京和林家用厦门话交谈，一定倍感亲切。

在火车上，我用手抚摸着倪师母送给我的绒裤，心里头觉得一阵温暖。在这方面，我不缺母爱，我亲生的母亲一直宠爱我，一直把她认为最好的赐给我，甚至不考虑到昂贵的费用，要送我到英国留学；而倪柝声师母，也视我如同自己的儿子，倪弟兄更在返回大陆之前，叮嘱他在伦敦的属灵兄长史百克，要好好看管我，辅导我。如今不争气的反而是我，我多年来不务正业，辜负了倪柝声、史百克、双亲等对我的期望。

在北京，我住在东单官帽司胡同平新我弟兄家里。我到宽街聚会时，碰到了我父亲的同工阎迦勒，阎迦勒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宽街我也遇到了倪师母的大姐林张品琤，由于我和林张品琤以往没有交往，她对我还不熟，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交谈。当时北京聚会处人人自危，为了自保，人人都谨言慎行。

我于一九五七年中再次申请出国。与其目睹同一宗教信仰的人纷纷陷于冤狱，不如我到海外为祖国效力，以促进国家的和平统一，从而向国人证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事实上并不存在，证明聚会处根本从未有过反革命的纲领和行动。可惜的是，我的愿望终于落空。

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九月间北京市公安局剥夺了我的人生自由，对我进行劳动教养。

我被劳动教养长达七年之久，部分内容在香港的《南北极》月刊登载过。用依华的著名发表，文章的题目为《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

对于公安部门未经侦察、起诉、审讯而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我能说什么？当我被送到河北省宁河县清河农场作土方工程时，内中包括北京市的公检法干部王文礼、易家岳、周培良等。在劳动教养期间，绝口不谈我在欧洲秘密会晤过周恩来，更没说出我和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关系。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澳大利亚的周天承（高秉衡的舅父）写信给侨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为我辩护，解释是周天承说服我回国服务的。事实上，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监察部部长钱瑛，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全知道我是无辜的。何香凝和有关部门洽谈后，决定把其时被关禁在精神病院的我，送回香港定居。

从我离开伦敦算起，转眼已是九年，我父亲在这些年间，一直为我担忧，昼夜为我祷告，跪到祷告垫子都烂掉了。在贵橡路史百克带领的聚会，除了为倪柝声祷告之外，也为我祷告，伦敦华人教会的王又德牧师在访港期间，找到我父亲，查询我的下落。感谢主，经过了这么曲折复杂的过程，我终于能够离开大陆，与我的父母亲在香港重逢。

这里要拨出一些篇幅，来叙述倪柝声案件的剖析。

许多人指控倪柝声，是根据倪柝声所写的《我生活腐化的情况》。他们振振有词说：你看，这些罪是倪

柝声自己供出来的，他若自己不这么承认，别人无从知道。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所谓倪柝声写的《我生活腐化的情况》，其笔迹与倪柝声的笔迹完全两样，不是倪柝声亲笔写的，有必要进行科学鉴定。若书写的人连模仿倪柝声的笔迹都不屑为之，可谓胆大包天，目中无人。我并不是唯一看到这破绽的人，当年张锡康弟兄看了也有疑问。张锡康的父亲张光荣，是倪柝声在上海最早的同工之一，而张锡康本人曾任过上海生化药厂的审核主任。这个职位权力最大，生化药厂总经理开了发票，张锡康不盖章是无效的，所以他对倪的笔迹应当十分熟悉。

现在请读者们，仔细地读一下张锡康四十一年后（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美国的笔述：

「有一张倪柝声写的《我生活腐化的情况》，我看到这张供词，不像是倪弟兄的笔迹，我怀疑供词是假的。我问展览会的讲解员，讲解员说，是倪柝声在病中写的，但不管是否倪柝声生病时写，笔迹应该一样。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但许多弟兄姊妹信以为真，跌倒的人不少。」

张锡康是聚会处的第二代，我也是聚会处的第二代，我们两个人以往所看到的倪柝声的笔迹，始自倪柝声写给父辈张光荣和家父陈则信的书信。而展览会新聘的讲解员，并不认识倪柝声，却诬称所谓的供词是倪柝声在病中写字，以致笔迹发生变化。这一点辩解的理由，在一员资深的国际刑警看来，完全不能成立。正如上文所述，倪柝声身上百病交集，何时没有患病？即使在他以往病危，以为自己不久人世，拼着一条命写《属灵人》时，笔迹也未曾稍为改变。倪柝声一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笔迹从未因身体软弱，而有所变更。

一九五五年四月，当张锡康与我被唐守临邀请到家中晚膳时。整个晚上，唐守临都没有提起《我生活腐化的情况》的笔迹是否冒充的疑点。事实上，不断受到疾病袭击的倪柝声，在上海提篮桥的监狱里，公安部门给他一间大监仓，有桌子、椅子。他们知道他的英文很好，颇为倚重他，叫他翻译英文科技书，有时公安人员陪同倪柝声到上海图书馆找参考书籍。在这种还算良好健康情况下，为什么供词的笔迹会与他以往的笔迹迥然不同呢？这一点，不能责怪任何被误导的人，在专政下的上海，眼看着周围的人纷纷被捕，谁有胆量去质疑上海公安部门的作法？当年上海的公安部门本身，其实已炮制过潘汉年和杨帆的冤假错案。

概括一句：《我生活腐化的情况》无法证实是倪柝笔迹，属于伪证，表面证据显示是冒签的。换句话说，既然不是倪柝声的亲笔供词，倪柝声的许多罪名也就不能成立。

至于在法庭上摆着许多作证用的书籍，是从哪里搜查到的？这些书是不是在现场缴获的？已往他常住的地方，并没有淫乱的书籍，这些书究竟是怎么突然出现的？究竟这些摆放的书，是什么书？是否淫秽，是否黄色，是否低级趣味，法庭并没有书籍的清单，无法让听审的人根据书名，来判断书的性质。在政治上用障眼法，是惯有的事，若有人仅仅从控诉者口中，听到倪柝声藏有几本淫秽的书，就以控方所灌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假定倪柝声所收藏的书，纯属淫秽的书。这种假定是错误的，是断不能成立的。

倪柝声初到重庆时，住在一间阁楼上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凳子而已，张郁岚弟兄去看他，爬登那阁楼时，木梯会摇摆，又会吱吱作响，但里面没有一本不雅的刊物和书籍。倪柝声后来搬到重庆的生化药厂宿舍，摆设也很简陋，张郁岚去看他，同样没有看见任何不洁净的书籍。

黄得恩在福州的执事之家是看到几十本非宗教性的书籍，全是发表新思想的进步书籍，说明倪柝声为

了更多认识新时代的基本理论。觉得需要明白一些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黄得恩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的信中写道：「倪弟兄之全为主，我可以作见证，我在福州整理过他个人的储藏室、卧房。一句话：简单、朴素。他做到一切摆上，他在地上什么都没有留下，正如一句话：『生前留下一条路，死后留下一个墓。』」

倪栢声夫妇未到香港之前，在福州是和他大姐陈倪闰臣和姊夫陈贤璋住在一起，有两年多同住在福州市泛船浦海关巷的一栋房子里。

陈供生在二〇〇四年初出版的《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一文中介绍了舅父倪栢声敬畏神的品格。这是陈供生在海关巷家里亲自目睹的。

当倪栢声住在九龙钻石山上元岭的寄庐时，他一外出，张宜伦的儿子张振融，以及与张振融同龄的我，往往在倪家翻箱倒篋玩耍，从没有发现倪栢声藏有任何不雅和不文的书籍。正如上文述及，倒是在我津津有味地阅读《上海日报》的言情小说时，倪栢声突然回家，把我手中的《上海日报》拿走，以免这些黄色文章，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

倪栢声一生的最大特点和长处，就是用所能争取到的每一分钟，阅读圣经和属灵书报，他对圣经精湛的研究，在中国教会历史上，至今无人可以与他相比。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潘汤（D.M. Panton）、郭维德（Robert Govett）、彭伯（G. H. Pember）、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史百克（T. Austin Sparks）、达秘（John Nelson Darby）、开雷（William Kelly）、马金多（C.H. Mackintosh）、杜伦巴尔（Charles Trumbull）、宣信（A.B. Simpson）、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麦敦诺师母（Mrs. Charles McDonough）、亚察尔（C.H. Usher）、麦渴溢（Mackee）等属灵巨匠的书籍。他多年来服事主，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家用，三分之一作为奉献之用——包括说明有需要的信徒或同工，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用来买书。

他与伦敦的一些旧书店约定，只要有珍贵藏书，就自动寄给他。他搜罗了几世纪以来的第一流基督教著作，其中有三千多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倪栢声的卧室里，不论是在他婚前和婚后，床下、床前、地板上，甚至床上，一概都堆满了书，内中有释经的书、人物传记、教会历史、圣诗的作者生平，种类繁多。

倪栢声的住所——从卧室到客厅，没有多余的空间摆放那些有伤风化的书，他也没有空闲去读这些书，他的思想不是空白的，他的思想里也没有位置留给污秽不洁的思想。倪栢声的讲道不是靠天分，不是在一两天内准备的，也不是临场即兴发表的，他的讲章的内容都经年累月，从经历上得着的。难怪他的话语是那丰富、那么流畅，那么有亮光。是的，在他临场述说时有圣灵与他同在，因此在他释放信息时，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和同在。倪栢声从得救之日至被囚之日，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却整理出了数十本很有属灵分量的书籍，这些书籍不是一个肮脏污秽的头脑所能炮制出来的。最后补充一点，翻阅倪栢声的往事记录，会发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他在福建泉州时，曾这样说：「我自己有一次搭车，在店旁看见一本有点疑惑的书，就想翻开来看，但因为主禁止，我就不敢去翻那本书了。因为我的眼睛、我的思想，已经奉献给主，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至于那些被指控为反革命份子的聚会处的众多同工，根本就未曾从事反革命活动，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被控告为「罪名昭著」的反革命份子陈恪三，为泉州晋江南塘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信主后被主呼召

即辞去县警察局长，及副旅长职务，出来全时间事奉神，曾任福州聚会处和昆明聚会处的负责同工，是鼓岭第二期学员。他的历史清清楚楚，从未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我父亲晚年，在香港只和国内三位元同工保持通讯关系，他们分别是陈恪三、张启珍、俞崇恩。其实中国公安部门早就发现陈恪三根本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以后来提前释放他。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各地区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聚会，共有来自十七个省、一个自治区、三个直辖市的代表六十九人，加上工作人员，共有八十八人，故称八十八人聚会。聚会后大家通过了一个档，是由陈恪三和黄得恩起草，档全称是《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档内容保留了倪柝声多年来所释放的信息和基本真理。

此外，厦门聚会处的柯怜悯也被指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份子，说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积极策动各种反政府活动。我对柯怜悯有深厚的认识，自从汕头市韦怀中学的校长卓效良宣告时局变化，学校提前停课放暑假之后，我告别了其时在汕头的倪柝声的母亲倪林和平姊妹（又称倪伯母），及几位长老（陈方青、蔡寄庐、谢子舜、麦适畴），及其他青年弟兄们，包括林双本、谢德建、姚鸿儒等，独自乘船到厦门找我父亲。我父亲那时住在厦门市中山路蔡志文医生诊所的楼上，再上一层楼便是柯怜悯的居所。我父亲在厦门的同工，有王灯明、蔡志崇、韩进修、柯怜悯等。由于我父亲比较多时间花在鼓浪屿黄家渡的聚会处，所以靠近中山路的思明东路聚会处，就较多由柯怜悯等同工带领，这就造成了我和柯怜悯弟兄有较多接近的机会。不久，柯怜悯把我这个主内小弟当作知交，称赞我有属灵的恩赐。实际上这是过奖。

在我与柯怜悯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期间，我发现他实在清心爱主，既敬虔，又热心，并且经常探访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柯怜悯弟兄短期参加过第二期鼓岭训练聚会。像柯怜悯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清教徒，竟因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而被监禁数十年，实在是匪夷所思。柯怜悯写的《基督囚徒的一封信》，实在感人肺腑，帮助了许多信徒。

我必须以自己的亲自体验，说明在中国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存在着不少冤假错案。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在河北省潮白河西岸的西荒地，在一片芦苇杂生的荒地上被强制劳动。

在河北省宁河县的西荒地，一条新建的五八三村里，李文华中队长叫全中队集合点名，点完名之后，宣布召开斗争大会。我成为斗争会的目标，李文华叫大家检举我。

我在《南北极》杂志上所连载的《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中，披露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我，如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从我个人的例子，说明确有冤假错案存在，也说明倪柝声是否反革命分子，是需要再度予以审查的。

以下是我当时被斗争时的情况，摘录自香港《南北极月刊》上刊载的《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

「许多人都撕开情面，揭发他，痛斥他。一些平时和他多寒暄几句的，更不敢怀温情，直向他展开无情的斗争。有的说他是某国特务潜回中国刺探情报的，要政府审查他的历史；有的说他一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无数双手用尽力气晃动，挥摆着，高潮终于来到，每一个人放开嗓子高喊：『逮捕反动份子！』『镇压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份子！』『我们要求政府惩办他！』……此时他垂目望地，茫茫之外一无所见，一种奇异的感觉袭上心头。」

我本人所亲身体验的冤假错案，促使我再说一次：我坚信，倪柝声的案件，一定也是一桩冤假错案，

当局总有一天，会给予平反。

第十八章姊妹们的见证

一九六五年一月，我从香港飞往曼谷，协助我母亲（陈张雅淑姊妹）——鼓岭第一期的学员——经营泰国曼谷家宰两合公司的业务。家宰两合公司的成立，原先目的是代理香港生化药厂的药品，与上海生化药厂、重庆生化药厂、香港生化药厂是同一系统的。我哥哥陈慰中本来任职于香港生化药厂，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生化药厂西药原料缺乏，我哥哥被调到曼谷家宰公司，以第三国名义襄助香港生化药厂进口原料。

我父亲受倪柝声委托，是香港生化药厂名义上的经理，而我母亲在实质上，则是曼谷家宰两合公司经理。由于我父亲是香港和曼谷两地教会负责人，如今再执掌香港生化，角色上的混淆有时令他十分尴尬。事实上，是由于历史原因，我父亲才会同时带领香港和泰国两地的聚会处。

一九六五年，家宰创立十五年之后，我到达曼谷。当时我母亲独自掌管家宰的业务，因为我哥哥到美国留学已达十年，一时无意返回泰国。我母亲作为鼓岭第一期的学员，对她在鼓岭所学习到的功课记忆犹新，这正是她为何肯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与我父亲分居两地，在泰国经营事业。她在经济上支持我父亲在香港的事奉，又支持我到英国留学，又支持我哥哥到美国留学，和支持我五个妹妹在香港读书。

我母亲记得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她在鼓岭作完见证后倪柝声对她作出的评语，特别是末了的一段话：

「你回想一生的经过，婚前与婚后的情形，乃是整个的掉了一个头。你嫁给则信弟兄，知道路是难走的；在五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你一人独立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你受了物质的苦，主又给你预备了另一特别的苦，就是婆婆的苦。你本来想要作工事奉主，帮助弟兄姊妹，但你见婆婆如此抵挡你，弟兄姊妹中又多有批评的话，你就想了了，你连作基督徒都不行，不如在教会中坐在末了的一排。所以从那时起，二十年的光阴，你就在那里养伤。我不让你过去，我盼望你今天要解决这个难题，若我们不能带你过去，这是我们的失败。你要看见是主的手，在这里对付你的自爱、你的骄傲。你若不经过这些对付，你的自爱和骄傲不能除掉。

「多年来你有如一个蒙羞的人，受人的批评，受人无理的对待，是相当的难为情。但如果从今天起，你能学习接受圣灵的管治，你就能成为有用的人，若不然，你还像以前一样，一直觉得苦，一直在那里自养伤口，怨天尤人，你在神面前就是没有用的人。你若学了功课，你就能进入别人的感觉里，就能帮助、带领那些在你情形中的人。」

「你可能要以为，过去有这么许多的失败，今天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在千万次的失败中学不好，就以为好像已经没有了见证，已经没有了盼望。然而今天在这里要你来一次末了的得胜，就能把你已往的失败都得胜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都知道那是他的一个大失败，当时他若只顾养伤，只顾看自己，那他就了了，然而主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别的弟兄。今天，你的前途也正和他一样，现在就看你如何拣选了。你若能胜过，你就能多帮助别人；别的年幼的姊妹有同样的难处时，你就能作带领她

们的人。」

直至一九六五年，亦即我抵达泰国这一年，距离倪柝声对我母亲说上述这番话的时间，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倪柝声弟兄对我母亲的这番勉励话语，仍深深地烙印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成为她工作的推动力。与她同上鼓岭的第一期学员，那时大半已被囚在监狱里，其他人也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失去联络。然而倪柝声的话增加了她的勇气和信心，使她在企业上为主站住。她并不因着在事业上薄有成就，而忘了扶持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许多人知道我父亲是倪柝声带领信主的，后来倪柝声的同工，并根据他对倪柝声的观察和认识，著述了《倪柝声弟兄简史》；但是我母亲——陈张雅淑姊妹，也是在厦门听了倪柝声所传的福音得救的，她曾经为倪伯母和倪柝声准备膳食，和倪家母子熟稔。倪柝声住宿在我家中时，我母亲照应过倪柝声的起居生活。一九三五年底，我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到上海住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后，不久怀孕，生下了我的妹妹秀美——即后来的高秉衡师母，当时倪柝声刚结婚一年，他的姐姐林步基师母（林倪闺贞）就把服侍他们的保姆梅官让给我母亲作保姆。

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要强调我们两家的关系，因为倪柝声认识的人和交往的人很多。我要强调的，是我母亲是一个明察秋毫，富有敏锐观察力的女强人，她对倪柝声的观察和了解，绝对不亚于我的父亲。她一直对我说，在属灵上，你要以倪柝声为榜样，因为他舍己，彻底奉献，对神的话语，按正意阐释，有正确的认识。至于在政治上，我的母亲则要我以周恩来为榜样。我父亲在《倪柝声弟兄简史》中，如何套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的话，这些话也适用于我母亲。我母亲说，如果有人要问我，倪柝声有没有犯这许多罪呢？我头一个答案就是，我陈张雅淑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没有得救，感谢神，借着祂，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属灵的情形相当低落，感谢神，借着祂，我被带进很大的复兴！在我一生中，主借着倪柝声带给我属灵帮助，可以说没有办法计算，这是我陈张雅淑所知道的。

不论是万小玲，或者是吴罄，都未曾详述倪师母死时的惨况。目击者说，倪师母病重时，不准倪师母移进病房诊治，她是在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上离世的，死后连抬遗体的工友都懒得来。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居住在泰国，从事经营西药业，同时，我又落笔撰写《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这本自传式的书籍。

「一九六六年夏的某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几昼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着谩骂恐吓声，一声声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批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他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喝问她们：

『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

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的小孩子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所说的：外面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她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的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她成了众目所睹的美好见证。」

倪师母生前常说一句话：「如果没有主，这世界真是太残酷了！」

张锡康证实说：「张品蕙遭遇的斗争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红卫兵去抄她的家，连井水都吸干掏空，抽查有否武器丢在里面。她也遭红卫兵的毒打，戴高帽子、游街。」

倪柝声师母对倪柝声的忠贞和爱护委实令人感动，三十年后，居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倪柝声外甥女婿吴馨证实：倪柝声与倪师母感情一直很好，政府一直要张品蕙与倪柝声划清界限、离婚，她不愿意，因而她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里弄里被管制。吴馨强调一点，我们基督徒都是蒙恩罪人，倪柝声成为蒙恩罪人和成为神的仆人，也都是神工作的结果。倪有犯罪——所有蒙恩的罪人因着旧亚当的罪性，都有犯罪，可是不像当局说的犯那样的罪。倪犯罪也向神向人认罪，倪师母第一次去上海提篮桥探监，倪柝声就向她认罪。倪柝声的甥孙女万小玲证实说：「当公公倪柝声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张品蕙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

万小玲又向我们述说了倪柝声在一九六七年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五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此时有人已经对外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和两个流氓刑事犯被关在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是发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在此期间，婆婆只被批准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事后才知道，公公又被押送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

吴馨弟兄对倪柝声在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的情况作了补充：

「本来倪弟兄于一九六七年刑满，便可释放出来与倪师母团聚，正碰上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政府就又加判了他五年劳动改造，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出来，安排到上海郊区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倪师母曾去那农场看他，回来对佩心说：大舅说现在他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了。倪师母又说，青东劳改农场的场长对大舅很赏识和照顾，大舅有传福音给他听，他很有心接受但却因此受上级批评。不久政府把倪弟兄改调到也属上海市管辖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劳改农场。」

倪柝声在被囚禁期间，仍然不停地传福音，一直为主作见证。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带领了一个难友

吴友琦归向了基督。吴友琦弟兄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安徽省白茅岭农场，都和倪柝声关在一起。吴罄又从倪师母口中，听到倪柝声传福音给中共干部青东劳改农场场长，场长因接受福音受到上级批评。

万小玲在《世界不配有的人》一文中透露，倪柝声在世时，曾为一个难友祷告，在倪柝声去世后，这个人才得救归主；这个人将倪柝声在狱中的一些美德，述说给万小玲听。

至于吴罄说倪柝声加判了五年劳动改造，张锡康解释说，不是加判五年，而是要继续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张锡康这样说：

「事实上倪弟兄一九五二年四月被逮捕到一九五六年才判他十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满了十五年，因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所以户口不给他报进市内，以免他与教会中弟兄姊妹接触，而将他送去上海郊区青浦劳动农场，叫倪师母去服侍他。一九六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红卫兵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耶稣？倪弟兄说，信！他们说，你关了十五年还没有改造好？于是叫二个流氓打他，将他的衣服都撕破，然后送他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去劳改。」

倪柝声在苦难中，对主一直忠贞不变，实在令人敬佩；正如倪弟兄的甥女婿吴罄所证实的：即使是在监牢里，倪柝声仍然是敬畏神的人。

一九六七年，非但对倪柝声是关键的一年；对笔者个人，以至对全体香港市民，也是关键的一年。

三年前的一九六四年，当我从北京抵达香港不久，英国殖民地的情报官员拉麦森（A.L. Lamaison）就对我进行多次的秘密盘问。那时候我跟父亲住在九龙天文台道五号教会聚会所的执事室大楼，我每次被英国情报官员拉麦森问话的时候，都不方便向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透露，或透露谈话的过程细节。

从一九六四年七月至十二月，拉麦森断断续续地盘问了我半年，有一天拉麦森发火了，说我为什么隐瞒身份，没有说出我即是十年前在欧洲十分活跃的 Ceper Chen。一九六四年圣诞前，拉麦森把我的个案转给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MI6）属下的情报研究室（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东南亚区主管史密斯（Leslie Smith）；史密斯认为，我应该将我从欧洲回到大陆的受难过程写成一本书，又说，既然我即将会前往曼谷协助母亲主持曼谷家宰两合公司，我在曼谷写成的稿件，可以交由英国驻曼谷外交官王安治（George Wong），王安治再以外交袋将文稿送回香港。王安治在曼谷会晤我时，对我这样说，至今他负责照料过两位敏感的人物，一个是钢琴家傅聪，另一个就是我。

我在曼谷期间，很快地就认识了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彭孟緝，和大使馆的新闻处处长钟荣苍。由于钟荣苍是培正校友，也是聚会处弟兄。每主日我们都在会所碰头，我和钟荣苍很快地就成知交。当钟荣苍知道我正在写稿给英国的情报研究室，就联络了美国方面。不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女作家伊文思（Dorris Evans）就赶到曼谷，说她有意把我的稿件《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译成英文发表。

在《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这本书中，我隐瞒了我早年和中共学生运动南系的关系。

此外，在《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一书中，我又隐瞒了我和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关系，因为在我的良心中，这个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我坚信，聚会处的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清教徒，他们不懂政治，他们的错误就是超政治，他们根本没有好好学习倪柝声所写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此外，我又知道在聚会处的信徒中，隐藏着不少进步人士。

后来《北京第一号信箱的秘密》，就陆续在王敬义、费明仪等人主办的香港《南北极月刊》上连载。

没有料到的是，一九六七年，香港出现了劳工纠纷，港英政府采取高压的手段，对付工人群众。在处理香港的动乱事宜上，国际刑事员警组织根据宪章第三条的指导原则，细心权衡与对待这个富有政治色彩的动乱。

一九六七年九月，国际刑事员警组织在日本京都举行大会，秘书长郑芮波（Jean Nepote）提议，为了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中英双方应该就香港的长治久安问题，进行谈判。一九六八年一月，英国外交大臣布朗（George Brown），从伦敦飞抵日本东京，亲自签署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国际协议。

令我惭愧的是，在处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这宗冤案上；我却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一九六八年，我除了管理曼谷家宰两合公司之外，又担任新加坡格力斯药厂董事总经理，兼管马来西亚境内的五间公司，这五间公司分布在吉隆坡、檳城、古晋、亚庇、柔佛巴鲁。在新加坡，我遇到了倪柝声的老同工陆忠信、陈主言、周洪宝。与倪柝声关系密切的前上海生化药厂总经理殷祖澜，也不时到我的办公室坐谈。每当我和弟兄们谈及倪柝声时，大家都认为倪柝声是神贵重的器皿，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因着倪柝声的职事而蒙福。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眼看倪柝声加判的五年劳改刑期就要结束，倪师母满怀希望地积极为倪柝声出来后的住处奔波准备。有一天，当她在家中站在凳子上要爬到橱顶上拿东西时，突然间一不小心，她跌了下来，跟着中了风，三天后，即十一月七日，她回到了天家。万小玲这样陈述：

「她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她从中风昏迷，到去世，仅仅三天，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她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吴罄补充说：「就在这时，主让她回天家休息，对她诚然是好得无比的，这世界确实不是她的家，她也实在很难在当时当地替倪弟兄找到合适的住处，中国大陆——特别是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大陆，哪里是她安身之地？哪里有她枕头之处？」

倪师母去世后，万小玲、吴罄不敢马上说给倪柝声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子难以承受如此大的打击；但倪柝声性格很敏感，他似乎有预感，不断来信查询倪师母的身体状况。在信中，倪柝声十分迫切地表示想早点出来与倪师母团聚，好服侍在病中的倪师母。他对同房的难友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多许多的苦。」过了一个多月，倪师母的大姐张品琤才从上海写信通知倪柝声有关其妻子的死讯。可以想象倪柝声得知倪师母离世后，是何等的悲伤。

我的母亲——陈张雅淑姊妹，在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班，是鼓岭三个女管家之一。当时何家家长是我父亲，女管家是我母亲；吴家家长是魏光禧，女管家是魏师母魏林意天；倪家家长是倪柝声，女管家是倪师母倪张品蕙。由于我们一家和倪家有悠久的历史，那次在鼓岭又有长达五个月的相处，加深了我母亲和倪师母的情谊，增进了两位主内姊妹彼此之间的认识。我母亲对倪师母的贤淑、顺从、温柔、爱心赞不绝口。几年后，当我母亲知道倪师母在香港、上海关怀我，事事照顾我，更使我母亲对倪师母感激不尽。

倪师母逝世之后，难免引起我母亲对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聚会的怀念。事隔十三年，我母亲在事业上

虽然薄有成就，但她却把这殊荣归功于倪柝声在鼓岭对她的勉励和殷望。

根据家母的回忆，倪柝声一向对于姊妹们的功用非常重视。她说，鼓岭的禅家，清一色是女学员，由女同工缪韵春姊妹管理；而鼓岭的诊疗所，负责人也是一位姊妹，即周康耀师母周李碧霞医生。

重温鼓岭第一期聚会中几位姊妹的见证，和倪柝声对这几位姊妹的评语，实在使我们对倪弟兄更加敬佩，认识到他属灵的内涵和份量，不是一般信徒所能达到的。

以下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缪韵春姊妹在鼓岭所作的见证：

「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从小在非基督徒的学校读书。我得救是因我在所读的四福音中，看见主的爱。那时，我所在的学校不准人读圣经，于是我把圣经一卷卷折成一小本一小本，放在口袋里，以方便阅读。有一天我读到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经文说：『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就接受这个负担。当时家里的人并不同心，有人反对我追求主，但神是我的一切，我不理会那些人的反对。以后我去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读书，但觉得那里的一切不合我属灵的口味，课程中也得不着什么，我就离开神学院。后来，我到了长老会，在妇女中间作工，有一次我从火车上跌下来，第二天吐了血，背脊骨受了伤。我知道这是主的对付，主不要我因为人情的关系，和环境的需要，而在长老会中工作，所以我就离开，我和李渊如姊妹、汪佩真姊妹从南京到上海后，主安排我在姊妹中服事。一九三四年三月，主使我认识到，我若把自己摆在祂手中，成为祂的器皿，祂能使用我们。我在南宿州与姊妹们聚会祷告二十天后，传福音给不信的，清楚得救的有三十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战事爆发，倪柝声弟兄、李渊如姊妹、汪佩真姊妹等从上海迁入内地，我则留在上海，在上海福音书房作文字工作。那时《工作的再思》正在排版，我和林光表弟兄、何越樵弟兄挤在狭窄的华丰印刷厂校对，不论如何辛苦，因一切为着主，我没有埋怨。只是那时同工们中间有摩擦，功课难学，我就灰心疲倦得不能起来，但因主爱的激励，就忍耐下去，因此我开始学习接受圣灵的管治，将自己放下。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神在上海的姊妹们中间动了善工，复兴了许多人，许多浪子回到了父亲的家里，起初不过是三两的姊妹同心合意地祈祷，结果主就施恩，大有圣灵的同在，结果复兴的能力，在姊妹们中间扩张，增加了许多小团体的姊妹们的祈祷聚会，主在这些小组聚会中，彰显了祂的作为。有一次在医院里，所有护士、医生，凡有生命的都在一起祷告，神叫许多哑吧的开了口。

「那次神在上海姊妹中所兴起的复兴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在每星期六下午，有妇女传福音聚会，传福音的事，完全由上海的姊妹们担任，并由姊妹们传信息。而例常的姊妹聚会，仍在星期三进行。或者由于我太过操劳，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得着心脏病，整个人毫无气力，受了许多苦难，我几乎是病得预备要死，但我总不懊悔走这条路。前些日子，当教会正在传交出来的信息，我经过一个礼拜的挣扎，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交出来。我若不交出来。我知道我就会了了，所以我把我和我的一切都交出来。我现今是没有什么难处。我的难处就是我这个己，己肯放下就没有什么难处。我不是要作什么工作，我乃是要活在神的旨意中。」

缪韵春姊妹作完见证，倪柝声就对她的话给予评语：

「从缪韵春姊妹的见证，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然而只怕这种的直爽与痛快掺杂在灵里，成了一件不容易对付的事。人的长处和特点，在神面前影响非常大；人的长处和特点，应该在灵里，

被灵盖过去。按实在情形来说，缪韵春姊妹在上海时，曾带领过上海姊妹们空前的大复兴，曾在上海福音书房作文字耕耘的工作，上海教会有个基本的弱点，就是每个人都作个人的事，彼此配搭得不好，身体没有供应，工作不合一，没有权柄，没有安排，一切的事都是随环境自然而去。这一次我们在鼓岭聚会，大家所看见的错，所蒙的光照，若是彻底，就能叫我们的姊妹省去许多痛苦。对缪姊妹个人的事，我要重复的说，在神面前，个人若不能让主来碰，我们的灵，是不能爬得更高的。求主祝福我们的姊妹，能在她身上显出主的作为。」

缪韵春姊妹长得高大，具有领袖的风范和才能。在鼓岭聚会时，她是禅家的家长，管理的是清一色的女学员，包括倪规箴、刘慧芬、吴佩雪、郭孩真、纪钟毓等。由于上述这些姊妹都来自上海，常年住在上海的倪栢声师母，在鼓岭时，也就不时从倪家到禅家串门，并在生活上彼此照应。

根据蔡苏娟着的《暗室之后》，记述缪韵春曾是李渊如在南京江苏女师担任教务主任时所带领信主的学生。这项记述大错特错。缪韵春生于一八九四年，李渊如同样生于一八九四年。李渊如同样生于一八九四年。因缪韵春比李渊如早几个月出生，故缪韵春称李渊如为「渊妹」。

本人根据一九三八年三月汉口小董家一巷出版的《敞开的门》第五期发表的缪韵春致李渊如信件，得着证实。该信件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信内这样说：

「渊妹：妹等打算何时返沪？是否等佩真回来再同行呢？韵大约一时不能他往，于前礼拜三已搬到聚会处楼上住。……」

倪栢声师母逝世之后，仍在世的海外的鼓岭第一期女学员，除了我母亲，还有柯翠琼、魏林意天等，这些姊妹们谈及倪栢声，总持着尊敬的态度。而在我所认识的国外女传教士，包括芮志英（Joy Betteridge）、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her），钟玛璃（Mary Jones）、Hilda Holmes、也说倪栢声弟兄为人圣洁敬虔。我在伦敦时，有一次，我因着某一弟兄的话，灵里受了伤，跑到贵橡路交通中心的地窖，找到女传教士 Hilda Holmes。她在上海时就认识倪栢声。她听了我的诉苦，就责备我说：「你们中国人天性敏感，倪栢声在英国也是这样。」当然我不同意把我的敏感性格归诸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但至少我获悉一件事，倪栢声也是很敏感的人，很容易受伤，他自称如蜗牛一样，一受碰，就缩回去。他早年在贵橡路时，也像我一样敏感，一样容易受伤。

再多谈一个姊妹的见证，引述刘慧芬姊妹在鼓岭的见证，以及倪栢声对刘姊妹的评语。从倪栢声的评语，可以读出倪的内心是如何的高尚和清洁。

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刘慧芬姊妹在鼓岭作见证说：

「我是一九二四年得救，信主后受父母逼迫。我父亲说，我不能继续住在家里，因为一家人都因我信主而不安，于是送我去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读了三年多的书。回来后父亲不让我出去，要我在家布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多数是在家里。我觉得在家中的时间，可以说是糊涂地过去，不过就是学了一点服在家庭权柄之下的功课。一九三七年初我到上海，在哈同路住了将近一年，与弟兄姊妹有交通。一九三七年底，我学习在交通大学难民所，向来上海庇护的乡下人传福音，在难民所我也带领一个姊妹聚会，人数约四十多人。我读过慕勒的传记，对于受引导，信靠神，非常仰慕，但是结合到自己身上，我却失败了。我后来里面有种感觉，最好自己有一个小房子，自己一个人住，什么都不管。我长期躲开弟兄姊妹，与他们不够敞开，不与他们有交通。一九四七年上海教会传交出来的信息，

我也在那时交出来，从此就不敢东跑西跑了。教会定规要去取住在福建福州的海关巷后，我就去了。听了倪弟兄的交通后，我里头得着了供应，好像活起来了。在上海时，人说我是一个不敞开的人，自己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也不问别人。人说我骄傲，但我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话可说呢？」

倪柝声给刘慧芬姊妹的评语特别多，可说是语重心长。

「一个冷淡下去的人，总是喜欢躲起来，不喜欢接触人。有的人是靠着外面的人活着，外面的活动仍旧继续，里面的人却是沉下去的。刘姊妹就是这样，是里面的人下沉。你的灵沉下去，想要靠着外面的人，就是靠着情感、思想、主意而活，那就不够维持你。你的灵不够强，这就是你这些年间，变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我们的姊妹只剩下属灵的知识，而没有了属灵的实际；仅有属灵的知识，但里头缺少属灵的兴趣，原因是灵和神没有了接触，失去了光，你就觉得黑暗，觉得痛苦，你摸不着神。到了这种地步，你就觉得黑暗，神就要作两件事。第一，神要人萎下来。第二，神要使你靠着简单的信心而活。神要我们起首学习相信，安安静静的相信，相信神的宝座仍旧在天，主耶稣的名仍是有权柄，神的荣耀超越一切，神的得胜不能推翻，主的复活大能远超一切，撒但已经彻底失败等。

「在神的那一边，一切都没有改变。在这种信心的生活中，你就会像从坟墓里逐渐爬出来一样。约伯经历了家破人亡，连自己的身体也长了毒疮，但他仍在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说，神虽杀我，我却要信靠祂（达秘译本）。约伯乃是在他自己之外，来信靠神。他只凭事实，不凭经历和感觉而相信，这样的信心就是干净的信心。本仁·约翰（John Bunyan）说，神若是对，让天堂来吧！让地狱来吧！我还是相信神。约伯信神，不看环境，不看遭遇，他所经历的，是完全的破产，儿女的死亡和身体的毒疮！这是何等的信心，这是纯洁的信心。凡这一类的经历，不管其度数如何，神所要留给我们的，惟有事实，单单是事实，为要叫我们学习有洁净的信心。一个人事奉神，只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信事实就够了。」上面是倪柝声在倪师母逝世前十三年对刘慧芬姊妹的劝勉。十三年后，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仍在囚禁中的倪柝声本人，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同走这一条道路的弟兄姊妹们。

倪师母去世一个多月之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倪柝声才从大姨张品琤知道了妻子的噩耗。倪柝声是如此的悲伤，以致于他覆信给张品琤时，用了「五内俱裂……」及「父母去世我也不曾这样伤心……」等强烈的感伤的字句。

从此看到，倪柝声到了年老时，在神的管治下，全然破碎了，他的创伤是这么明显，再也无法予以掩饰。他猛然发现，他的妻子是这么忠贞，她对他一直不弃不离，她一直信任他，直到她撒手人寰时仍不改变！

倪柝声一生的行为见证是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不为自己辩屈。他选择十字架，愿为他的主人拿撒勒人耶稣而受苦受难。

倪柝声的弟媳倪兴祖师母倪徐恩秀这样说：

「倪弟兄毕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辩白过一次，这是所有真正认识他的人——包括那些零星的仍然存留在世的几位——都能见证的。倪柝声是一个从不为自己表白的人。倪柝声一生没有过着好日子，凡事为他人着想，凡事为他人打算，他所背负的，他所承受的，并非局外人可以明白，举凡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能为他作见证。他是一个实践信仰的人，他不仅教导十字架的功课，他的确有追求，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他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即使他受误会，甚至于他被诬陷，我没有看过他为自己辩白过一次，

这是所有认识倪弟兄的人都可以见证的。」

第十九章全球各地宣教士的见证

倪柝声非但在中国各地的教会中，赢得许多敬虔爱主的姊妹们的敬爱；就是在他共处多年的西方女宣教士中，亦受到普遍的赞扬。

首先要引证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女宣教士赖恩喜（Miss Lena Clarke）。赖恩喜早年信主得救后，就远涉重洋，深入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西南部作差传工作，曾在四川省奉节和万县这些偏远地区传福音。她在上海接触了倪柝声弟兄和李渊如姊妹后，在灵命上得着了很大的帮助。她于是在四川省向神祈求说，希望祂差遣倪柝声到四川省西部的荒芜地区，向那些初信的信徒进行培训，用赖恩喜自己的话：「我曾求神差遣你们中间几位到那边去，带着基督全备的福音信息，和神赐给教会那完全的地位，及十字架的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几点，好让四川各地神所救赎的儿女们知道的。」

一九三七年赖恩喜回到加拿大，仍念念不忘倪柝声弟兄在中国的事工。倪柝声在此期间与她保持通信，赖恩喜常常把倪柝声给她的信展示给在加拿大的信徒看。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赖恩喜致信给李渊如时这样说：

「我现居于温哥华（Vancouver）一位信主的朋友家里住。这里有许多弟兄姊妹。有一位信主的医生，读了倪柝声弟兄的信，觉得里面充满了亮光和生命，必须转给别的弟兄们看。他们很希奇主在中国信徒心中，作了何等奇妙的工作，并且用他们。何等喜乐！我们同一生命，同一希望。愿神祝福你！」

赖恩喜回到加拿大住了两年，仍一直怀念倪柝声弟兄在中国所带来的复兴，她渴望能再度回到中国与倪柝声同工。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她从温哥华写给上海同工的信，吐露了她再度到中国作差传工作的心愿。信中她说：请在主里的弟兄们面前提起我，因为他们总是在我的祷告中，在我的心里。我活着仍旧把窗子开向着我所爱的地方——中国，但是我等待神释放我回到你们那里。请为我祷告，使我知道祂的旨意。使我不太前，也不落在主的目的和祂的心意之后。

史百克的女婿金弥耳（Angus Kinnear）在《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一书中，记述了赖恩喜姊妹于一九四〇年从加拿大重回上海后的见证。

赖恩喜（Lena Clarke）前后在上海聚会了七年，她描述一九四〇年上海聚会的情况：

「每逢主日早晨，一到九时三十分，信徒们安静地聚集在一起，聆听所释放的主的话语。姊妹们坐在一边，弟兄们坐在另一边。……这里十字架的信息，被忠实地传讲出来，包括罪与救恩、基督里的新生命、神永远的旨意、信徒的事奉和属灵的争战，都毫无保留地被释放出来。

「当倪柝声讲道时，会众如饥如渴地聆听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穿着深蓝色的棉布大衣，站在讲台上。他的单纯的、温和的态度，适当的和切题的比喻，使会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讲道从不用笔记，他记得所有的要点，并能背诵所引的经文。……为了使会众更加清楚他要说的，他甚至引述自己切身经历的见证。在他的聚会中，从来没有人打瞌睡，从始至终，他的讲道从不离题。他经常强调：最重要的，是所传讲的信息所产生的果效。在聚会结束时，倪柝声弟兄的信息，在信徒中留下了一个难以磨

灭的、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赖蒂玛（Elizabeth R. Rademacher）的见证。这位美国女宣教士晚年住在美国加州（California）的亨丁顿滩（Huntington Beach），她的见证最有说服力的，是倪柝声在上海停止了事奉之后，对外国女宣教士所显出的关怀以及在灵命上的供应。赖蒂玛这样忆述：

「我最后一次见倪柝声弟兄，距今已逾半个世纪，那时是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正与日本交战，我和几个西国传教士其时在上海，被日本人拘禁前一天晚上，倪柝声弟兄不怕危险，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事先没有通知，那些日子他来看望我们西国宣教士时常都是这样。我们有了属天的交通之后，他送给我一小瓶浓缩的维他命补汁，是上海生化药厂制造的，他接着说，每天服半滴够了。他对我这个即将被囚禁的小姊妹如此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感动不已。

「我第一次听到倪柝声这名字，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时我对他毫无所知。我推想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四年后，一九三八年初，当我到哈同路参加擘饼聚会和特别聚会时，才发现他不过三十岁左右，只比我大几岁。一九三八年倪柝声弟兄领会时，中心题目是内住的圣灵。从前主离开我们似乎很远，如今祂在我里面那么真实，我从此看见圣灵有两方面的表显，一方面是外在的恩赐，一方面是里面的充满和运作，使人的生命因着更新和变化。

「倪弟兄就此举了一个例子，一辆载重的货车若是轮胎的气不足，无法承担重负，发动起来会爆胎，使车辆无法行驶，这使我看到，许多基督徒失败，叫主的名蒙羞，就是里面缺少圣灵的充满。」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倪弟兄动身前往英国之前，我们在一对西国传教士夫妇的家里，共有六个西国教士围着火炉有交通。倪弟兄用流畅的英语讲说国度的事，他强调说：『主需要传讲国度的人』。当时我听了深受感动，倪弟兄注意到我的反应，就对我说：『姊妹，不要惧怕。』就这样，主借着他说的话，赐给我能力，我改变成为另一个人。为着主使用这样一个忠信、谦卑、亲切的器皿，我赞美神。」

「一九四二年间，倪柝声弟兄在上海的职事被停止了，我们对他的动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心和照顾并未稍减，有一次倪弟兄和他师母来探访我们，给我们西教士每人一床丝棉被，我们不止是身体觉得温暖，我们的内心也倍感温暖。」

「那些日子，他因经营生化药厂惹来许多闲言闲语，甚至被人们定罪，但是在这些西教士面前，他并没有犯罪感，他的良心是干净的，他的动机不是为着自己的发财致富。他亲自带着我们参观他所经营管理的生化药厂。在他织帐棚的这段日子，不管别人怎样批评他，论断他，我们始终信靠他在属灵上的带领。我们怎么能够审判他？我们乃是因着他忠信的带领，才跟从主，才认识主的话语，我们乃是因着他的带领，才被带进荣耀的圣洁生活里。」

此外，我谈一下英国女宣教士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her）的一些经历。

巴若兰出生于苏格兰（Scotland），信主后献身作差传工作，加入内地会，在山西省的曲沃，与杨绍唐一起抚养山西一带的教会。

巴若兰在山西听到山东省各地教会大复兴，就亲自到山东，目睹神借着两位西方传教士，带动了山东大复兴。这二位神的忠仆，便是来自挪威的女宣教士孟慕真（Marie Mary Monson）和来自美国的女宣教士高珍珠（Miss Mary Crawford）。

内地会的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把巴若兰在山东的见闻作了详尽的叙述：「巴若兰从山东回到

山西后，把亲眼所见大复兴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她又把自己内心的负担，也向其它宣教士、教会，以及神学生倾吐，结果有许多人尝到个人与神，与及个人与其它人彼此之间的和好。大家又有更深切的悔改，并且渴慕被圣灵充满。灵的释放使他们在主里的交通充满新的喜乐和自由，我们在山西省洪洞县每星期一次的祷告聚会也有了新的释放，现代的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已是明显临到信徒之中了。」

巴若兰在山东时，对山东省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院长柯理培（Charles Culpepper）的印象深刻。柯理培的属灵度量很大，他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邀请王明道到华北浸会神学院讲道。王明道回北京没有多久，柯理培就于一九三二年春天，请倪柝声到华北浸会神学院讲道。在倪柝声讲道之前，神学院的师生，先有一段时间赞美敬拜神，倪柝声看到了从前没有见过的会众的激情和奔梦，他第一次经历了灵恩的聚会情形。那一次倪柝声引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说到神的大爱。

在本书第五章，已述及倪柝声受到弟兄会的影响，与芮文派的弟兄会，怎样从互相接纳到双方断绝交通的经过。当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芮文派的绝交信寄到上海时，倪柝声夫妇正在烟台，因此上海的教会就把信件转寄到烟台给倪柝声。这时候巴若兰姊妹正在烟台主领奋兴会。

巴若兰在内地会中，是一位很有恩赐的讲员。她的信息，曾帮助了杨绍唐，而这次则帮助了倪柝声；特别是当倪正被芮文派弟兄会孤立和误解的时候，借着和巴若兰姊妹的交通，分享了巴若兰在山东大复兴中的领受和经历。巴若兰在聚会时，受感而说方言及唱灵歌，这对倪柝声来说，是完全新鲜的。无论如何，正如金弥耳在《中流砥柱》中所叙述的：倪柝声虽然曾经对姊妹讲道有保留，但是巴若兰姊妹的讲道，确实有真正的能力，以致倪柝声被传讲的话语所摄住。这对倪柝声来说，是一个蒙福的新发现。如今倪柝声得到了释放，他讲道时的枯干情况一扫而空，在他致电上海同工时对他们说：「我已经遇见了主。」

在巴若兰姊妹的影响下，杨绍唐认为倪柝声的事工，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杨绍唐曾到上海哈同路住了两年，学习如何培训教牧同工。杨绍唐曾于一九三四年，在山西侯马成立灵工团。与巴若兰同期间在山东大复兴中被主重用的，还有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侯秀英；侯秀英后来成为倪柝声的同工，是鼓岭同工第二期训练班的学员。

倪柝声受到巴若兰姊妹灵浸经历的影响，持续了两年之久，这股灵恩的浪潮，从北方各地的聚会处，一直扩展到南方各地的聚会处，即使在一九三五年底，在福建泉州特别聚会时，倪柝声的讲道内容，仍是基督徒的得胜生活，和圣灵的浇灌。

到了泉州聚会的末期，由于有某些作法过于极端和偏差，由于有些信徒受到邪灵的攻击，某些作法过于极端和偏差，倪柝声赶快来个急刹车，而巴若兰姊妹此时也同意趋向保守，作为一个主曾大用的布道家，巴若兰此时竟自动完全放弃了公开的讲道。

不久，巴若兰姊妹觉得是时候回到故乡苏格兰，安静一段时期。她回到苏格兰，进一步拉近了倪柝声和史百克的关系。

倪柝声知道史百克这个名字，是通过和受恩姊妹的介绍，先后从《得胜者》（The Overcomer）和《见证报》（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上读到史百克的文章。一九三三年中，倪柝声只是以弟兄会的客人身份，到贵橡路串门。然而巴若兰和史百克的关系却非常直接，巴若兰和史百克同为苏格兰人。史百克

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街头听福音信主的；格拉斯哥的聚会一直是史百克最关切的。而史百克在格拉斯哥聚会的首席负责弟兄一直是巴若兰的哥哥格利斯·巴（Chris Fischbacher）弟兄。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倪柝声留下妻子在香港，前往新加坡，再取道印度前往英国。（倪柝声师母则于同年七月九日，自行离开香港，前往昆明，与倪柝声的弟妇倪徐恩秀会合。）

倪柝声亦于七月初到达英国，时史百克在苏格兰的克勒格莱根城堡（Kilcreggan Castle）——这是奥格夫人（Lady Ogle）的别墅。史百克既在苏格兰领会，就渴望倪柝声北上，好让两人有更充分时间在主的事工上互有分享和交通。那时在史百克身边的同工，同样渴望和倪柝声进一步配搭事奉的，就有巴若兰——三年前倪柝声在山东烟台时的宣教同工。

那次北上苏格兰，在倪柝声一生的事奉中，将有深远的影响。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给上海同工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弟真是何等的渴望能和你们同在一起，一同担当重担，但是，主引导我的脚踪。我此次来欧，并无其它目的，就是觉得神要我来此寻找神的选民，与他们联络，一同学习祷告，带进神的国度，我们真是需要复兴，看见当初我们所看见的，并且让我们的工作，受这个异象的支配。」

倪柝声到克勒格莱根城堡时，除了会晤了史百克和巴若兰姊妹，还遇见了德文兰姊妹（Phyllis Deck）。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倪柝声与史百克在克勒格莱根城堡一同聚会后，一同前往昆布兰（Cumberland），参加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在开西，倪柝声对一些预备出来事奉的年青同工，谈及「主为我们的救恩所完成的工作及主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倪柝声从罗马书直讲到以弗所书，信息的内容成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的第十和十一章的基调。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英文版出版后，再被译成数十种语言，中文版是由钟荣苍弟兄翻译。这本书在世界各地畅销，总销量达数百万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与倪柝声的另一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被世界上众多的教会领袖，视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威廉·彼得逊（William J. Petersen）将之列为「改变二十世纪的一百二十本书籍」之一。

倪柝声参加开西聚会时，有一个早晨是差传聚会。适逢内地会的本土主管（Home Director, China Inland Mission）姚如明牧师（W. H. Aldis）担任主席。姚如明知道倪柝声来聚会，就请倪柝声为聚会祷告。倪柝声犹豫了一下，因为那天的讲员来自日本，而日本人正蹂躏中国的土地。倪柝声想不到来到英国，会和来自日本的讲员，一起坐在开西大会的讲台上。倪柝声于是和史百克商量，但史百克鼓励他祷告。倪柝声于是祷告说：

「主啊！你在掌权，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掌权，祂是万有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动摇祂的权柄，这时来自灵界的邪恶权势正倾其全力，意图损害神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故此，我们不为中国祷告，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乃为神的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指责任何人，因为他们只是神的仇敌手中的工具。主啊，我们为你的旨意的成全而站住！哦，主啊，粉碎黑暗的权势，它们迫害你的教会，实际上是在迫害你。阿们。」

那一个早晨，所有参加聚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被倪柝声的祷告所感动。许多传记作家，认为这个祷告，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祷告之一。

倪柝声在开西聚会后，与史百克回到伦敦，落榻于伦敦森林山（Forest Hill）贵橡路（Honor Oak Road）

的基督徒交通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

倪柝声在伦敦的那段日子，无论是在早祷聚会，或者是在晚间聚会，倪柝声不断向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们，介绍福州大复兴以及神在中国各地所动的善工的实际情况。倪柝声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些英国信徒的属灵骄傲。另一方面，倪柝声又在史百克面前虚心受教，承认史百克所释放的基督是一切的中心的启示，是新的时代所有信息的中心题目。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倪柝声埋首在贵橡路的桌子上，向远在上海的同工们，概述了他在伦敦的亲身感受：「弟在此间工作，颇蒙主祝福，赞美主的名。许多的人盼望，我们从主所受对付而学的真理，能够写成英文。我自己也真看见这个需要。英文世界实在是很贫穷，不过如果这不是绝对出乎主，我总不愿意动。我们自己受捆绑，乃是工作清洁，及价值属灵的条件，许多的人在这里很捧我。但是，我的眼睛只望着主。我拒绝受外面的动而作什么。我是学习了十字架的人，这些不能使我重看自己一点。人如果知道了什么是效法祂的死，就怎能在人面前求荣耀呢？但是，另一方面，在这里主实在是恩待了我，赞美祂的名。

「不过有一件事，我多年来所常觉得的，就是弟兄们的易足。他们实在还有许多的路未走，但是，有的却以他们所已有的为已足！有许多的干粮，真是有不得其人而传之感！这次主施恩使我得以遇到好些（虽然不多）主里很深的人，述说神更深的事。你知道我从来不强作人师傅（这是一个最可恶的态度），都是等人要求。这次亦然，主自己感动人来要求。他们得益，我自己也苏醒。我总觉得如果要写书，总得先写中文，后是英文。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还不能说，我知道主的心意。数次汇款，俱系二三兄弟，罄其财产以助。此外，普通热心的人，对于奉献，更不如国内，有者须有人要求方肯，这些与我们根本就无分。我们无论多难，总要保守我们在主前所持守的。试炼实在多，但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活的神！在主给我看见，主要我在此所应领受的，已经得着了之后，我即当首途回国。哦，我何等的要求，能不早不迟的行走在神的旨意中。因为知道时势的紧要，更叫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同工四散，未能聚首一堂，时觉怅然。但愿我们四散，都是行神的旨意。读《敞开的门》，真是叫人赞美神。但是，我向神的呼求是，少年的同工，能知道十字架如何对付肉体，和天然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这封信，驳斥了许多人关于倪柝声的谣言，即伦敦贵橡路那里提供巨额款项给倪柝声。在倪写这封信前的两星期，即八月一日，新加坡陆忠信寄到上海的信，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倪柝声并非受到史百克弟兄那里巨额的津贴，陆忠信的信这样写：

「日前倪兄由伦敦来信说，在此国内弟兄受难之我心所挂念的，就是同工供给的问题。……我如果肯像有的人一样，也可以有许多的收入，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十字架，我们怎敢用肉体的手段来帮助神的信实，来拆散自己的信心呢？但愿神施恩给我们。」

前文说过，巴若兰的哥哥格利斯·巴是史百克在格拉斯哥的聚会的负责弟兄，透过巴若兰，史百克对倪弟兄在中国所开拓的事工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巴若兰回到英国后，又与丹麦的孙文华姊妹有很密切的书信往来。

孙文华曾在香港聚会过，与巴若兰一样，都认识倪柝声在香港的同工乐非力；孙文华回丹麦之前，就在香港约定，来日与返回英国的巴若兰保持联络。

一九三七年八月，巴若兰回到英国不久，孙文华姊妹从丹麦到伦敦，与巴若兰住在一起六个星期，在

主里一起有分享、有交通。在这六个星期内，她们两人不住地为神在中国的事工祷告。孙文华接着参加了史百克在伦敦贵橡路主领的灵修会。灵修聚会一结束，孙文华、巴若兰姊妹等又继续为神在中国的工作再祷告了四星期。那些日子，神给孙文华姊妹一句话，即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巴若兰姊妹致信寓居丹麦的孙文华，说神应允她们年前在伦敦的祷告，差派倪柝声到苏格兰的克勒格莱根城堡，与史百克弟兄、巴若兰姊妹、德文兰姊妹等同工有交通的时候，远在丹麦的孙文华，立刻写一封信到苏格兰的克勒格莱根城堡，给其时落榻在城堡的倪柝声，信件述及，她已经把倪柝声所著作的《工作的再思》，译了好几章成丹麦文，丹麦哥本哈根（Copenhagen）有一位福德基牧师（Pastor Fjord Christensen），读了之后大得帮助。

福德基牧师、孙文华姊妹、裘更生姊妹们于是在丹麦恳切祷告，祷告后一致认为必须邀请倪柝声到丹麦。一九三八年十月，倪柝声在巴若兰姊妹和德文兰姊妹的陪同下，经挪威抵达丹麦，在赫尔辛戈国际学校（Helsingor International school）主领特别聚会。倪柝声在十次的聚会中，说出基督徒的得胜生活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而失败的、退后的生活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信息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倪柝声在丹麦所释放的信息，和在开西时所讲述的一脉相承，构成了整本《基督徒的正常生活》。

倪柝声接着从哥本哈根，前往丹麦另一市镇奥典斯（Odense），他用以弗所书的钥字「坐、行、站」，讲了一篇感人的讲章。根据该讲章，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坐、行、站》。（编者注：基督徒出版社已出版该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倪柝声从欧洲大陆回到伦敦后，埋首将《工作的再思》译为英文。帮助倪柝声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巴若兰姊妹和德文兰姊妹。一九三九年一月，英文版的《工作的再思》译成，定名为 Concerning Our Missionary。

到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自倪柝声从欧洲大陆回伦敦之日起，转眼已有四个月，一方面《工作的再思》英文版，终于告成可以付梓；另一方面，这段日子，他有更多时间和史百克相处，从史百克弟兄身上领受了更多宝贵的属灵功课。

史百克和倪柝声弟兄彼此之间对真理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确定基督是一切的中心，基督既是神的方法，也是神的目的。父神预定基督为万有的承受者，所有神的旨意和计画就是基督。所不同的，史百克偏重于宇宙性的教会，认为教会包容了古今中外的教会；而倪柝声则偏重于教会是地方的，教会在原则上必须本色化——自治、自养、自传。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倪柝声从伦敦写信给上海的同工们——他们对数年前弟兄会的决裂造成的心灵创伤记忆犹新。信的内容如下：

「年来弟的工作，自然是注重于贵橡路（史百克弟兄住处）。虽然另外有其它许多工作，但是在弟看来，贵橡路是最重要的。欧洲情形一如中国。许多工作与工人都不错，但是多非由启示而来，而一切根据于传受者比比也。至于肉体的认识，及天然的拒绝，则一如国内，几乎成为绝响。贵橡路实为今日欧美见证的中心。有见证，有启示，识肉体，知天然。至于身体生活的亮光，尤为人间少见。但贵橡路一如其它地方，需要帮助才能完全。而自命来帮助贵橡路者又这样的多，叫贵橡路不能不小心提防。」

年来他们待我实在越于常人。他们自然是一面开着，一面提防着。而我也逐渐将我在主前由恩典所受的，而因环境所隐的分点给他们。同时，你知道我是不自为人师的。许多的地方，我知道神是用以帮助贵橡的，但是我哪里知道我不会错？人是何等的容易受自欺的梦想的支配，而以为自己是何等的紧要！所以，我等着，我忍耐地等着。我的心是急于归来，但是我知道我有工作当作，在二月的聚会，神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与史弟兄二人——看见许多同样的点。我们两个见证完全合一了。」

倪柝声写完这封信之后三个月，一九三九年五月，就动身返回上海。与倪弟兄一起回到上海的，是在伦敦协助他将《工作的再思》译成英文的两位英国女宣教士——巴若兰和德文兰。

倪柝声途经印度时，在印度住了两星期，在印度曾对七十位宣教士讲话。六十二年后，即二〇〇一年一月，住在英国德芬（Devon）养老院的老弟兄弗雷克（Fred Flack）写信告诉我，他对倪弟兄当时感人的信息，记忆犹新。

倪柝声回到上海后，在蒲石路友华村七号、十二号、十三号设立了同工招待所，后来更仿照贵橡路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称之为「基督徒交通传道处」，使上海与伦敦互相呼应，互相印证，双方建立了一种信仰上的和属灵上的关系。住在基督徒交通传道处的，有来自英国的巴若兰姊妹、德文兰姊妹、H. M. Holms 姊妹、钟玛璃姊妹（Mary Jones），以及来自加拿大的赖恩喜姊妹等。

有了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与倪柝声同工，在上海的聚会，按立了美国原长老会的传教士单惠泉（Thornton Stearns）为上海教会的长老，单惠泉曾在山东的齐鲁大学担任医科教授。

倪柝声乘船由海路从英国回上海，一路上巴若兰、德文兰两位女宣教士都在身旁，算起来三人在一起同工有一年多，倪柝声的高尚品格和敬虔圣洁给她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倪柝声一个多月在海路上，虔心灵修，为他到达上海后所带领的特别聚会，仰望神赐他亮光和话语。

倪柝声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抵达上海后，马上召开了为期十一天的特别聚会，在特别聚会上，倪柝声弟兄把这些日子在欧洲所领受的，供应给弟兄姊妹，他的信息是这么丰富，如奔放的川河，同工们大得帮助。他所讲的基督的中心和普及，明显地从史百克的 Centr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Cross 得着启发。被通知参加这次特别聚会的，人数不多，会后赵奇光、张子洁弟兄分别回到青岛、烟台。倪柝声弟兄特别留下四位弟兄，与他私下作更密切的交通，这四位弟兄是华世宾、张愚之、刘卑皿和我的父亲陈则信。

一九四二年六月，倪柝声停止在哈同路的聚会，但一直维持着他在上海基督徒交通传道处的事奉和职事。

倪柝声从未停息在西方宣教士中间进行培训工作；赢得了他们的称许，正如美国女宣教士赖蒂玛 Elizabeth Rademacher 所见证的：

「在他『织帐篷』这段期间，不管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们却只信靠并信托他的带领。」

可惜这段甜蜜相处的日子并不太久。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晚上，倪柝声夫妇邀请巴若兰和德文兰到家里用便饭，饭后他们一起祷告，一同宣告神是信实的。后来两位西方宣教士回到住所，发现钥匙不在身上，原来留在屋子里。德文兰于是从屋后的视窗爬进去，在黑暗中，她突然跌倒，中风不治。这位非常有恩赐和圣洁的女同工，就这样告别人世；她离世时脸上仍然带着微笑。

翌日，三月十七日，巴若兰等宣教士被日本人关进龙华集中营去。单惠泉的家人先入集中营，单惠泉

因为患了重病，被送入医院，和家人暂时分开。倪柝声为了照顾医院里的单惠泉和在集中营里的西方宣教士，变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照顾这些西方宣教士，可见倪柝声是如何的舍己和仁爱。倪柝声虽然被误会，被停止了在哈同路的聚会；但他破除了一切族群的、语言的、肤色的隔阂，在合一上活出了荣耀的见证；多年后，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回到欧美各地，到处述说当年倪柝声如何舍己为人。十年后，我乘搭轮船，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底到达伦敦。我本以为芮志英姊妹会来接船——她是与我父母亲一起在鼓岭第一期受培训的，我初到香港也见过她。没有想到其时芮志英正在美国，史百克安排了赫利斯（David Harris）来接我。赫利斯告诉我，他自己出生在中国山东，因父亲其时在中国当宣教士。赫利斯又告诉我，虽然我见不到在鼓岭与我父母亲同时受训的芮志英，却可以见到与倪柝声长期同工的巴若兰姊妹和钟玛璃姊妹（Miss Mary Jones）。

原来此时巴若兰姊妹与另一位宣教士钟玛璃姊妹住在一起，她们的房子也在丹伦路（Dunoon Road），正好史百克弟兄的住宅的隔壁。

那时候史百克的大女婿金弥耳正在搜集倪柝声的生平资料，不时向巴若兰和我查询有关倪柝声的事迹，巴若兰曾是倪柝声的同工，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一九五五年，金弥耳随着史百克到香港，认识了我父亲，所搜集的资料也就更加丰富了。到了一九七三年，经过了二十年的千锤百炼，金弥耳终于出版了倪柝声的传记（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

一九五二年，我在伦敦时，发现巴若兰姊妹很怀念中国，平日喜欢吃中国菜。有一次，我自告奋勇，到她家里准备中国菜给她和钟玛璃及赫利斯夫妇吃。我在香港从来不必下厨房，结果那次作晚饭是一次大失败，根本难以入口，结果五个人大笑一场。

当我平时和巴若兰交谈的时候，这位参与山东大复兴的著名布道家，这位在灵性上帮助过杨绍唐和倪柝声的姊妹，一提起倪柝声，总流露出一种肃穆的、敬畏的神情，我从来没有听过巴若兰说倪柝声一句不是。一九五五年十月，当史百克身在香港和台北时，曾写信吩咐巴若兰和钟玛璃来找我，希望我回到贵橡路聚会。可是当时我行踪飘忽，匿居在汉奥弗路十一号（11, Hanover Park Road），她们曾会晤过我一次。

事隔十一年后，一九六四年，当我从北京回到香港时，我又与巴若兰姊妹、钟玛璃姊妹重逢。这时候巴若兰已经在香港服事了八年。她和钟玛璃，在一九五六年，当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来到香港，两位姊妹成为我父亲最得力的同工。在巴若兰的一生中，与她在中国同工最久的，竟是我父亲，因她与杨绍唐、倪柝声同工都不过几年，但和我父亲同工却长达十一年。

一九六四年，我回到香港时，和父母亲同住在天文台道五号聚会所办公大楼的三楼，而巴若兰、钟玛璃则住在四楼，这时候倪柝声仍在上海的监狱里。我们当然怀念倪柝声，在交谈时，巴若兰不时向我讲述，倪柝声是一个诚实的人。她说，倪柝声祷告时，是对神诉求，不是祷告给阿们听，因为我们祷告时，其它人若阿们得大声，就心里高兴，别人阿们得小声，我们就心里不舒服。倪柝声曾说，许多人的祷告都是在人面前，而不是在神面前的。在人面前的，不能代替在神面前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只有在神面前的才算得数，属灵的东西必须是从里头生出来，不能拿无花果放在葡萄树上。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柯翠琼姊妹和张宝珠姊妹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住在我家下一层楼。时已八十三岁的柯老姊妹对我说，希望我陪她到九龙城联合道基督教坟场去探望巴若兰和钟玛璃的坟地。屈

指一算，我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半世纪之前在伦敦认识她们的。原先没有料到，她们会到香港和我父亲同工，更没有料到，她们这两位献身中国差传工作的西方宣教士，最后竟然长眠在香港。

墓碑上刻着：巴克尔（巴若兰的别名）（Elizabeth Fischbacher），一八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生于苏格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香港逝世。钟玛璃（Mary Ann Jones），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于香港逝世。

那天我到过基督教坟场之后，又与柯翠琼姊妹谈到倪柝声。此时距倪柝声逝世已有三十一年了。我说，若不是倪柝声的安排，我父亲不会在一九四九年来香港牧养教会，柯姊妹也不会同船随我们一家一起到香港。柯姊妹则谈及她有幸参加了第一期鼓岭聚会，又蒙恩参加了第二期鼓岭聚会。那天与柯翠琼姊妹谈话，最使她喜出望外的，是我把三十三年前她在鼓岭的见证和倪柝声弟兄对她的评语影印了一份给她。

柯翠琼姊妹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在鼓岭的见证如下：

「我是生长于非基督徒的家庭，在非基督教学校读书，跟着同学老师反对基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参加了宋尚节在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大操场上举行的露天布道会，有一晚受感动就信了主。信主后因家人未信，我为他们流泪祷告。一九三七年父亲（柯俊德弟兄）在福州因生意的事被判坐牢，母亲因父坐牢，心中挂虑而吐血。我也忧愁，时常流泪。一九三八年在安海的一次奋兴会里，我奉献自己，要事奉主。以后我在福建同安教会聚会，一九三八年受浸。那些日子，在同安服事主的同工们有王灯明、柯怜悯、韩进修、陈秉熙等。我父亲关在监牢中六年，也信了主，母亲病了二年多后，才去世。感谢主，我父亲坐监六年之后，被判无罪得以释放。我却因父亲破产，母亲去世，历二年之久，我不能祷告。有一天主对我说，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历有三年之久，我在家安静度日，始终由于里头深受刺激，失去了对福音的负担，不能向人开口。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我家遇见强盗，感谢神的恩典，救我脱离了危险，以后倪柝声弟兄答应我来福州受造就，现今能在山上受训练，实在是主的怜悯。」

当日，倪柝声对年仅二十八岁的柯翠琼的评语很严厉，但在五十五年之后，柯姊妹已届八十三高龄，不至于轻易受伤，我也放心把倪柝声的评语交给她。倪柝声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在鼓岭对柯翠琼的评语如下：

「在四福音中，我们看见多人病得医治，却没有得着属灵的祝福。外面的肉眼是开了，里面的心眼却未开。四五千人因吃饼鱼，得着物质的饱足，但灵性却未得饱足。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人可以遇见许多的事，却未得着属灵的祝福。食饼得饱的人，以后可以再吃饼得饱，却未有任何属灵的益处，这是大难处。在我们姊妹身上，虽有父、母、强盗等难处，固然有一些属灵的祝福，但我觉得她所得的光不够。她虽能感谢神的恩典，但不知道恩典有何等大，虽有痛苦，但不知道痛苦有多么深，更不知道神的手有多明显。有的人眼中有帕子，看不见，明知许多事可以感谢，但不知如何感谢。就如一个瘫子可以起来行走，他却只知道那个事实，只摸着病症得医，并不明白属灵的益处。人有没有得着属灵的益处，都在乎他在所遇见的事上，得了多少光照。

「在各种难处和试炼中，有没有遇见主的大光照，乃是一切问题的所在。有人经过难处，里头真是亮了，真知道主所作的是什么。另外有的人在所碰见的一切事上，只能见到外面的事实，里面却一无所得。那一天吃饼的五千人，或者回到家中也可以感谢主的同情、主的爱心，所说的也许比吃的饼还多，

但却是只摸着饼的一点外面的事，还未在神面见看见够大的光，就只看见主是丰富的主，有丰富的供应。在每一个试炼中，都有神的光在那里照。那些蒙怜悯的人，就能看见；这个光是何等奇妙，能打开我们的心窍，正如天云密集时，大雷一来就能把天打开一样；有了神的光照，什么就都看得清楚了，苦难能叫我们明白我们所不能明白的。

「在约伯的事上，神是否只对付他的儿子们？是否只对付他的房子？是否只对付他的牛羊？我不是说没有对付这些，我乃是说，神在对付这些事之外，另外有一件事，不是儿女问题，不是房子问题，不是牛羊问题，乃是神有一个深远的目的，要在约伯自己的身上有所对付。约伯的儿女、房屋、田产、牛羊等，不是神对付的目标；约伯自己才是神对付的目标。你要看见，神对付你的父亲时，就是在对付你；神对付你的母亲时，也就是在对付你。人看见神对付约伯的儿女、房子、牛羊，那是不够的，必须在这些之外，看见神另有深层的事要对付，就是对付约伯本人。看见这样的人就是明亮的。如果今天有一个约伯，在一个聚会中，见证他的屋子有三、四层高，是用红砖盖的，以后就有大风来吹倒了。这是因为他的房子太高了。这样的见证指明他还不明亮，他离开神的对付还是老远老远的。我们听了就会叹口气，说，约伯，神不是对付你的房子，神乃是对付你。约伯有房子、有儿子、有牛羊、有骆驼，这些需要对付；就算没有这些，约伯本人也需要对付。神所有的对付，都不是直接地指着那些一件一件的事上。人的心思若只是停在这些事上，那是何等的可惜。神乃是要借着父母、家庭、四围的环境等，要对付你，叫你有所学习。

「主在世上时，在变饼的事上，吃的人只看见饼：在医好患大淋疯的人的事上，人只看见大淋疯；在医好生来瞎眼的人的事上，人只看见眼睛开了。他们所得的恩典太小了。然而在这里有一个恩典，是超过能看见的饼，是超过一个医好的大淋疯，是超过一个能看见的瞎眼者。若是那些人在医治、吃饼之外，有更多的得着，那时就不只有十二个门徒了。每一个大的对付，要向着大的方面去看，要向深处去看。在这六年中，你若只在事情上转，那就太可惜了。神若是怜悯我们，神能用很小的事，来对付我们，向我们说很宏伟的、重大的话。神在物质的事上，能对我们说属灵的话。在人看牙痛是小事，肺病是大事；但在神来看，医一个肺病的人，与医一个牙痛的人是一样的。许多人在医治的事上转不出来，在家庭中、夫妻中、儿女中、钱财中转不出来。五千人吃饼是什么意思，四千人吃饼是什么意思，他们全然不知道；他们只在那些事上专注神的恩典。这个是吃饼的原则。我们若不小心，若只注意四围试炼的事，也会走吃饼的道路，就是只要吃饼的恩典，而不知赐恩的神。我们要蒙拯救，不光是摸四围、外面的事，更要看见主是要对付我们这个人。在约伯所遭遇的事上，神乃是要对付约伯的自义。

「小的看见会拦阻大的看见；小的祝福会拦阻大的祝福；小的恩典，也会拦阻大的恩典。神给我们对付、试炼时，祂不只是一要对付我们近旁的事物，祂不只是一要我们注重试炼本身和试炼四围的事，祂乃是在这些事以外，有更远的大事，要我们看见。神是要借着四围的事，说祂属灵的大事；大事一解决，小事自然会解决。神乃是要我们仰起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们一旦看见这个，其它的事就容易解决。有的人受鞭打，只注重鞭打，或许也得着鞭打的益处；但有的人受鞭打，却能得着大光，看见主所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由小的事碰到大的事；事虽小，但那交涉是大的。儿子、屋子、牛羊，都是小的事，为要成全那大的事。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指示说，主阿，你对付我更深、更大的

事，到底在哪里？按人看，约伯的儿子死了，房子倒了，牛羊没有了，这是大事；但神手所指的，所作的，不止是那一件事；人若能看见神所真正要作的，那才是一件大事。

「你可以求神给你光，指示你所要成功的大事是什么。你一看见就够了，你要看见神一直所对付的。神用这样对付，用那样对付；但神的指头，都是指着那一件。只要那一件被你看见了，就成功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对付，没有一样是零碎的。你若能看见大的，小的祝福就过去了，不然停在小的那里，大的祝福反而得不着。若是你所有的对付是零碎的，祝福就会停在零碎的事上。主所要指示你的中心大事，你若没有看见，而只停在零碎的事上，这反而会成为你的骄傲。约伯的意思是那么的强，他必须一件一件地受对付，然后才能倒下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四十二5-6）在你过去的经历里，你只看见事情表面的事，至于在事情之外神所要对付的，你却看不见。你要知道，神所对付的事情是超过你所想的。你若摸着这个，你就能帮助人。愿主怜悯我们，不一直停留在小事上。小的事就算是对付过五十次，还是有第五十一次要来。如果是那一个基本的、大的，受了对付，那么就是有五十一次、五百次、一千次要来，也都要被打倒。」柯翠琼姊妹已经于二〇〇四年初回到她的居留地。柯翠琼告诉我在美国各地，倪柝声至今仍受到信徒普遍的爱戴，特别是那些以百万计的沉默的、不知名的读者群。

现在补述一下另一位熟识倪柝声的钟玛璃姊妹。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在伦敦同时认识巴若兰和钟玛璃的。虽然她们两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同被日本人关进上海的龙华集中营，但是在述及往事时，钟玛璃为人谦逊，总是让年长的巴若兰姊妹多发言，然后她再作补充。巴若兰离世之后，钟玛璃就和柯翠琼姊妹、张宝珠姊妹住在一起，也就是住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单位。在这期间，从前在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的负责弟兄简恩（Angus Gunn），曾数度从加拿大到香港探访过钟玛璃姊妹。简恩弟兄与巴若兰的哥哥格利斯·巴（Chris Fischbacher）早期同是格拉斯哥教会的负责弟兄，一九五四年我在格拉斯哥时就住在简恩家里。

当简恩、钟玛璃和我在香港重逢时，钟玛璃姊妹经常忆述倪柝声弟兄在上海时对一班西国传教士在患难中的帮助——包括物质上的和属灵方面的，钟玛璃再度印证，倪柝声在上海的教会中——指哈同路聚会处——因被误会而停止了事奉，但是倪柝声在西方的传教士中，却一直持续不断地作培训工作。倪弟兄为了装备这些宣教士，俾日后在全球各地进行差传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与我从其它外国宣教士口中所听见的相吻合。

倪柝声的弟妇倪徐恩秀姊妹这样忆述：「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处不见了倪柝声的服事之后，上海一些弟兄竟劝喻那些从倪柝声得着供应的西国宣教士暂缓到哈同路。这些西国宣教士灵里顿觉非常枯干，有一天她们不得已去找倪柝声交通，结果倪弟兄和她们谈到了国度的启示。交通后，几个西国宣教士大得帮助，喜乐异常。有几个女宣教士们说，不管倪柝声开生化是对或是错，我们知道他灵里有宝贝，他里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没有的。于是有许多各地来的弟兄姊妹与倪弟兄有交通。这是倪柝声在另一个范围里，恢复职事的开头。」

巴若兰和钟玛璃晚年在香港时，服侍她们的就是曾多年服侍倪柝声弟兄的老姊妹梅官。

梅官从小就当婢女，被倪家从故乡福州带到上海。正如前文所述，我母亲在上海怀孕，生下我妹妹秀美时，倪柝声的姐姐林步基师母曾把梅官让给我母亲作保姆；一九三六年九月，我父亲南下广东汕头

服事主，携眷离开上海，梅官重回倪家，留在上海作保姆。因为她有主的生命，梅官从倪柝声的《属灵的权柄》的信息学习，遵从以弗所书六章五至七节所吩咐的，「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倪柝声夫妇在福州筹备鼓岭第一期同工培训班和在福州海关巷继续鼓岭第二期的培训工作时，梅官从上海到福州照料倪柝声夫妇。一九四九年倪弟兄迁居到九龙钻石山寄庐时，我看到梅官继续默默地照料倪弟兄的起居生活。

一九五二年，倪柝声夫妇先后回到上海，留下梅官在香港。一九五六年巴若兰和钟玛璃从英国到香港服事主，梅官便一直服侍她们，是一位很称职的保姆。特别是巴若兰姊妹病危时，梅官不辞劳苦，很有爱心地照料巴若兰——倪柝声的老同工。巴若兰姊妹被主接去之后，梅官继续服事钟玛璃姊妹。钟玛璃逝世后，梅官虽已老迈，仍不畏辛苦地，为柯翠琼、张宝珠打扫房子、到街市买菜、烧饭。

梅官自认，她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倪家带领她信主，并为自己能够在神的忠仆们和婢女们家中服事，有若服事主，使她觉得骄傲和满足。梅官作见证说，她在这些圣洁的家庭中，从未见过任何有害心灵的书籍刊物，遑论一些污秽不洁的偶像之类的物品。

二〇〇二年冬天，梅官回到天家，享年九十二岁。梅官有一夙愿得以实现，即遗体被运回故乡福州安葬。她离开福州五十多年，一直留在香港，在事奉神的同工家中尽忠，身后其遗体由柯翠琼、刘雅琴两姊妹送回福州。当一些与倪柝声同走道路的人，在福州接到梅官的遗体后，他们借着安葬聚会，向福州的乡亲们传福音。梅官一直遗憾，她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向乡亲们传福音，她一直希望，在她离世之后，能向家乡父老和同乡而传福音，她的遗愿终于实现。这位深爱倪柝声一家的人，终于在逝世后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倪柝声的学生兼同工柯翠琼姊妹则在安葬聚会上印证了梅官生前所见证的。

第二十章末后的日子

一九七二年春天，倪柝声的大姐陈倪闰臣姊妹到新加坡探望她的儿子陈终道。我一遇到她，也尊称她嫫母，一如我称呼倪柝声师母一样。在一个主日下午，我邀请她到新加坡岛屿俱乐部（Island Club）用午茶，作陪的有陈终道，陈终道着有《我的舅父倪柝声》。在座的还有从香港到新加坡读神学的黄汉先弟兄和何伟祺弟兄。我们在谈话中，对倪柝声音信全无，感到不安。正是倪大姐在新加坡期间，收到了倪柝声从安徽省白茅岭农场辗转寄到新加坡的信件。信件原是寄给倪师母的大姐的，内文如下：

品琤大姐：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谢你。

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

祝你好！

述祖

四月二十二日

信中所说的慢性病，是指心绞痛，倪柝声的心脏扩大到原来心脏的两倍，不能拿重物，从这里看到倪柝声在二十年的监狱生活中，心绞痛仍然折磨着他，也就是说，他一生中被心绞痛折磨长达四十五年。信中署名述祖，那是他的乳名。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倪柝声再度写信给林张品琤姊妹，信件全文如下：

品琤大姨：

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五月七日）。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是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生活我尽量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

你身体如何？时常在挂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述祖

五月六日

纸短情长，倪柝声短短的几行字，吐露出他对妻子品蕙的真挚的爱，特别是那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令人掷笔哀感。属灵伟人倪柝声晚景的孤苦，实在叫人同声一叹！接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倪柝声又给张品琤写了一封信。

品琤大姨：

你六日北京的信及十一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来，望能多住一点时间，多休息一点。我病中也望能与自己的亲人多接触。此间山明水秀，有一特点，小孩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休息一回。

蕙妹骨灰，的确是个问题，你来后再商量决定。

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手电筒带一个来。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十六日

这封信值得咀嚼的，是那句「小孩长得特别好」倪柝声在安徽省农改农场所能接触的小孩子，不会很多，局限于干部的儿女、劳改结束后留场职工的儿女等；但他却说那里的小孩子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倪柝声在上海以前所看到的，包括在文革时侮辱他人格、摧残他人身的小孩子，

固然对他不好；在教会中控诉他的张主怀、许梅骊、周强华、沈荣泉等，对他也不见得太好。另一个可能是，由于他没有亲生的孩子，在临终前，见到别人的小孩子特别可爱。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在这之前二十多年，即一九四九年，当倪柝声夫妇感触到膝下犹虚时，突然叫那时仍是小孩子的我，改称倪师母「嫗母」。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倪柝声再次写信给林张品琤姊妹：

品琤大姨：

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

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能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

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与别人。

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自己亲人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了联系，只好请你。

你来时带一斤太仓式肉松，一斤牛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腑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胶基酸补充。很困难。

祝你好。

述祖

二十二日

信中所说，地戈辛的化学名是尼亚辛（Nicotinic Acid），治心绞痛；因心血管收缩时，缺乏血液供应，引致心胸剧痛，冒出冷汗。在信中，倪柝声明确地和具体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希望尽早回到亲人身边，落叶归根。信中所说的马兴涛，是倪弟兄侄女倪慧宜的丈夫。在倪柝声监禁期间，倪慧宜及其丈夫马兴涛照顾过倪师母，此时倪慧宜已逝世。倪柝声感到时不我待，同一日也致信马兴涛。

兴涛侄婿：

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你知道我是有大姐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葬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依靠你。

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提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念。

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

二十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二十二日

倪柝声在同一日发出两封信，一封致张品琤，一封给马兴涛，两封信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想回到亲友身边，落叶归根，寻个归宿之处。

这时的倪柝声并不知道，他在海外赢得了成千上万信徒的敬爱，各方各族的人因他的著作得着帮助，他的著作已被译成多国文字，无数人视之为至亲的亲人。

信中透露，倪大姐陈倪闺臣从香港定期寄家用给他，这些款项上的安排，我父亲身为教会负责人，当然知之甚详。谁能料到，此时的倪柝声在安徽的深山僻壤中，和外界的通讯闭塞，自感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三天之后，倪柝声再写一封信给张品琤。

品琤大姨：

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退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

祝你好。

述祖

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六日倪柝声调到白云山农场，当天就写一封信给侄婿马兴涛。

兴涛：

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姐寄家用。）你们态度要坚决明朗。……

我于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修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

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二十六日

倪柝声于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从枫树岭被调到白云岭农场的山下坡。即是说，他从集体的劳改队，被调到关个人的小号子牢房。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倪柝声亲自执笔写了他一生中最末了的一封家书。照录如下：

品琤大姨：

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夜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纸短情长。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三十日

倪柝声在五月三十日写这封信，公安干部说他在同一天逝世，这封信如何能寄到外界，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迷。

让我们细读吴磬所写的《取倪弟兄骨灰的一些见闻》。

「六月一日仍住在上海的品琤姊妹收到白茅岭农场的电报：『倪傲夫病亡山下坡。』于是我们在上海的三个家人便商量如何去料理后事，确定由我和小玲陪伴品琤姊妹带着那封电报尽快赶去农场，买了六月三日的长途汽车票，由上海直达安徽省广德县。但那天我们三人到达广德县时，已是下午一时，午后去白茅岭农场只有最后一班车，且已客满，又不知倪弟兄新住处离车站多远，于是确定我一人先去，小玲陪伴品琤姊妹在广德县城找旅馆住一宿再去。我就在当天黄昏到达白茅岭农场总部，随即步行到山下坡倪弟兄住处，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房子不多，接待我的人说，他们那里不接待外人，请我仍回农场总部的招待所去过夜，我只得往返奔波，当夜仍回农场总部招待所，由一位姓陆的管教队长接待。晚饭后，我问陆队长有关倪弟兄病故情况，他回答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已过，还未见倪傲夫从卧房出来，就推开房门去看他，只见他仍卧床未起，并且奄奄一息，于是叫卫生员来诊治，卫生员见他情况严重，叫人用车送去农场医院治疗，但医院的医生打针用药抢救无效，终于就在当夜去世。』过一会儿，陆队长又对我说：『看来他是自杀的，因整理他的床铺时发现在床单下有一份绝命书。』我追问什么绝命书？他就拿出确实是倪弟兄的笔迹，很大的字写在从练习簿上取下的一页纸上：『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我看完对陆队长说，这不是绝命书，是他预知自己身体不好，不久人世，但至死他坚信所认识的基督；并对他说，你们农场发的电报不也是说他是病亡的吗？但这位陆队长，一点不明白那几句话的意义，他问为什么要信基督而死呢？陆队长另外又对我说：『因天气炎热，没等你们来，已将他火葬了。』我告诉他，另有两位亲属第二天来。

「次日，小玲陪品琤姊妹来到招待所，我们三人就和陆队长坐谈，陆队长重复了一些昨晚对我说的话，也给她们看了倪弟兄写的那几句话。最后，品琤姊妹问起倪弟兄的遗物。陆说，他的现金是笔极大数目（指存监狱银行的），已收归国库了，又说倪傲夫也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同时他也不让品琤姊妹去倪弟兄房间处理遗物，只是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农场火葬场取骨灰，其实那不是什么火葬场，而是农场烧窑的地方，平时生产砖块，兼管火化尸骨。我找到火化倪弟兄遗体的农民，他姓茅，我问他倪傲夫遗体情况；茅回答说：他是安详过世的遗体，一点没有反常情况。我故意问他，那像自杀者的尸体吗？他说他火化了很多尸体，能认出自杀者的尸体，但倪傲夫他可作证肯定不是自杀的。他说倪的遗

体很安详喜乐、很正常。事实上，倪弟兄是始终信基督而逝世，也是始终维持自己的喜乐而逝世的。」与吴罄一起到山下坡的万小玲对倪柝声的逝世提供了另一个补充的版本：

「他的难友吴友琦弟兄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复发，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里路是石子路，坎坷不平，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垂危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倪柝声就被主接去了。」

万小玲用动人肺腑的话语总结了倪柝声的一生：

「公公——倪柝声——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希伯来书十一13）『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十一 1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必须指出的是，倪柝声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垂危时，在多病缠身时，在离世前数小时，所写出的最后一封信，其笔迹和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为我父亲题字时的笔迹几乎一样，虽然隔了三十二年，笔迹依然不变。

倪柝声留下最后一封信的笔迹，留下了破案的线索，为自己洗刷了一切的罪名，鉴证了《我生活腐化的情况》，绝非其亲笔所写。一员担任国际刑警长达五十年的资深的科学鉴证专家所下的监识判断最有说服力，也最具重要性和关键性。

由于倪柝声师母张品蕙坚持和丈夫倪柝声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和地位上，坚信倪柝声是清白的和无辜的。她虽多次受劝服，仍不肯与倪柝声划清界线，始终不肯与倪柝声离婚。为着这样始终不渝的、忠贞无比的爱，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九六九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沪军审（戴）字第四十三号的决定，以张品蕙「思想反动，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定她为反革命份子。

从逻辑上说，欲平反倪柝声，必须也要平反倪师母；反过来说，平反了倪柝声师母，不啻平反了倪柝声。从程式上说，预先平反了倪师母，也就为平反倪柝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他日平反倪柝声，在程式上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正如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所说，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神。果然神垂听了数不尽的信徒的流泪祷告，在倪师母逝世之后十五年，即一九八六年，上海市正式撤销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决定，予她平反，证明她维护倪柝声的清白的举措，是合宜的和无罪的。

上海市公安局既为倪师母平反，实质上已详细审查倪柝声的案件，业已发现该冤案的偏差和失实之处，相信有关部门有朝一日会为倪柝声平反。但是神的仆人只讨神的喜悦，并深信耶和华是伸冤的神。